

# 贝林格言论选集

1973—1981

54701

# 贝林格言论选集

1973—1981

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生活中的影响 .....	1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学院纪念陶里亚蒂诞生八十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1973年3月26日)	
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考虑 .....	9
1973年9月28日、10月5日和9日在《再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帝国主义和共处 .....	9
美国干涉的决定性作用 .....	11
动荡和冲突的形势 .....	12
为和平而斗争的两个方面 .....	13
我们能考虑本国的全部历史 .....	17
在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和平道路和非和平 道路之间作脱离实际的、公式化的抉择 .....	21
通过民主道路改造社会，需要力量和民意支持 .....	24
联盟是任何革命政策的决定性问题 .....	26
为何意共主张民主代替，而不是“左翼”代替 .....	30
同天主教界开展对话和讨论的三个方面 .....	31
走向代表人民大多数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 伟大的“历史性妥协” .....	34
建立一个新欧洲 .....	37
在布鲁塞尔西欧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 (1974年1月26日)	

两点要求 .....	38
争取缓和 .....	40
新的道路 .....	43
在西欧发达国家战胜资本主义的各种新道路 .....	45
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米兰青年 集会上的讲话 (1976年6月6日)	
在柏林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发言 .....	54
(1976年6月30日)	
对意大利电视台发表的关于柏林欧洲共产党和 工人党会议问题的谈话 .....	65
(1976年7月1日)	
答意大利《共和国报》社长斯卡尔法里问 .....	66
(1978年8月1日)	
意大利共产党在欧洲和世界上的行动 .....	78
在意共全国咨询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4月2日)	
在北京大学集会上的讲话 .....	101
(1980年4月16日)	
在罗马竞选集会上的讲话 .....	109
(1980年5月4日)	
二十世纪的加里波第 .....	126
在意共主席路易吉·隆哥葬礼上的讲话 (1980年10月18日)	
同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社长雷克林的谈话 .....	136
(1980年12月7日《团结报》)	

---

在意共建立六十周年前夕答意大利电视台记者 皮耶朗东尼奥·格拉齐亚尼问 .....	148
(1981年1月21日)	
争取改变意大利和执政 .....	152
在罗马庆祝意共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81年1月25日)	
在都灵菲亚特厂共产党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	174
(1981年2月15日)	
同热那亚意大利造船厂工人的谈话 .....	185
(1981年3月2日)	
在卡坦扎罗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	188
(1981年3月8日)	
在意大利电视台答记者问 .....	199
(1981年3月17日)	

#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 生活中的影响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学院纪念陶里亚蒂诞生  
八十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1973年3月26日)

多年来，从事党校工作的同志们建议把佛拉托基埃<sup>①</sup>共产党人学院命名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学院。今天，在陶里亚蒂诞生八十周年之际，这个建议付诸实施了。我们确信，不仅目前在我们中央党校工作和学习的教员和学员，而且还有那些将来要到这里来工作的人，都会理解这个为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设立的全国性学习中心用陶里亚蒂同志的名字命名这件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决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我们想借以在全党开展一次旨在使人认识、学习和深入研究陶里亚蒂的业绩和思想的活动。这个活动包括多种多样的政治活动、群众性活动和文化活动，将进行一年多，直到1974年8月陶里亚蒂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为止。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为纪念而纪念，更不是想回击那些诋毁

---

<sup>①</sup> 佛拉托基埃是罗马郊区一个地名，意共中央党校所在地。（本书的脚注都是中文版编者加的）

陶里亚蒂形象、并非新鲜的卑鄙企图，也不是仅仅为了驳斥和纠正某些肤浅的、歪曲的说法。我们打算制订并执行的活动计划符合一种要求，我们感到这种要求明显地存在于我们党的斗争、发展和理论建树的现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要求在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当中，在意大利的政治辩论当中，也越来越广泛地为人们所感觉到了。

实际上，正如隆哥同志昨天所写的那样，岁月的流逝远没有减少陶里亚蒂的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反而使他的遗产至今依然保存的有效性越来越突出了（尽管现在的条件同我们失去他时的那种条件相比，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使他对意大利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持有的分量也越来越突出了。

我们从陶里亚蒂思想中得到的教益是十分宝贵和现实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期，意大利——也不仅仅是意大利——正经历着一个危机阶段，这个阶段充满危险，但也富有进行斗争、推进工人运动、推进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党需要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政治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党在陶里亚蒂领导下成长壮大的长期岁月中积累起来的。

国家经历的危机实质上是国内统治阶级失败的表现。统治阶级更加暴露了它们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的革新和进步问题，从而再次呈现出全面倒退以及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和道德上衰败的危险前景。

这样，在意大利再次极其尖锐地提出改变领导阶级和政治领导的问题。于是也就产生了确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职

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必须确认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和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职能：这个工人阶级要善于表明自己是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作为整个社会政治联盟的领导力量，作为能推动整个社会朝着一个新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的；这个共产党要善于日益成为进行这一斗争和改造的、为国家服务的工具。

正是因为当前的任务具有这样的性质和意义，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陶里亚蒂的业绩和教导的价值，才充分地显示出来。陶里亚蒂是这样一个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赋予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战略和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思想的那个新方针，对建设一个有能力承担起如此具有决定性的责任的党，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诚然，为了理解陶里亚蒂的为人和业绩，也需要回顾那些最困难的时刻和情况，而不要害怕暴露矛盾乃至错误，但是，要把他个人的遭遇始终放在工人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世界革命前程这一总的条件之下来看待，因为陶里亚蒂是这一斗争和进程的主要战士之一和主角之一。只有这样才不会忽视两个主要因素，这两个因素为我们理解他的行为和品格的伟大提供了钥匙。第一，他有能力投入和参与世界生活的先进潮流之中，始终具有历史观念，把握历史时机和政治时机。第二，他有能力把一个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才能体现在他作为领袖的活动中，他为建设一个能把工人运动变为国家的历史和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共产党而奋斗。我认为，这两点正是陶里亚蒂在政治上最有分量的遗产。对我们来说，要关心对他的思想和活动的根源、过程和研究，上述遗产是很重要的，也应当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感兴趣，并且也促使别人对此产生兴趣。



对我们来说，特别要紧的是要看到陶里亚蒂作为革命领袖和国务活动家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他的理论建树和实际活动的关键所在就是：他领悟到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毁灭和埋葬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那些财富和珍品这个历史阶段，工人运动为了要拯救和继承这个遗产而对全人类负有新的责任。陶里亚蒂完全根据这个放眼整个世界舞台的观点，指出了我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内方面的目标。这就是民族独立和民族团结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萨莱诺转折<sup>①</sup>据以产生的首要原因，尽管有许多人忘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社会革新、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的目标。可以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现这种性质的目标的那个历史时期已告结束。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和领导权，通过所有人民力量的团结，遵循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时代已经到来。正因如此，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看法：认为无产阶级应把诸如南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天主教问题等这些意大利国内重大历史性问题当作它自己的问题，并以带有它自己特点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共产党没有变成一种丧失自己的阶级性质和国际主义性质、迷失自己最终的总目标、从而成为某种从属别人的力量的一般民主进步组织。与此同时，陶里亚蒂也拒绝任何一种把党看成排他性组织的观念，这种排他性组织硬认为只有它才能表达社会、

---

<sup>①</sup> 萨莱诺是意大利南部一个中等城市。1944年4月，在这里成立了有意共等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参加的“全国团结政府”，亦即巴多里奥第二届内阁。这个政府是根据陶里亚蒂在1944年3月自莫斯科回国后提出的建议成立的。陶里亚蒂认为当时的任务是要抗击德寇和肃清法西斯残余，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这项政策称为“萨莱诺转折”。

政治和文化生活当中的全部要求，才能代表所有进步革命运动。陶里亚蒂总是坚定地认为，革命行动不是宣扬一种模式，也不仅仅是为等待最后解决而进行宣传活动，而是意味着要不断地斗争和努力，以便达到某些目标，这些目标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正如陶里亚蒂 1963 年在贝尔加莫的讲话中所说，党“推动并吸引一些现实力量”，党“研究能否取得、怎样才能取得以及能同其中哪些力量取得相互了解，相互承认彼此的作用，从而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达成谅解和协议”，因为这些目标对全人类和全民族来说都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

这样，党就变成起领导作用的、同时又是坚韧不拔的力量，变成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主张团结的力量。某些有激进倾向和“为行动而行动”倾向的个人和小组，某些沿袭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纲领主义和宗派主义传统的派别，在评价陶里亚蒂和意共时，都理解不了这一点。否定或抛弃陶里亚蒂教导的这些基本内容，就必然陷入机会主义或一味蛮干的徒劳的行动之中，而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陷入从属别人的地位。

陶里亚蒂整个路线的团结性，不是由单纯的防御和策略要求决定的。正如他本人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的（这个报告对此作了明确而深刻的概述，今天值得许多人重温和思考），我们的无产阶级团结政策，我们实现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等人民群众的团结的政策，实现民主运动的团结、民族团结的政策，这“不仅对于对付法西斯复活的企图，对于纯粹为了防御而抵抗反动派的进攻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对于使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对于完成国家生活、国家的经济政治结

构、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际地位的彻底革新工作,同时使新的进步力量集团、使劳动阶级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进入国家领导,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当时陶里亚蒂还说,“我们这个总的战略目标,我们这条政治路线,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由抵抗运动取得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所造成的局面本身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如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甚至在联盟破裂和1948年发生向保守方面的转变之后,这条路线也依然是有效的和现实的”,因此,“在抵抗运动中和建立现行共和制度期间作为我们的指南的那个前景,并未关闭,相反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我们面前敞开着……这就是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

但是,陶里亚蒂的新建树不仅在于他从对革命进程的看法和对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中得出的全部结论。他的新建树在于:他——请允许我用这样的说法——“发明”了一种类型的党,也就是他1944年称之为新党、群众党的那种党,就其结构、成分和工作方式来说,这个党变成了一个同真正实现和完成意大利历史和世界历史向它提出的目标 and 责任相适应的工具。

因此,这是一个民族的党,同时又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党,它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从来没有成为它制定和实行民族政策的障碍,而是恰恰相反,成为使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密切地符合本民族的历史和实际的一个条件和鼓舞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不曾有过采用不加批判的形式、华而不实和说教式的宣传形式、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进行歪曲宣传的形式去表现国际主义的时刻,而且陶里亚蒂本人也曾率先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如下情况也毕竟是事实:那

些错误已经被纠正、被克服了；我们在陶里亚蒂领导下取得的全部成就就是：有了一个在意大利生活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对世界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过去已作出、现在也继续在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共产党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陶里亚蒂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新型的知识分子。他立足于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曾为意大利造就了一些才华出众的国务活动家（只可惜太少了）和政治思想家。当然，也正因如此，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是一位实事求是、处事有节、谨慎而又机智的政治家。有人试图把陶里亚蒂描绘成那种浅薄和做作的人，与此相反，陶里亚蒂却是一个有伟大理想和火一般热情的人。他具有同人民群众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需要、疾苦和愿望，也让他们了解和爱戴他自己的非凡能力。他也就是依靠这种能力成为这样一个人，并且从中吸取营养的。他一生致力于为被压迫者的事业服务。由此也产生了他的人道精神和感情，他在道德上和思想上严以律己的精神，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勤奋态度以及作为领袖的严肃性。他的严肃性也表现在：他具有在处理各种关系中总是认真地、批判地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的作风。

陶里亚蒂的品格和业绩存在于意大利工人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他对意大利共产党有过决定性的影响）和意大利的现实当中，也存在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宝库当中。

他的教导必然是复杂的，要掌握他那十分丰富的教导是不容易的。他的教导也曾不断遭到那些流行一时的公式主义和陷于屈从别人的立场与观点的人的诋毁。然而，他的教导深深扎根于我们党那部分起决定作用的党员和干部的经验和心灵之中，扎根于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活动方式之中。我们认为特别重要和特别

---

有意义的一点是：他的教导在今天加入我们党和靠拢我们党的许多青年中间引起了新的兴趣和共鸣。

(译自贝林格《共产党问题》〔1969—1975年言论集〕

第二卷，意大利联合出版社 1975 年版)

# 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考虑

1973年9月28日、10月5日和9日在

《再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 帝国主义和共处

智利事件是一个悲剧，是分布在各大陆的千百万人经历的一个悲剧。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指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引起人们对反动政变和屠杀群众的罪魁们的痛恨，激起人们对受害者和正在进行抵抗的人的声援，而且提出了一些使各国的民主战士们深为激动并促使人们思考的问题。

对智利民主、对智利的社会成果和劳动人民进展前景的这一极其严重的打击，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运动，对全世界工人和民主运动的一个打击，掩盖这一点是没有好处的。意大利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劳动群众、所有民主反法西斯人士，也都感到了这一点。

但是，正象经常对待其他一些如此激动人心的、如此严重的事件一样，为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或是仅仅表示反对和愤慨，相反，他们是力求从中汲取教训。在智利问题上，这一教训是直接触及广大世界人民群众的，它使那些尚未接受我们对今天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冲突的观点的广泛社会阶

层看清和了解这一事实的某些基本情况。这是促使人们广泛而积极地参加改变上述情况的斗争的一个必要前提。

首先，智利事件粉碎了各种幻想，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性，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仍然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压迫和控制，仍然是侵略和掠夺，仍然是只要具体条件和力量对比允许，就企图压迫各国人民，使各国人民不能独立、自由和团结。

其次，智利事件充分表明，在所谓“自由世界”的国度，民主的敌人是什么人，他们呆在什么地方。多少年来，人们就向这些国家的舆论灌输这样的宣传：把工人运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说成是民主的敌人。今天，这些国家的舆论看到了一个新的鲜明例证：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或为他们效劳的各政党，一旦其特权和权力遭到打击或威胁，就随时都会破坏一切自由，践踏一切公民权利和人道原则。

共产党人和所有为争取民主进步和各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的任务就是，依靠对这些真理的越来越广泛的认识，来唤起所有的人对帝国主义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给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民族的独立所带来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承担民主和革命义务，以便使力量对比在全世界和每个国家里进一步向有利于劳动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整个民主及反帝力量的方面转变。智利事件能够而且应当在掀起声援智利人民的强大持久的运动同时，唤起民主意识的更普遍的觉醒，特别是引起这样的行动：使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具体斗争的新力量走上舞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也是必不可少的：认真进行思考，以便从智利政治悲剧中得出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判断

国际局势和各个国家(其中包括我国)的工人和民主运动的战略策略的有益教训。

## 美国干涉的决定性作用

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会否认,在智利事件中,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和干涉起了决定性作用。人民的觉悟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除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政变发动前后的政治外交动态以外,还有这样一件事实:从人民团结政府刚一上台起,在智利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美国垄断集团(铜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政府领导集团,就在各方面(从经济战到颠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便使阿连德政府宣告失败,并进而推翻它。

况且,美国为了损害那些渴望独立的人民和国家而采取的这种或那种干涉方式,肯定不是什么例外,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那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会看不到美国对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粗暴干涉呢?社会主义古巴,依靠它的坚强和团结,也同时由于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援和支持,多年来不得不抗拒种种阴谋、挑衅、经济抵制和对其领土的直接进攻,至今不得不一直保持警惕,捍卫本国的独立,这一点又有谁不知道呢?

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不论是亚洲和非洲的不发达地区,还是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从日本到西欧),美帝国主义也在不断渗透,采取形形色色的行动,以期保持或扩大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



## 动荡和冲突的形势

怎样才能反对、限制和阻止帝国主义的这种倾向呢？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切实的答案，即：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使之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追求自身解放的人民和为争取新的世界秩序与新的国家关系的所有国家。大约六十年来，从1917年俄国革命首次打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独霸统治时起，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战胜纳粹主义、中国革命胜利、英法老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之后，帝国主义控制的地盘就逐渐缩小了。在企图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亚两洲成立的社会主义各国政权的这一疯狂冒险政策（即击退政策）失败后，资本主义列强和美国本身就不得不承认，各国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不好惹的，必须同它们打交道，同它们谈判。

继殖民体系崩溃后出现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得以取得独立，并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捍卫本国的独立；其中有些国家还有把本国经济社会秩序的建设引向社会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英雄的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强大的国际声援运动支持下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胜利，过去和现在都有巨大的意义。这一胜利给帝国主义的企图以新的沉重打击，是对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推进国家关系方面的缓和与和平谈判的政策的新决定性贡献。

但是，除此而外，今天美国也不得不考虑西欧各国特别是近几年来所表现的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愿望。

最后，不管来自推翻智利人民团结政府的打击是多么严重，复

兴和解放运动仍然是拉丁美洲各国不可磨灭的现实，它肯定将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地表现出来，不断地找到成功地（即使是部分地成功也好）反对美国统治和卖身投靠美国的本国集团的道路。军事政变在智利人民当中遭到了，而且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各个地方也激起了以往其他反动政变所不曾引起的抵抗、谴责和反击，这一事实不是正好说明这一点吗？

承认世界历史进程中正在确立的基本倾向——最终说来，这一倾向会逐步缩小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地盘——肯定不会使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且最近几天，恰恰是在智利提出了新的严重警告）：国际帝国主义和许多国家的反动势力有能力压制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某些场合则是有能力使主持这一斗争的力量遭到严重挫败。只有考虑这一事实，并掌握这一事实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和各个时刻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或者可以预见它会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才有可能避免意外打击，避免陷入错误，才有能力组织和进行有准备的、恰当的革命和民主行动。

## 为和平而斗争的两个方面

有人问，在国际生活日益加速走向缓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这一阶段，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怎么有可能进行象在智利进行的如此粗暴的干涉。但是，谁又提出过国际缓和与共处就意味着出现太平时代，意味着国内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以及反革命和革命之间的斗争的结束呢？

以和平共处为前景的缓和政策，首先是为了保障与全人类和

各国人民休戚相关的首要目标实现的必经之途。这一目标就是：避免原子和热核战争灾难，确保世界和平，确认谈判原则是解决各国争端的唯一手段。此外，缓和与共处，既然意味着要逐步裁减一切军备，进行多种多样的日益扩大的双边或多边的经济、科学、文化合作，就成为共同努力处理当代世界重大问题（诸如发展落后地区、污染、反对贫困和社会性疾病等问题）的道路之一。

缓和与共处本身在短时期里并不会自动带来这种成果：使世界不再分成集团和势力范围，因此也不会排除美国以各种方式、包括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对它想永远置于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统治范围内的地区和国家进行干涉的可能。

世界分为不同的集团和势力范围，是在缓和与共处政策之前就存在的事实，因为这一事实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个发展过程的结果，这一进程包括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近几十年出现的各种事件，这些事件决定了国际和各国国内平衡的现有局面。也不应忘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裂对国际生活所起的消极影响，在这些分裂中，最严重的是人民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

现有的平衡朝着有利于进步力量的方向进一步转变，首先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及其组织的斗争能力和行动能力。但是，同样明显的是：缓和与共处的进展，对于促使世界不再分为集团或势力范围，对于促进每个国家独立权利的确立，说到底就是对于缩小帝国主义对别国生活进行干涉的可能性，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坚决地走缓和与共处的道路，就意味着要促进世界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发展民主和自由。

这就是我们对缓和与共处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灵活的和开放

的，是同另一种观点即帝国主义固有的观点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的观点是（即使在它不得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谈判的时候，也是如此）：硬要把世界形势固定在当前世界和各国国内力量对比的“现状”上。

因此，必须在国际范围内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以推进缓和与共处进程，发展这一进程的一切积极的潜在力量，同时必须在各个国家继续进行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根据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经济和社会体制以及政治和国家制度。

我们党一贯重视这两个方面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正象陶里亚蒂使我们习惯去做的那样，我们力求冷静地估价世界关系中的复杂情况和意大利所处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尽力确切地估计我们国内的力量对比的现状。

特别是，在我们的全部活动中，我们一贯给予意大利属于美国控制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一基本事实以应有的重视，给予由此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约制以应有的重视。但是，认识这一客观事实肯定没有使我们消极和瘫痪。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以我们的行动和斗争做出了反应。我们反击了一切想要搞垮或孤立我们的企图。我们的力量和在人民群众和国家生活中的影响，甚至还有所扩大。我们能够也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所以，首先是要改变国内的力量对比，使之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挫败和粉碎国内外反动集团的各种企图，它们企图颠覆民主立宪制度，打击我国人民获得的成果，分裂我国人民的团结，阻止我国人民走向社会变革。

同时，我们的斗争和行动也要在国际关系方面发展，对欧洲和世界各地削弱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力量的一切斗争做出我们的贡献，与此同时也促成这样的意大利外交政策：它确立我国要

同所有其他国家和平友好相处这一意愿，同时又确立意大利人民充分自由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

今天，可以朝这个方向迈出决定性的步伐，因为我们的要求和建议在欧洲这样一种环境中提出的；这一环境的特点是，缓和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因为这些要求和建议符合西欧其他国家所表示的类似的希望和倡议。我们从这一点确定了这样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中心内容是主张为建立地中海的和平秩序和自主、和平、民主的西欧而努力。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并不意味着要把欧洲和位于欧洲的意大利置于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同美国相敌对的地位。谁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提出一些荒谬的狂妄的东西，最终说来是同争取缓和与我国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发展的政策逻辑相违背的东西。

为这条国际政策路线而坚持不懈地斗争，是我们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前景的基本部分。

智利事件促使我们进行认真的考虑，这种考虑不仅涉及国际方面和对外政策问题，而且也涉及同我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和前景有关的问题。

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不应忽视智利情况和意大利情况大不相同。智利和意大利处于世界两个颇为不同的地区，即拉丁美洲和西欧。正象在政治体制（智利是总统制共和国，而意大利是议会制共和国）和国家体制上不同一样，两国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等方面也是不相同的。另外，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传统和方针，它们各自所占的份量及其相互关系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在存在这些差别的同时，也还有一些类似之处，特别是智利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也主张走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 我们能考虑本国的全部历史

因此，应从所有这些差别和类似之处当中找出根据，以便深入探讨和更好地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是什么，怎样才能前进。

必须始终牢记促使我们制定和执行陶里亚蒂称之为“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那一政治战略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团结在他的周围并遵照他的教导进行工作的领导集团的思想 and 行动，是制定这一政治战略的根源。1926年的里昂代表大会宣告了反对极端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胜利，极端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建党初期曾是党的活动的特点，列宁对此曾严厉地批判过，并曾大力号召人们加以克服。里昂代表大会标志着共产党对意大利社会的历史和结构进行分析的开始，这种分析随后由葛兰西加以发展和深化，表现在他从监狱中寄出来的著作中和在陶里亚蒂领导下的那个领导核心的方针和活动中；在法西斯年代里，陶里亚蒂领导着党，使党能够开展政治活动。

但是，对于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的生活来说，确立和充分发展指导我们整个行动的历史抉择和政治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我们在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中提出并遵循的那条团结路线和萨莱诺转折。

解放后，意大利重新获得了民主自由，但仍处在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英国）军队占领的条件下。这一事实确实不能低估，正如后来、甚至今天也不能低估意大利参加一个特定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一事实（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一样。有些地方，象1945年

在希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全面地考虑这种国际条件就进行冒险，结果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又倒退到刚刚摆脱的那种地下状态去了。

但是，这不是决定我们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的唯一因素。这个转折的最深刻含意在于共产党必须和愿意考虑意大利的全部历史，从而也就必须和愿意考虑在国家的舞台上出现的、同我们一起为民主、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斗争的所有历史力量（社会党力量、天主教力量和其他民主力量）。新的情况是在解放战争中形成了一种包括所有这些力量的团结。这是一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进步的中等资产阶级的一些集团、天主教群众运动的一大部分，甚至包括武装力量的一些部队和干部的团结。

“我们在倡导、组织和领导这一团结的人们当中是站在最前列的。这个团结有其革新我国整个生活的纲领，这个纲领只是部分地明文写出，但是它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实行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刻改革，新的进步力量集团掌握社会领导权。我们的政策就是为争取这一解决途径而进行公开和彻底的斗争，这个解决途径意味着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民主发展和社会革新。因此，并不是什么我们不得不在同失败前景相联系的起义道路和同没有严酷性没有冒险的安稳演进的道路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在我们面前打开的只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客观环境，由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由在斗争中产生的团结和纲领而形成的。问题在于努力克服和粉碎一切障碍和抗拒，引导和推动已经胜利地经受内战考验的真正群众运动。这就是当时提出的最革命的任务，我们曾集中力量去争取完成这项任务。”

陶里亚蒂就是这样精辟地概括了我们的政策，并就此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我们深知，国内和国际的保守反动集团和天主教民主党所实行的分裂人民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政策（一个使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政策）中断了抵抗运动所开始的革新进程。但是它没有能够阻塞这一进程。一个广泛而牢固的团结在全国、在人们的意识中抵制住种种分裂企图，而近几年来这一团结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以新的形式重新开始发展，当然，这一新形式的团结是以在抵抗运动中曾团结在一起的那些历史力量为主力的。

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而且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是扩大这一团结，使人民的大多数团结在一个为医治和民主革新整个社会和国家而斗争的纲领的基础上，使一个能完成这项任务的政治力量阵容同这个纲领和这个多数相适应。只有这条路线而不是别的路线才能孤立和挫败保守集团和反动势力，使民主具有坚不可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而推进社会的改造。同时，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从现在起就为建立一个保证充分实行和发展全部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创造条件。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向知道，社会统治集团及其政权机关将千方百计阻止劳动阶级和民主的前进。我们知道，正象智利的悲惨教训所再次表明的那样，当人民的力量在国家和社会中开始夺得基本的权力时，反民主的反动派就会变得更加残暴和凶狠，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一认识中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是接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放弃民主和团结的阵地而选择另一种胡闹的战略吗？显而易见，这种战略迅速而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先锋队陷于孤立和遭到失败，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恰恰相反，我们



认为,如果统治集团要去破坏民主秩序,使国家分裂为二和动用反革命暴力,这种情况应进一步促使我们牢固地把维护自由和民主进步的事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避免国家彻底的分裂,更加坚定、更加明智和更加耐心地致力于孤立反动集团和寻求所有人民力量之间一切可能的协同一致。

诚然,即使革命先锋队一贯执行这条路线,这也不能排除反动派公开的进攻。但是,这条路线会使反动派的公开进攻更加困难,从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来击退这种进攻,并在这种进攻刚一露头就把它粉碎。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正如隆哥同志所说的,即使存在使用反动暴力的可能性,也“不应当因而提出两种前景和作出两种实际准备”。有人还根据智利的经验问怎样团结和聚集力量以打败反动派的进攻,我们继续用隆哥同志的话来回答他们:“彻底地把人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和发挥他们的战斗性,日益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的战斗联盟,从而在斗争中实现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作用。”因此,主要之点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大多数的“这种动员和这种战斗性所达到的程度”。

正是在贯彻这些原则和运用这些政治斗争的方法方面的坚定性和一贯性使得我们打倒了法西斯暴政,恢复了民主制度,挫败了保守和反动势力(从谢尔巴到安德雷奥蒂<sup>①</sup>)搞的要打击自由制度、或者无论如何也要使工人和人民运动向后倒退的种种企图。如从1947—1948年开始反对中间派政府<sup>②</sup>的歧视政策,反对这几届

① 谢尔巴和安德雷奥蒂均为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前者曾任内务部长、总理等职,后者曾任财政部长、预算部长、国防部长、总理等职。

② 中间派政府是指天主教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政府迫害和扼杀自由的勾当的斗争；1953年，挫败了利用欺骗性选举法从反民主的方面破坏选举制度和议会代表制的企图；1960年，塔姆布罗尼政府<sup>①</sup>进行的专制主义冒险刚一露头就被粉碎了；1964年，挫败了反民主的阴谋和反动政变的企图，其中还有纠集和利用一部分武装力量和公安部队来反对共和国的企图；从1969年起，进行一场斗争，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和法西斯集团煽动和支持下搞的那一系列挑衅和暴乱活动，有人企图以此来制造极度紧张的空气和造成政治经济衰退的局面，从而给专制主义的反宪法的解决办法，至少是给一种长期的向右转开辟道路。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们始终以保卫自由和民主方法为旗帜进行反击，号召广大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推动关心捍卫反法西斯宪法的原则的所有力量之间最广泛的团结一致。

## 在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和平道路 和非和平道路之间作脱离实际的、 公式化的抉择

工人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我们党的这些经历证实，那种企图把为走向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略的选择公式化地归结为和平道路和非和平道路二者必居其一的论点，是有点脱离实际的。多年来在

<sup>①</sup> 塔姆布罗尼系天主教民主党人。1960年成立了得到保皇党和新法西斯党在议会中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清一色政府。

意大利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从它们没有导致内战这个意义来说,是和平的。但是,这些事件肯定不是平静的和不流血的,它们有极为严酷的斗争,尖锐的危机和冲突,深度不同的分裂或分裂的危险。因此,选择民主道路并不意味着幻想社会平稳地、毫无动荡地从资本主义进化到社会主义。

我们也一向认为把民主道路简单地说成议会道路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染上议会迷症,而有人却染上了反议会迷症。我们认为议会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不仅在今天是这样,而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议会制度的产生和革新在意大利是一个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首先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因此不能象列宁时代曾有过而今天又可能在一些国家发生的那样,把议会仅仅作为一个揭露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弊端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讲坛来看待和利用。在意大利,议会首先是工人运动的代表在政治和立法方面发挥和实现自己倡议的地方,设法影响国家的政治方针和确立自己的领导作用的地方。正如陶里亚蒂所说,如果议会日益成为“国家的一面镜子”,如果工人运动的各个政党的议会活动同群众的斗争、社会上民主权力的增长、民主和宪法原则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机构得以确认结合起来,那么议会就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们遵循这一明确的方针进行了许多斗争,争取共和制和宪法,争取给妇女投票权以实现充分的普选,保卫比例代表制的原则,反对取消该原则,经常确保两个议院的权力,反对政府和其他经济、政治和行政权力中心企图限制和取消两个议院权利,争取使议会所有民主力量之间毫无阻碍、毫无歧视地进行自由辩论的原

则和实践得到确认。我们为争取设立大区和使地方机关的自治和权力得到尊重而进行的斗争,过去和现在都是遵循这一方针的。

但是,我们的民主战略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工人运动决心把自己的斗争保持在民主法制的范围内,并不意味着陷入一种合法主义的幻想,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下述基本任务:即不论参加政府还是处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都要促进人们采取不断的行动争取以民主方式深刻地革新国家的法律、制度、结构和机关。我们的经验本身——这种经验早在别国经验之前就有了——就是要我们始终记住,必须把争取革新国家的一切机构和权力的斗争,同争取经济和社会改造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应当体现在下列两方面的行动:一方面,努力加强能启发人们自觉信守宪法的思想和与劳动人民密切联系的感情,使之日益广泛地深入所有的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之中;另一方面,则要促进人们采取使司法机构、武装部队和所有国家机关在组织方面和活动方面实行民主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这种行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使社会的民主改造进程不致采取片面的方针,不致造成改造过程所涉及的阶层同涉及不到的阶层或持敌视立场的阶层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极其危险,并可能变成致命的。

总之,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能否胜利的前景,在于工人运动除根据国际形势以外,还能否根据各种形势和每个时刻存在的具体力量对比作出自己的选择和权衡自己的行动,在于它能否不断地注意改造的行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国家的结构及机关、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态度和倾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引起的有利反应和不利反应。

这样就重新提出了估计力量对比、联盟政策和社会改造与经

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准则问题和政治队伍问题。

## 通过民主道路改造社会， 需要力量和民意支持

我们看到，民主的道路不是笔直的，也不是没有痛苦的。一般说来，工人运动的发展，不管其斗争形式如何，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不断高涨，总是时高时低的；在前进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阶段的任务就是巩固已取得的成就，而且也有这样的阶段，即必须善于退却，以避免失败，集聚力量并准备条件以便继续前进。这不论是在工人运动作为在野党进行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夺取政权或参加政府的时候都是适用的。

列宁曾经写道：“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列宁本人无疑是最敢于正确进攻的革命领袖，而且他也最敢于及时抓住巩固和退却的时机，利用这些时机来争取时间，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前进。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列宁的这种天才：一个是同德帝国主义妥协，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另一个是同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妥协，这是在新经济政策名义下所实行的方针的特点。不要忘记，列宁是反潮流、毫不迟疑地作出这种抉择的。当时这两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对拯救苏维埃政权和保障苏维埃政权的前途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两个行动是在

<sup>①</sup> 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

不可能重演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但是,这种行动在远见卓识和通晓策略方面所给予的教益,至今仍是完美无缺的。

革命力量的目标,即对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现实进行具体改造的目标,依靠单纯的愿望和最富有战斗性的那部分劳动群众的阶级自发冲动是不能达到的,必须始终根据可能性采取行动,把战斗性和决心同谨慎和灵活机动结合起来。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依据是确切了解各个时期的力量对比的状况,更一般地说,要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全貌,绝不要片面地孤立地看待某个方面。

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就是逐步改造经济和社会的整个结构,改变国家的含义和指导思想,改造政权的体系和体现这个体系的社会力量集团;在意大利,这种逐步改造可以在反法西斯宪法范围内实现。可以肯定,我们要通过民主道路在意大利实现的这种全面改造,在各个阶段都需要力量和民意支持。

力量应该通过保持警惕表现出来,通过劳动群众的战斗性表现出来,通过坚决地及时挫败——不论是处于执政或在野的地位——对自由、民主权利和宪法的阴谋破坏和进攻表现出来。由于认识到这种种不可忽视的必要性,我们一贯提醒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保持警惕,并且将继续这样做,反对任何幻想或天真,反对低估右派势力的进攻企图。同时,我们也让民主的敌人不要存有任何幻想。正象隆哥同志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重申的那样,怀着冒险企图的人要懂得,正象我们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做的那样,我们党通过号召所有的人民力量和民主力量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会在任何场合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

通过民主道路对社会进行深刻改造所需要的民意支持具有十分明确的含义:在意大利,这种改造只有作为大多数人民的革命才

能实现；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意支持和力量才能相辅相成，变成一种不可战胜的现实。

## 联盟是任何革命政策的决定性问题

不论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即使是最先进的斗争形式，或甚至是残酷的斗争形式，力量和民意支持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必要的。我国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武装斗争的运动，由于它依靠全体人民民主力量的团结，由于它善于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能够进行抵抗并取得胜利。此外，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各种反民主的运动和法西斯本身也不能只靠使用反动的暴力来加强自己和取得胜利，而必须有一个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和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国家里。人们甚至会自然地想到，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强制和镇压的手段（从最残酷的手段到最巧妙的手段）来维持，而且要靠或多或少伪造出来的民意支持这个基础、靠一定的社会联盟和政治联盟的体系来维持。

所以，联盟问题是每个革命和每项革命政策的决定性问题，因而对于民主道路的胜利来说也是决定性的问题。

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必须根据这样的认识行事：即已经形成并且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阶层和政治成分。

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坚强的无产阶级的形成。长期的斗争经验（我们几乎进行了一个世纪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育工作和共产党五十年来对这个阶级的决定性的影响，都使无产阶级特别成熟和具有战斗性；这个阶级是促进社会改

造的动力，然而它在我国的人口和劳动人民中一向处于少数。几乎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差不多都是这样。

实际上，在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个根本对抗的阶级——之间，已经在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一个中间行业和中间阶层网，人们往往把他们通统称为“中等阶层”，实际上，必须区分和具体确定每一类中等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具体状况、作用和思想倾向。

在我们的社会里，在这些中间阶层、中间行业和无产阶级身旁——往往是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人民阶层和社会力量（例如，南方和岛屿的居民中、妇女群众和青年群众中、科学界、技术界、文艺界的力量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从“行业”的范畴来说，这些阶层和社会力量按其本身是不能等同视之的，可是，除了他们的职业地位乃至他们所属的一定的社会阶层之外，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共同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联合起来。

非常明显，我们所进行的争取改造和革新我们社会的民主斗争的结果，取决于这些群众、这些中等阶层和人民阶层所处的地位、意向和活动方式。也就是说，十分明显，对民主发展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些社会力量究竟是转变为支持工人阶级还是反对工人阶级。

从意大利上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出关于我们现阶段的政策结论，而且我们还可确定有关南方、妇女、青年、学校和文化等问题以及中间阶层的作用在意大利革命中所处的地位的一些有力的论据。

关于这些问题，在我们党最重要的文件——1956年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声明”中作了肯定：“为反对垄断资本和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他们不再只是同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还同农村中自耕农以及城市中相当一部分从事生产的中等阶层，客观上正在形成目标的一致，这就有新的可能来扩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革新的工人阶级联盟体系和群众基础。

“构成中等阶层的是这样一些社会阶层：它们随着不同的经济特点和社会特点，随着各地区不同发展程度而互不相同。虽然必须根据各地区的情况分别深入研究，但工人阶级同城乡中等阶层结成永久联盟的可能性是由它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决定的，这种一致的根源在于历史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现有的结构……

“另外，必须知道，对中等阶层的主要集团来说，向社会主义类型的或社会主义的新关系过渡，只能根据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自由的意愿来进行，而且只有在一个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社会中，他们的经济活动才会得到保障。”

所以，改革战略只有在联盟战略的支持下，才能够确立和取得进展。况且，我们曾强调，在改革和联盟的关系中，联盟是决定性的条件，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联盟缩小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扩大了，那么这种改革总是无法实现，整个政治形势就会倒退，甚至彻底改变。

联盟政策当然以谋求工人阶级同其他集团和社会力量的当前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的一致为自己的出发点。但是，不能公式化地、静止地看待和进行这种探求。就是说，必须提出要求和奋斗目标，具体地给人民阶层和社会力量及其集团指明可靠的前途。这个前途以新的形式确保，并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他们在社

会中的作用，但是要在另一种经济发展中，而且是在更公正、更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中这样做。为此目的，必须努力促使这些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思想发生变化，以便在全体人民当中使个人主义或行会主义的观点日益淡薄，而加强保卫个人和集体利益的日益社会化的观念。

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于谋求同那些特定的社会人物和经济行业联合，而且要把成批的居民、把无法划分成阶级的社会力量（如妇女、男女青年、南方人民群众、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到一个广泛的联盟阵线中来，我们不仅要提出经济和社会的目标，而且也要提出文明发展、民主进步、确立人的尊严和扩大人的多种自由的目标。我们就是这样理解为创造和准备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基础、条件和保证而进行具体工作的，而且我们也就是这样进行这一具体工作。

我们在政治上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使一个深刻改造社会的纲领——它必然会引起落后集团的各种反应——在实行中不致把中等阶层中的许多人推到敌对立场上去，而是要在执行的各个阶段中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应当使意大利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学者加倍努力去探讨）。显然，这就要求细心选择社会改造的优先目标和时机，所以也要求不仅努力避免经济崩溃，而且在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关键阶段，要确保经济发展的效率。

这确实是一个劳动者的力量和人民力量的政府所面临的要害问题之一，而且对象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意大利，象我们这样一支早已摆脱纯粹宣传性质的伟大力量，从现在起就要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以群众压力和政治团

结行动为武器,迫使实行一项社会改造纲领。

## 为何意共主张民主代替,而不是“左翼”代替

如果说民主革新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实现的话,那么,就不仅需要一项广泛的社会联盟政策,而且也需要一定的政治关系体系,这种关系要有助于各人民民主力量间的汇合和合作,直至实现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盟。

另一方面,在人民中有基础的那些政党(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也感到它们代表自己)之间的对立和对抗,都会导致分裂,并且使国家真正地分裂为二;这对民主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会毁掉民主国家继续生存的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一向认为——今天智利的经验更加强了这个信念——,在那些从中间直到极右政党结成集团同劳动人民政党和左翼力量的团结相对抗的地方,单是这种团结的条件并不足以保卫和发展民主。在意大利,中心的政治问题过去是、现在更加是这样的问题:即避免中间派和右派在组织上牢固地勾结到一起,避免形成一个广泛的教权法西斯式阵线;相反要能够使那些处在中间状态的社会政治力量转到始终如一的民主立场上来。

显然,在我国要保持日益增大的要求改变现状并且实现这种改变的压力,则左翼的团结,左翼的政治力量和选举力量以及左翼各个不同的、自主的代表之间的日益加强的一致,就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认为左翼政党和左翼力量只要能获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和议席(虽然事情本身会是意大利各党派之间力量对

比的一大进步),就能够保证代表这个百分之五十一的政府的生存和活动,那完全是幻想。

因此,我们不说“左翼代替”,而说“民主代替”,这也就是具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民力量同信仰天主教的人民力量以及具有其他民主倾向的力量合作和一致的政治前景。

我们坚持提出这个前景已成为来自各方面的争论和批评的对象。但事实是,没有一个批评和反对我们的人过去和现在能够指出另外一种站得住脚的前景,使意大利摆脱由于分裂人民民主力量的政策所造成的危机,解决那些现有的庞杂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文明问题,并且确保我们共和国的民主未来。

此外,很清楚,那些想抹杀我们所提出的前景的争论和企图,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能够阻止在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思想中、在人民群众的实际运动中确立这个前景,也就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在政治生活中、在政党中确立一样。这证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一天比一天更成熟,更迫切。如果没有人能够提出另一种同我们所提出的一样有效和可信的民主代替的话,那是因为在意大利没有其他的代替办法。

## 同天主教界开展对话和讨论的三个方面

我们同天主教界的对话和讨论的政策必然要在不同方面、同不同对话者进行。

首先提出的是在意大利存在着天主教及天主教同国家、同世俗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政治

路线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问题是同那些人数越来越多地投入劳工运动、并且具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向的天主教运动和派别寻求一种更加广泛的互相了解和真正的一致。

可是，人们肯定不能回避象天主教民主党这样一个政党的存在和力量所造成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天主教民主党除了它赋予自己的“天主教”这个资格外，还吸收并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

《再生》杂志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研究和考察了天主教民主党问题的各个方面。请读者去读这些文章，这里我们只限于谈谈问题的基本方面。

应该防止的主要错误就是把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和所有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政党都看成几乎是脱离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认为它的本性决定它不论何时何地都总是或总要变成一个同反动派站到一起去的政党。真正可笑的是，那些企图爬上讲台给一切人上马克思主义课的夸夸其谈的人，向我们作的关于天主教民主党的全部分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对天主教民主党的判断，同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对自己的党的判断，同样也有很大的距离。这些领导人改变了上述内容，但仍然用我们已批评过的那种脱离历史的方法，把天主教民主党说成是这样一个政党，即“就其本性来说”，是自由的保卫者，是民主进步的旗手。实际上，我们所举出的这两种说法都缺乏真正的严肃性，并且纯粹是托词。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或者只要想以政治严肃性为根据的标准——在于要按照天主教民主党所处的和据以从事活动的政治历史环境以及它所代表的复杂的政治社会现实来看待天主教民主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这个党

的方针和实践发表意见和切实施加影响。

我们一贯十分注意天主教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集团对天主教民主党政策的重要影响,在某些时刻,则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天主教民主党内和它的周围,也有另外一些社会经济力量和利益——从中等阶级各阶层的利益直到各人民阶层、农民、青年、妇女乃至工人的利益,这些人民阶层人数众多,特别在我国某些大区和地方是如此。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和愿望所产生的影响和要求,在天主教民主党的政策和生活中已经或多或少地令人感觉出来,并且有可能使这些影响和要求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除了天主教民主党的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社会成分以外,天主教民主党的起源、历史、传统和过去及现在都在这个党内起作用的各种政治思想派别——从那些反动的、保守和温和的派别直到民主和进步的派别——也都应加以考虑。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何以这个党的历史发展是十分曲折的,并且往往表现出相互敌对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是作为人民的、民主的和世俗的政党而建立的,最初它反对法西斯运动,后来转而支持并参加了第一届墨索里尼政府,接着它又退出了政府,经过一番艰难困苦,参加了地下斗争,并且全力以赴地直接从事抵抗运动,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力量站在一起并同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后来,全国解放了,成立了共和国,制定了宪法——这是三大群众性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达成协议的成果,正是这个天主教民主党在冷战初期欧洲和全世界产生的分裂气氛中,成了分裂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结成的执政联盟、分裂工会统一,破坏反法西斯力量之间一致的元凶。也正是这个天主教民主党从那个时候起就推行一种同

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人和人民运动对立和正面冲突的政策。工人阶级、雇农、农民、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战斗力和我们党的顽强精神击败了天主教民主党的这项政策，我们党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精神从未背离过自己的团结政策，为民主运动和国家的前进重新开辟了前景，并且也在天主教民主党内造成了一种新形势。实际上，尽管天主教民主党保持着自己路线的保守和温和的性质，但是它已无法再使国家处于从上到下的分裂和正面冲突的局面。当天主教民主党分子塔姆布罗尼铤而走险，策划极端的阴谋，妄图恢复那种局面时，很快就被强大的团结的人民运动推翻了，而且被他自己的党清洗了出去。不仅如此，当天主教民主党这条路线被击败以后，它又通过试验中左路线施行一种新阴谋，来孤立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它在这方面也遭到了失败。

天主教民主党现在还没有摆脱它要在人民和国家中确立分裂路线的各种企图的失败所造成的前景危机。它注意到，玩弄对抗和冲突手法，不论对大家来说还是对它自己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可能充满致命的危险，但是，它也还没有能够坚持不懈地走一条相反的道路。这正是造成我国深受其害的那种危机的一个决定性原因。

## 走向代表人民大多数的各种力量之间 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

怎么办？我们应该设法把事情朝哪个方向推进呢？从我们对天主教民主党的社会成分和政治活动的概述中就可以看出，这个

党不仅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而且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实体；这种变化不仅是由它内部的辩证情况所决定，而且更多的是由国际和国内事态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由各阶级之间和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由工人运动和意大利共产党对形势的影响所决定，由它们的力量、政治路线和活动所决定。可以想一想最近的事件，即安德雷奥蒂政府的倒台：人民群众的积极抵制、在野的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团结行动、社会党的斗争和天主教民主党内一些集团、派别和个人的斗争粉碎了中右联合政府，并造成了这种形势：天主教民主党内部原来使安德雷奥蒂执政或支持他的那个多数派不存在了。天主教民主党不得不抛弃中右路线和中右前景。

由于天主教民主党的现实和今天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象我们这样的党的任务显然只能是大力地孤立和击败这样的派别，它们指望或者可能受到别人诱导而去指望国家出现对立和从上到下的分裂，或者坚持一种有害的反共的、排斥异己的思想立场，而在意大利，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分裂国家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相反地，要努力使这样一些派别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直到占据优势，能够以历史的和政治的现实主义态度，承认所有人民力量之间实行建设性对话和一致是必要的，并且时机已经成熟。这并不意味着混淆或者否认这些力量各自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特点和差别。

当然，我们首先懂得，走向这种前景既不容易、也不能匆忙。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为了确立这种前景，各个方面——不仅是我们党——还须下定决心耐心地进行多少次频繁激烈的斗争。但是也不要以为可用的时间是无限的。由于我国的问题严重，由于反动派的冒险迫在眉睫，由于需要最终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革新和民



主进步打开一条可靠的出路，实现妥协——可以称之为团结和代表意大利人民大多数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就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成熟了。

(译自贝林格《共产党问题》〔1969--1975年言论集〕第二卷，意大利联合出版社1975年版)

# 建立一个新欧洲

在布鲁塞尔西欧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

(1974年1月26日)

亲爱的同志们，我给你们大家带来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兄弟般的问候，同时我特别感谢比利时共产党的同志们为这次会议做了出色的组织工作。

我们的会议本身就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在这次会议召开时，它的重要意义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浓厚的乌云笼罩着我们这些国家的上空。千百万劳动者，数以百万计侨居国外的劳动者，最富有责任感的力量都对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以及遥远的未来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危机、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货币的混乱等威胁也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出现了。难以捉摸的气氛笼罩着未来。

意大利是受经济形势恶化打击最重的国家之一。劳动群众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这尤其是因为物价不断上涨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所致，与此同时，对工作岗位能否保住的担忧也增加了。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客观存在的老问题未获解决的反映，但也是现政府严重无能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企图把目前危机的重担转嫁给劳动者的一种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努力把自己的斗争推向更高的水平，不仅为保卫劳动者现有的生

活、工作和工资条件而斗争,而且为要求在投资政策和消费政策方面采取改革措施和新的方针而斗争,正如我国人们所说的那样,这种措施和方针应当促成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也应当对付并挫败日益猖獗的法西斯暴力活动和最反动的社会政治集团的企图,这些社会政治集团利用就离婚法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机会企图使政治形势向右转,并为用专制办法解决当前国家经历的危机开辟道路。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各国内部性质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才具有各自的面貌和特点)。整个西欧也应当正视近二、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新问题,并作出对今天,特别是对明天有重大意义的抉择。在欧洲的这一部分,复杂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涉及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各个国家。正由于以上这一切,人们才对我们这次会晤感兴趣,我们这些党也就因此负有责任。

这次会议之前也曾通过巴黎、罗马、埃森和日内瓦的会晤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工作。会前的一系列会晤是为了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货币危机,工人和人民斗争的新内容,移民,文化和知识分子等问题。这些问题既表明各国关系的特殊性,也表明在西欧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广泛性。这些会晤强调各国共产党要本着高度团结精神为当前这些重大问题寻求共同的答案。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个大厅里洋溢着这种团结精神。

## 两点要求

团结精神是从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的两点日益紧迫、日益成熟

的要求中产生的：一是要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讨论并采取共同行动；二是要求努力促使资本主义欧洲各国和整个资本主义欧洲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民主力量和左翼力量在完全尊重各自特点和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取得一致意见并达成协议。今天压在我们各国头上的危机，要求我们怀着坦荡的胸怀，从上述两方面加倍努力，勇敢而主动地行动起来。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力量，不管其重要性如何，都休想单枪匹马地给这些摆在桌面上的严重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

目前危机的罪魁是那些老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政策有把欧洲大陆的这一部分引向经济、文明、文化和道德衰退的危险。工人运动和全体民主力量有责任为避免这种前景而斗争，为通过一个改造和革新进程摆脱当前危机而奋斗。这就是说，我们对其他民主力量和左翼力量、首先是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对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力量和组织所推行的团结政策，既不是策略，也不是别有用心。

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可能性今天空前巨大，这是因为冷战政策的失败使工人和人民力量中间长期存在的旧日隔阂和抱有偏见的分裂变成不合时宜的东西，同时也是由于团结一致的运动和斗争获得发展。共产党人在共同探讨中提出了把整个工人运动的斗争引向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的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党对社会主义的前景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这些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具有的特点问题，已逐渐取得广泛一致的看法，这一点已经就是意义重大的了。这种广泛一致的看法，首先涉及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肯定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充分实行。这种一致看法包

括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和承认保障个人自由，还包括国家世俗性的原则，国家民主结构的原则，多党制的原则，工会自主的原则，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以及研究自由和文化、艺术、科学活动自由的原则。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想法，即：使经济问题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要保证生产和就业的高度发展，还要保证实现经济干预的规划化，这种规划化应规定和依靠各种经营管理形式和中心——既有公营的又有私营的——共同存在和互为补充。

## 争 取 缓 和

袭击着西欧的危机无疑是大规模的，它不论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还是对自由和民主体制都充满了十分严重的威胁，西欧许多国家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要采用专制的解决办法的倾向，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当今的危机可以并且应当成为工人运动和欧洲各国人民中所有最先进的力量开展如下斗争的一个机会：这一斗争可以为促使欧洲的生活以及欧洲在世界上的行动朝着民主、进步与和平的方向发生深刻变化而开辟道路。

在民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一前景，可以越来越成为所有左翼力量相互对话的积极而富有成果的依据，这是对我们所作的努力的一个重要贡献，我们感到，我们所作的这种努力对于促使这些左翼力量开始新的进程，以便有朝一日达到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状态这一伟大目标是必要的。

目前形势的产生有不可扭转的根本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对第

三世界各国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旧制度发生了危机，这一原因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解放进程是一个伟大的积极因素，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史和人类的整个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同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的趋势中，确实也产生了一些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来说是困难而复杂的问题。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只有通过开展争取深刻改造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斗争，同时还要通过争取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新型的合作关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中东的例子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它表明西欧各国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应当采取切实支持他们的已得到联合国决议承认的权利、完全平等和相互合作的新态度。这既是出于正义，也是为了维护他们最起码的利益。

因此，国际因素和民族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民族因素和欧洲因素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利用和操纵能源危机、农业危机和食品危机以及货币危机和外汇危机，既是为了保持、可能的话则是扩大它们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是为了削弱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保持和扩大他们的霸权范围。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美国这样做，旨在打击西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挥任何可能的自主作用，阻止西欧社会制度的改造。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紧迫的要求，即从肯定欧洲本身在世界的作用方面和革新欧洲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积极回答这种挑战。

为了促进我们认为不仅不可拖延、而且已经成熟的变化，必须

满足的第一个要求是：西欧必须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通过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始终不渝地、最坚决地为发展缓和与和平共处而努力；不仅要把和平共处视为解决现有冲突和建立安全体系的办法，而且要把它看成建立一种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国际关系制度的条件。这些重大问题是：从裁军问题到能源和食品来源问题，从维护和改造自然环境到每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问题，以及反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

欧洲可以为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其办法则不是反对美苏协议，这些协议对捍卫世界和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开展自己的自主活动，以促进包括军事方面的缓和，通过建立安全与合作体系，为克服欧洲分裂成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开辟道路。西欧可以并且应当在这种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确保其经济发展，而这这就要求西欧既同美国、又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的国家建立新的关系。因此，一个民主、独立与和平的西欧的世界作用可以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西欧应是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相反它应当愿意同美苏两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今天在这方面有一件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即：为迫使完全推行关于越南的和平协议而重新开展一次团结运动。这一协议恰恰是一年前在巴黎达成的，但仍遭到同美国勾结在一起的西贡政府的蓄意破坏。

争取实现上述和平目标的行动以及争取民主革新和社会制度改革和行动，都要求并且促进所有左翼力量、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之间接近和谅解的进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打败纳粹与法西斯以来，几乎过去了三十年，但欧洲的这一部分仍受到一些法西斯制度的玷污和威胁。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希腊人民和葡萄牙人

民表示我们的全部声援。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所有民主力量采取共同行动,以便把这些法西斯温床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并使它们尽快停止对欧洲空气的污染。

## 新的道路

显然,建设一个反法西斯、民主与和平的西欧不是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和与它相联系的政治力量所能解决的任务。这样一个西欧要在经济上取消对美国和跨国公司的屈从态度,要消除同第三世界各国任何新殖民主义式的关系,要沿着民主和进步的道路前进。只有各国人民积极参加,只有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在必须同保守而反动的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个国家内,在共同市场的范围和体制内,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范围内取得新进展和采取新行动,这一任务才能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的合作目标。我们既要使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也要日益加强同所有民主和左翼力量的合作。欧洲和世界的条件今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要翻阅一下地图就足以看清在我们这片大陆上从易北河向东和向南都存在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意义了。这些国家依靠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证明资本主义所能有的发展目前已达到极限的那些困难的时刻,却能通过探索、克服困难和革新活动成功地使自己的经验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我们确信:社会主义的进展,在我们所处的欧洲这一部分,还是要求探索与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的新道路的,这些道



路既完全符合各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又完全符合欧洲大陆这部分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

三十年前，共产党人已经表现出他们善于成为反对法西斯的团结斗争的主要力量。今天，有条件使共产党人成为一种为了同所有其他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一起给本国人民创造和平与进步的未来，建设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我们希望它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劳动者的欧洲而行动和斗争的决定性因素。

(译自贝林格《共产党问题》〔1969—1975年言论集〕第二卷，意大利联合出版社 1975 年版)

# 在西欧发达国家战胜资本主义 的各种新道路

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  
的米兰青年集会上的讲话

(1976年6月6日)

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和我本人向你们，米兰的劳动者和青年，致以亲切的问候。法国共产党的同志，法国的十万劳动者和青年男女，以及我们许多侨居法国的同胞向你们，向意大利全体劳动者和意大利共产党人表示亲切的问候。前两天，他们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具有空前政治意义的集会。6月3日在巴黎的庞丹门举行的那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不限于重申法意两国工人、劳动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紧密团结和深厚友谊，因为在那次集会上再次提出并强调了两党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共同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倡议。

青年男女是社会的一部分，我认为，应当把他们看成是社会上对欧洲工人运动最先进的力量所作的这一选择最富有好奇心的一部分，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此最关注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对接受新事物最关心、最敏感，也最乐于为促进这种新事物的发展而努力。

我不想过多地详细说明我们向西欧工人运动提出的选择的所有方面。这一选择的出发点是：认为在西欧发达的社会中战胜资

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也业已成熟。这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最先进部分的要求，而且也是广大劳动群众和其他人民阶层(妇女、青年、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等阶层)的要求。

为什么这一要求如此广泛地表现出来呢？这一要求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但在意大利、法国乃至其他西欧国家肯定是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更为明显的。其原因在于：虽然剥削、奴役和压迫继续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阶级的状况中表现出来，但这种现象已经扩大，甚至危害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他阶层的生活条件，尽管程度不同，形式各异。事实上，今天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和衰落。在经济生活中，生产的下降和急剧的通货膨胀日益频繁地交替出现，或者象近几年来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在有些国家，人们试图避免前一种现象(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后一种现象，因为生产刚刚有了一点恢复，物价的水平就迅速地升上去了；反之，当人们设法制止通货膨胀时，又造成生产和就业的新的下降。

因此，首先是经济生活的危机和衰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的危机和衰落，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统治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则呈现出一片荒凉；混乱和无能统治着文化机构和地方与国家的行政部门；人们越来越感到涣散和无组织状况的严重性，特别是民用设施的贫乏，社会服务事业的缺乏或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是在公共生活中道德观念的丧失日益普遍，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我想你们都知道，所有这一切都不仅是意大利的特点，不仅是我国的一种现象，它也扩大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不仅产生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困难，而且也引

起了不满、不安、忧虑、沮丧，使人走向绝望，陷入个人主义的小圈子和幻想逃避现实。总之，可以称为人类今天的不幸正是由此产生的，而青年人特别敏锐地感觉到这种不幸。

但是，由此产生的也有一种要改变现状和以不同方式更平静地、更幸福地生活的强烈愿望，而且甚至愈来愈是一种坚定而自觉的意志。诚然，这需要花费力气，需要付出劳动，进行学习和投入斗争，但是人们可以安心地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到：生活又重新有意义了；生活是值得信仰的东西；有许多应当追求的目标，并值得为此而斗争；人们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以至于他们可以为大家所承认的幸福目标而共同奋斗。

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摆脱资本主义和走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这一必要性是从何而来的，这对于我们这些经济最发达的西欧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更高级的社会既能不断促进生产力、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毫无浪费地利用一切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同时又能普遍地、在更高的水平上保证人们的物质需要，特别是确保人们已经失掉的、今天又感到最为缺乏的东西：即真正的人的共同生活。

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道路吗？首先我们回答道：从原则上来说，这条道路不可能不存在。但我们随即又说，甚至从事实上来看，许多事情、许多迹象都向我们表明：这条道路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补充一句：这条道路不可能是什么现成的公式，不可能是追随、模仿、重走别人已经走过和试验过的道路。

在资本主义西方，迄今试验过的道路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我们对所有这些道路并不是采取蔑视的态度，一方面因为我们知

道有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它们不同于意大利，在那里几乎整个工人运动是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和代表的，另一方面因为某些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进行的某些试验有时使物质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当然，我不是指那个小小的、软弱的、没有生气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我要立即说明这一点，以免产生任何误解）。

但是，主要之点是：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试验没有一个真正战胜了资本主义，也没有一个真正克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问题，即大经济和金融垄断集团的统治。千真万确的是，甚至在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十年的一些国家，也依然有“新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危机的一切典型表现和所谓“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一切典型表现。这就是说，那些试验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仍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内。

恰恰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所以今天在许多国家（如德国、瑞典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特别是那里的青年人，对如何超越迄今这些党所做的试验和所遵循的公式问题重新思考，发表批判性的意见并进行探讨。目前令人痛苦的冷战时期已经结束，上述情况就使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对话和会晤有了可能（我们在巴黎也同法国同志一起重申了这一点），正如这使共产党同具有其他观点和思想倾向（如基督教的观点和思想倾向）的劳动人民、青年和知识分子进行会晤有了可能一样。但是，我们不是以向后看的精神来寻求这种对话和会晤，我们寻求对话和会晤也不是为了倒退到我上面谈过的观点和试验上去；这种观点和试验有其光明面，也有其阴暗面，无论如何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我们是以向前看的精神来寻求对话和会晤，我们这样做是为

了前进,也就是说,不是追求已经失败的解决办法,而是去寻找能取得成功的其他解决办法,亦即能真正战胜西欧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

因此,这些道路不能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但也不能是东欧或亚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在那些国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掌握社会和政治的领导,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是从特别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出发的,是从以稀少的自由和民主传统为特点(除了某些例外的情况)的政治和文明条件出发的。尽管如此,所有共产党人(我相信,不仅是他们,而且还有劳动者、民主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当中的最先进部分)都不会忘记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正是苏维埃俄国通过十月革命第一次在全世界打碎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锁链。他们不会忘记也没有忘记,苏联为战胜那些曾经压迫欧洲并威胁世界的纳粹和法西斯暴行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以牺牲与鲜血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也许是最大的),始终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他们不会忘记,也没有忘记,相反他们是关切地注视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时间和条件下,在社会、文化和科学等许多方面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伟大成就。此外,也不能否认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执行彻底而坚定的和平政策。

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些经验中也有缺点和可批评的消极面,特别是在有关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上,因为这种政治制度限制一系列的自由。我们认为,这是同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充分实现一切自由的观点相矛盾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西方各国,亦即在经济和工业发达、又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国家,在工人阶级成为民主、捍卫和发展民主、扩大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

的支持者和宣传者的国家(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这种经验是不适用的,不可行的。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有阶级局限性的,也就是说,这种局限性在于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事实过去和现在都推动我们为克服这一局限性而斗争,亦即为改变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那种社会关系、为扩大劳动阶级的权力和使之更多地参与国家领导而斗争。但是,为争取这些目标而斗争,过去没有促使我们、现在也决不可能促使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如选举权、结社权、言论权)可以受到限制。我们没有这种想法,这不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我还想补充一句,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这样写过(且不谈另一件事,即: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经院式的学说,而是应当发展的、生气勃勃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应当运用的一套公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限制自由和民主是不符合工人阶级、首先是我国工人阶级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工人阶级今天的觉悟水平的。

这就是我们谈论一条不同道路的原因。这条道路不仅涉及司法和政治制度,而且也涉及经济制度。事实上,我们主张经济民主规划,也就是说这一规划除规定国营企业的存在和承认其作用外,也规定私营企业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承认其作用;但是,这一规划也应当指出据以活动的新的明确的范围(这一需要在意大利是特别突出的),也就是说,应当保证不再依照资本主义逻辑(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逻辑)来经营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巨大需要,满足全国集体的巨大需要而经营和生产。从改造社会的

这一观点中产生了我们有关如下问题的其他立场：联盟政策；承认多党制；多数派和反对派可以轮流执政；自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首先是工会自主的作用；国家生活中的自治和分权；经常鼓励公民及其团体和组织以民主方式日益广泛地参与那些涉及自己生活条件以及集体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决定的制定和执行。

我们的某些反对者想使我们难堪，居然向我们提出下列的问题：我们那条通常被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道路，那条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当真能实现吗？是有具体的可能吗？今天，被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那条道路，由于我们同法国同志以及其他党的同志一起，逐渐明确地指出它所具有的属于西欧各国的共同特点，它所涉及的范围正变得更加广泛。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出如下的反问来很简单地回答他们：到底为什么一条与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不同的道路就不应当是可能的呢？为什么一定要亦步亦趋地模仿和照搬那些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走过的道路呢？与此相反的情况才是千真万确的，即：意大利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才能到达社会主义。

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们的某些反对者散布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都一模一样这种陈词滥调并非偶然，这是他们最无耻的谰言之一。许多事实和普通历史都说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来建立反资本主义社会的试验早就是多种多样的了。而且还可能有，也必将有其他种类的试验，这是合乎逻辑的；其中有些种类与现有的在质的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尚未在资本主义达到其发展最高峰的任何国家内开始实现。这种差异性



和新情况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历史的反常现象。实际的历史不容许固守模式。

此外，我们也该考虑一下：资产阶级革命又有多少种呢？有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克伦威尔的革命；有十八世纪末法国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有北美华盛顿和林肯的革命；有德国俾斯麦的革命；在我国则有加富尔的革命。这里只提一下这样一些人的名字，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曾在他们的周围组织起来，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程度的激进方式推翻了封建制度。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有多少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呢？有智利（我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重申我们对智利同志的兄弟般的全力支持，再次表示我们对路易斯·科尔巴兰同志的爱戴和慰问），有阿根廷，有乌拉圭，有巴西。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那么还有执行没有佛朗哥的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有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此外，还有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各有各的政治特点、社会特点和经济特点。所有这些社会无疑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们都是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但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以及它们的社会制度却是彼此十分不同的。

最后，有意大利。从民主的观点来看，意大利可能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因为同别的地方相比，在这个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更是争取民主自由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的真正主角，更是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真正主角（即我们的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新的民主国家，它拥有比先前的自由国家更加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更是为保卫这个新的民主国家，对付任何要打击它或阉割它的企图而顽强斗争的真正主角。近三十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正是这样做的。

因此，还是收起关于“模式”的傲慢态度和偏狭见解吧！诚然，我们的反对者喜欢我们成为现有“模式”照葫芦画瓢的模仿者，然而对他们来说可惜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这就是我们在劳动群众中有力量、得到居民各阶层的信任和在社会与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威信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们要告诉你们，米兰和意大利的青年男女们，你们可以确信，我们共产党人将更坚定、更热情、更大胆地沿着这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这条道路说成是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我们不是追求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主义者，不是莽撞冒失的极端主义者，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词句的公式主义者，也不是只顾眼前的机会主义者；我们不是那种驾驶小舟沿着海岸线航行的船员，我们要对付我们面前辽阔无际的大海，以便在为我国和欧洲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抵达新岸。因此，我们将作为热情地、严肃地、严格地寻求新事物的共产党人向前迈进。我们将日益加强同法国同志、西班牙同志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同志的团结，我们要去寻找与意大利和西欧整个地区的其他工人力量、民主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共同点，号召意大利青年男女群众以自己的斗争，自己的批判精神，自己的思想贡献，自己的朝气、智慧和热情参加这一伟大的革新事业。

（译自贝林格《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1975—1976年言论集〕，意大利联合出版社1976年版）

# 在柏林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议上的发言

(1976年6月30日)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也想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示我们代表团的衷心感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予了我们大家亲切的接待和卓越地组织了我们的工作，而且也因为他们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起了特别有效的作用。

我们怀着友好的感情向在这里代表全欧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同志们致敬，我们为在这一如此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场合同大家会晤感到高兴。

人们对我们的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注意和期待。千百万共产党人、劳动者、民主人士都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们都知道，这次会议对我们大陆和平的巩固和各国人民的合作这一事业的成功将作出积极的贡献，而这一事业又不仅仅是我们的事业。世界各地最有代表性的报纸和新闻界都关注这次会议，这说明人们已经感到在欧洲和世界生活的现阶段召开这样的会议有着怎样的政治重要性。现阶段是一个微妙的阶段，不缺少未知数和危险，但也可以进行伟大的积极的革新。

显然，也有某些批评家，曾企图就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决定会晤这件事兴风作浪。为什么对这件事要大惊小怪呢？难道由不同倾向的政党发起的这类会议不是时常召开的吗？

此外，我们的会议不是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会议。这种组织在世界范围和欧洲范围都不存在，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在。我们的会晤是自主和平等的各党间的一次自由会晤，它不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党下达指示和进行约束。重要的是，讨论应该是开诚布公和公诸于世的。在讨论过程中，每个党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一些问题上，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各自的立场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由于每个党所处的客观条件不同所致。当然，如起草委员会的结论所表明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也是重要的。

我们党对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感到高兴。

这次会议的筹备是漫长而艰难的，这对任何人都已经不是秘密了，在这里闭口不谈这一点是无用的。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值得考虑的积极的教益和批评性的意见。

例如，我们仍然认为，如果象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党所建议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决定各国共产党的这次会议在不制定文件的情况下也可以举行，那么会议的筹备就会少用些时间，就会更富有成效。此外，在过去所有的预备性会晤中，原应把讨论从欧洲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中产生的问题放在首位，而我们认为，我们对这样或那样提法的讨论或许拖得太久了。在我们看来，现有的经验应使我们知道，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现状要求放弃已经过时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与会各党的同志们是否赞成这一看法。但是，我们想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对我们来说，这一点

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了。

我们在指出上述情况的同时，并不打算否认起草文件工作结果的积极方面。全部起草工作是以民主方式进行的。从方法上说，最积极的方面是，承认只有按照如下三项条件才能起草文件：一是文件应局限于一些特定问题；二是应得到所有与会党的赞同；三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硬性制约——即使间接地也不应当——每个党在其国内国际路线和政策理论制定方面的完全独立。

文件内容显然没有反映各党的特殊立场。我们自己本来会对文件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的写法。然而，我们并非没有看到文件所采纳的许多观点的重要意义，从许多方面来说甚至是革新的意义。

为进一步促进欧洲大陆的缓和而努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意愿。一年前，在赫尔辛基，所有欧洲国家，还有美国和加拿大，都肯定了前几年在建立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道路上取得的成果，并就应当作为缓和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冷战的黑暗时期已经过去。冷战曾多次威胁要把世界抛进一场新的冲突之中，并且如此消极地影响了各国内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使克服冷战成为可能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顽强努力同美国和西方世界各国确立的最现实主义的倾向相汇合；反对冷战的能力；各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和胜利；各国人民在和平之中生活的强烈愿望。包括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内的不结盟国家，过去和现在也都对在欧洲和世界上建立日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需要继续开展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这些反动势力仍

在以各种方式阻挠或破坏缓和进程，或者硬说什么缓和意味着在各国内部保持旧的社会、政治均势。各国人民有无可争辩的权利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形式和自己的政府组成形式。例如，我们就在争取意大利人民在我国参加的国际联盟的范围内，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领导。

我们认为，推进缓和的主要道路是在保障共同安全、不单方面改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战略均势的情况下，发展合作，裁减军备，从而逐步达到取消集团。

在我们看来，苏美积极关系的发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但是，欧洲各国积极参加并以自己独特的首创精神来丰富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总进程也同样是重要的。

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可能性是巨大的，而且尚未充分加以利用。这种合作不仅是为了扩大它们之间经济和贸易交流，而且是为了一道解决一些共同问题，如保护环境和艺术财富，开展反对污染空气和水的斗争，发掘和利用新的能源，防治最常见最危险的疾病，科学研究。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种思想、文化流派和人员在欧洲和全世界进行更广泛、更自由的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在缓和与合作道路上日益奋勇前进的欧洲，将能够对解决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作出巨大贡献。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秩序也有助于克服作为当今世界形势特点的那种可怕的、难以接受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的不平衡。

国际主义是每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意味着它们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开展活动时，感到自己就是为争取社会和政治解

放、民族独立、和平与全人类的进步而斗争的各国劳动者和人民的全部行动的参加者和主角。

如今,这个行动完全超出了各国共产党的范围,涉及具有各种思想信仰的种种政治、社会力量。这一如此广泛和多样的运动的主要倾向,是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努力寻求今天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因此,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过渡要经历千百种困难和障碍,还要通过一个不排除出现停滞状态、甚至错误的过程。这种倾向的一些标志在欧洲以外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各大洲的人民和国家,一旦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为自己的发展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途径。其中有许多国家和人民公开倾向于选择各种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主义社会越是反映出每一个国家本身的传统和特点,越是确认劳动阶级的积极参与,就越会得到发展。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日本和西欧,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与日俱增。今天不仅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其他劳动阶层、广大青年、妇女和知识分子群众也向往社会主义。

在旧的沙皇俄国,共产党人通过1917年十月革命首先打破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锁链,从而不仅为苏联人民而且也为全人类开拓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先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道路,是在特殊的国内国际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开拓和经历的。所以,艰苦、困难,甚至错误也就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而出现了。

继这一伟大胜利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却未取得胜利,而是有过一些不幸的失败。在一些国家,首先是意大利,黑暗的反

动制度建立起来了。整个欧洲，随后则是全世界都陷入了人类历史上流血最多的冲突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牢记欧洲历史上这一整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事实是，在战胜纳粹法西斯暴行之后，由于一系列的客观与主观情况，西欧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实质上就停步不前了。当然，不可能在这里对那些主观和客观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冷战当时是一个根本障碍。

今天，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在资本主义日益明显地没有能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作出积极回答的情况下，重新提出的任务不仅是思考至今已取得的社会主义经验，而且是寻求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虽然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使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未显示出它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东欧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样板也不符合西方国家的特殊条件和广大工人及人民群众的意向。

我们的一些敌对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都是到处一样的。这是不真实的，连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也不是这样。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建设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经验。合乎逻辑的是：能够有，也应当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经验，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新的经验。这种新经验将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已达到顶点、又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以及劳动者的特殊组织形式和政治表现形式的国家。

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为恢复、保卫和发展民主而斗争的主角。我们为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肯定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并予以保障；肯定国家的世俗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质以及国家的民主结构等原则；肯定多党制和执政多数轮换的可能性；肯定工会自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文化、艺术、科学自由。在经济方面，要通过民主规划保证生产的高度发展，这种规划要利用各公有和私有经营管理形式的存在和积极作用，而所有这些形式都应当以满足人们和国家的巨大需要为目标。十分有意义的是，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他们自主的探讨，在有关实现社会主义所应走的道路以及在本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方面得出了同我们类似的结论。这些相同的意见与共同的特点，最近在我们同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共同发表的声明中都表示出来了。有人把这些新的主张和探讨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显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是它如此广泛流传的事实本身就正好说明，人们对于在西欧国家确定和实行社会主义意义的社会改造的新型解决办法的要求是何等深广。

今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强调指出主要之点。这种对新事物的探讨完全不是向统治集团让步，而是为建设性地确定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民主领导作用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同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探讨和这一斗争必须同相信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的其他工人和人民力量、同希望社会革新和进步的一切力量进行对话与谅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投身于我国这一团结事业之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并越来越看到：相互了解和会晤的新的可能性也正在欧洲范围出现。我们通过同一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欧洲一些国家的其他工人与民主力量进行的有益接触也可以直接证实这一点了。

至于我们，我们将继续在许多不同方面开展我们在欧洲的行动：在全欧范围，为推进缓和与合作贡献力量；在西欧范围，寻求同其他左翼、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最广泛的汇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方面，为使一体化进程具有民主性质并符合劳动阶级的利益作出我们的贡献。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和意大利民主力量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英勇斗争表示声援。

亲爱的同志们，在为筹备这次会议而进行的讨论过程中，有可能在有关我们各党之间关系方面制定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和准确的提法，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各党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承认每一个党都自主地制定和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国内国际政治路线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在严格尊重权利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在变革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这个基础之上。

尊重这些原则同我们所强烈感到的如下需要并不矛盾，即：需要就有关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展开更广泛的、不拘形式的讨论。比如说，下面一件事实我们认为就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赶不上当代世界现实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经验以及政治实践。我们往往只限于使用一些千篇一律的提法，热衷于引经据典，或是给任何与自己不同的立场武断地扣上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的修正主义的帽子。

真正的情况是：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领导党或领导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也就要依靠各党和个人作出多种多样

的贡献。正是根据我们伟大的导师的做法，应当号召采取批判精神，促进政策制定和实践上的不断革新，以便考虑现实历史过程的发展。

我们的意见是：要尊重不干涉原则，就不能排除，除了对国际生活和工人运动生活的具体事件之外，对别国党的理论观点或政治立场也有判断的自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虽然一贯强调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成就，但对某些事件和情况（如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对有关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等更为一般性的问题，也曾多次提出批评性的看法。

其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同志们，也曾明确地或间接地在他们讲话中或文章中，对我们的一些涉及到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如多元化问题的方针和信念采取了批评性的立场。我们虽然不同意这些批评性看法，但认为提出这些看法是正当合理的。我们甚至希望，工人运动当中能就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当然，讨论要本着友好和理解的精神，但也要采取最自由最坦率的方式。这种自由的思想交锋也可以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本来想详细地向你们介绍意大利形势最近的发展状况。意大利形势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引起欧洲和世界的很大关注。但是，我们就我们各自发言的时间达成的协议，使我不得不简略地谈一谈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主要情况。

6月20日的政治选举是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众所周知，最大的新特点就是我们党的跃进，取得了一千二百六十二万张选票，从1972年的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四，

从而超过了曾被认为是特优成绩的 1975 年 6 月 15 日地区行政选举的结果。

这一选举胜利是我们党不断积极地参加工人和人民斗争的结果，是争取民主、文明进步、社会公平、和平与各国人民团结的大规模的往往是激烈的群众性斗争的结果。这一选举胜利意味着对我们的团结政策，对我们不断努力提出并推进解决人民群众、社会和国家的一切问题的建设性办法的愈来愈大的拥护和支持。同时，这一胜利也是我们使我们党的建设具有的如下性质所导致的结果：即我们党是一个群众党，它有活跃的民主生活，能够不断更新，特别是能够制定政策，不局限于搞宣传。我们的力量和威信的一个基本来源就在于：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党员一直在努力确定和推进完全符合我国特点、符合我国人民自由和进步愿望的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我们也习惯于以批判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看待意大利整个局势和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及缺点。

我国的局势一直是十分微妙的。诚然，今天存在着新的可能性，但也有许多未知数，使我国的前途捉摸不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继续为争取我们认为是使意大利摆脱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最合适解决办法而斗争和工作。劳动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朝向一个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民主力量的谅解为基础的新的政治领导而努力。

我们深信，如果意大利能够通过这条民主团结道路克服自己的危机，这将不仅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参加我们这个半岛所属的那些国际联盟和机构的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一个革新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意大利，也将能够保证对欧洲

和世界建立推进缓和与各国人民合作的国际关系作出更积极、更持久的贡献。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坦率地、同时也是本着兄弟般的精神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再次表示我们对参加这次会议感到满意，这次会议肯定要成为一个对我们大陆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

(译自贝林格《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  
〔1975—1976年言论集〕，意大利联合出版社1976年版)

# 对意大利电视台发表的关于 柏林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议问题的谈话

(1976年7月1日)

柏林会议标志着国际主义新概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新概念比共产主义运动概念所能包含的那种概念要广泛得多，亦即这样一种国际主义概念：它包括具有不同倾向的其他种种力量，并建立在承认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差异性以及与此有关的每一个党和运动的自主性这一基础之上。

会议表现出各国共产党广泛的一致努力，特别是在促进缓和、争取巩固和平与发展欧洲合作这一行动方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歧，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整个会议情况是向报界披露的，会议是完全公开的，因而大家都可以看出各党在各个问题上所持立场，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译自1976年7月2日意共《团结报》)

## 答意大利《共和国报》社长 斯卡尔法里问

(1978年8月1日)

**斯卡尔法里问：**您是列宁主义者吗？意共是列宁主义党吗？

**贝林格答：**如果想把列宁主义这个词（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复合词）理解为被一成不变地规定下来的理论条文的某种教科书，理解为被固定成经院式定理的一大堆论点，似乎这些条文和定理应当不加批判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加以贯彻，那么，这就将会是对列宁本身（也是对马克思）的最大损害，就会歪曲他的政治教导的实质，就不能理解他向我们提供的教训并使这一教训在我们的时代中得到应有的证实。我们不是这样的列宁主义者，即使我知道，今天有许多人似乎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或者他们认为，我们正是这种因循守旧的列宁主义者。

**问：**但是，事实上，你们党的章程第五条规定，党员有义务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这表明，你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一种完善的理论。因此，贝林格先生，当您讲到您的党具有革新和创新的能力时，您同意共章程所说的就矛盾了。

**答：**党章的那个部分一直是许多年以前制定时的那个内容，所以，第五条那一款的提法是不适宜的，它会使人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存在就是一种静止不动、固步自封的理论。至于我的看

法，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句话似乎应该用另一种提法来代替，这种提法应该以更正确、更合时宜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全部思想财富。

问：谁应该决定这一问题呢？

答：下一届代表大会。

问：不过，你们究竟是不是列宁主义者呢？这不是我个人的好奇心，而是你们今天必须考虑的问题。

答：您有把握这样说吗？您能肯定，今天，也就是1978年，在意大利、欧洲和世界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情况之后，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要考虑的问题竟然是要回答我们是不是列宁主义者这个问题吗？我不是说您，而是说所有那些向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列宁和列宁主义，当他们讲到列宁和列宁主义时，是否真的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列宁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完全有生命力的，是完全有效的，他建树了真正的革命理论，就是说，超越了改良主义进化论的“正统学说”，提倡党采取自主行动的主观因素，反对实证论、“庸俗唯物论”和等待救世主降临的做法（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固有的弊端），相反却为俄国和全世界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力量开辟了革新和解放的道路。列宁粉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统治和联合；列宁在欧洲每一个角落都为争取和平与反对战争而进行斗争；列宁揭示了工业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盟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他早在1917年10月（革命）前几个月就曾“在那战火纷飞的形势下，并不排除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和多党制的长期存在”（陶里亚蒂在1956年的讲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实现完全而充分的民主的社会。列宁在



所有这些方面的教导都是有效的。

**问：**那么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主张也是有效的吗？列宁曾压制党内和苏联社会里的政治辩论和有组织的不同政见。

**答：**请等一下，让我们把问题分清楚。的确，限制内部存在不同政见在列宁的晚年就开始出现了，亦即早在斯大林上台之前就开始出现了。对这件事我们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和反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列宁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曾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站在一起反对过他的路线、甚至反对过1917年10月苏维埃起义的人物吸收到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中来。至于民主集中制，我们还是不要使用廉价的歪曲说法吧。不论如何，不要把它同它后来发生的那种“组织集中制”和“官僚集中制”的蜕化现象等同起来。这些蜕化现象同列宁所制定和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什么预先形成的一致性，而是一种能保证在党的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最后形成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在可能存在的不同立场自由地、民主地得以表达之后，占多数的立场才正确地成为全党的立场。因此，民主集中制不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压制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准则，而是应该被理解为这样的准则：它保证在内部民主讨论结束后能具备起码条件，使党能够有效地进行工作，也就是说，使党能够团结一致地、有纪律地进行工作。

应当注意：这个民主集中制在一个象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干部党中加以正确贯彻是一回事，而在一个象我们党这样的群众党中加以贯彻，则是另一回事。在我们党内，从结构上说，民主的范围和作用要更为广泛，我们党的每一个成员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可以根据党章规定，要求对他的某一项建议进行投票表

决,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亦即根据多数票作出决定。

**问:** 那么,您并不是背叛列宁……

**答:** 您可别这么说!我要补充一点,我既不想对自己所赞成的问题作出绝对化的回答或辩护式的回答,也不应当对我的回答作这样的理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有我们自己的伦理、政治的理论主张,有我们自己的历史。从我们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列宁就在我们的经验中,在我们的分析研究中、在我们的斗争中占有他的地位,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绝不是排他性的地位,绝不是教条式的地位。谁要是要求我们谴责或者背弃历史、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历史,那他就是要我们做一件既不可能而又愚蠢的事情。历史是不能背叛的,不管是自己的历史,还是别人的历史。要设法去理解它,超过它,并且要发展,要不断地革新。

我们在调整和革新我们的路线和政治行动中已经向前迈出了几步,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同我们特有的历史一刀两断,没有脱离我们的后方,没有斩断我们的根基,也没有使我们所经过的历程变成一片荒原。相反,我们发展了革命运动在历时一百三十年的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的不可抛弃的理论思想财富,这些革命运动是随《共产党宣言》而产生的;我们努力使自己适应意大利现实的每一个细节,理解和传播我国民族史的意义和方向,在新的时代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的精萃。马基亚维利<sup>①</sup>曾经说过:“如果共和国和教派(今天的政党)不自我革新,那它们就不能持久。而革新它们的方针是把它们重新引向它们各自的出发点。”

**问:** 您刚才说过,对你们的列宁主义提出问题是一种借

---

<sup>①</sup> 尼科洛·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著有《君主论》等。

口……

**答：**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挑衅。

**问：**为什么？

**答：**事实上，人们害怕这样一个意大利共产党的存在会改变我们社会和国家的旧有的权力平衡，害怕工人阶级进入政权机构（甚至最高机构）会取消旧的和新的特权，而工人阶级一直是被人使用种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暴力手段排除在这些机构之外的。为了阻止这一进程发展（不管怎样，这一进程是大大前进了），就采取了排斥共产党的做法。居然要考核共产党的民主性。于是提出了有关列宁主义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主考官们是想从我们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说我们党因为是共产党，所以在意大利是不合法的。在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是被宣布为非法的，于是想在这里也把它宣布为非法。他们想听到我们这样说：我们党成立是错误的，社会民主党万岁，社会民主党是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形式。这一来，我们的主考官们就会对我们满意地说：回答是正确的，你们把党解散了吧，你们各自回家去吧。

**问：**贝林格先生，谁是你们的主考官呢？

**答：**多年来，特别是天主教民主党硬要扮演这个角色，还有意大利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那部分人，以及那些把意大利置于监护之下的国际中央组织。我应该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天主教民主党领导集团对它的这种主考官职能已经稍有放松，然而它还是没有放弃这个职能；而且连从事生产的资产阶级的一些重要集团也对这些事情另眼看待了。国际上的否决仍然是很厉害的，同样也是不应有的。目前，意大利社会党现任领导集团居然也承担起考核我们的新的职能了。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我要毫不犹豫地说，

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事情。

问：理由何在？

答：噢，我懂您的意思了，我现在就说明理由。社会党过去犯了错误，并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社会党曾经是意大利左翼的一支强大的力量。远在1946年，它曾是意大利左翼的第一大党。后来，它走下坡路了，而我们却前进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些原因要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我已经提到过，意大利社会党没有建立起完全独立于资产阶级流派的文化，也没有建立起它自主的阶级战略。一百年前，它作为一个强大的运动，曾首先唤醒了无产者的觉悟，并且推动了人类政治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是它的伟大之处。遗憾的是，社会党缺少适当的理论建树，尽管它取得了个别重大的文化成就和政治成就。从文化上说，社会党——怎么说呢——是靠抄袭为生的，它把实证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折衷地混杂在一起。但是，同西欧其他社会党相比，意大利社会党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有明显的积极面。它从来没有把自己混同于德国式或英国式的欧洲社会民主党。

纵观意大利解放后的那个阶段，意大利社会党在同我们密切相处一个时期之后，要求采取自主，而过去谁也没有破坏过它的自主，其后它沿着这条路线一直发展到中左政策，并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合并，这使它在民意支持和政治力量方面遭受严重损失。这一经验促使社会党同志们进行了一些修正。但是，近几个月以来，似乎意大利社会党要成为新自由主义、新社会民主党乃至极端主义势力的支柱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切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社会党至今毕竟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大

党,如果它得到加强,意大利左翼也就得到加强。反之,如果它破坏左翼团结,左翼就会被削弱。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我们不想再发生这种事。

**问:** 社会党认为,左翼内部的力量对比应该改变。

**答:** 它有权这样希望。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个。但是,我们希望社会党的壮大能同左翼的全面、普遍加强一起出现,因此,也就是同左翼团结的加强一起出现,而我们觉得,社会党某些同志似乎一心只想在群众内部重新分配左翼选票。看来,社会党同志们很少关心问题的这个方面,很少关心整个左翼的全面加强,而这个方面恰恰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问:** 某些社会党人断定你们在执政方面尚未成熟。你们可以参加大联合政府,但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力量的左翼代替这个联合。他们对列宁主义提出的问题正是从这一分析中产生的。

**答:** 我已经说过,提出我们的民主“合法性”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我还可以说,意共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斗争的五十年历史,就是可以得满分的考试的证明,对此是无庸置辩的。至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我可以说,它们也曾有过见不得人的历史。法国社会民主党就进行过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并在苏伊士登陆作战。这是发生在近二十年内的事情。不提它了。左翼代替这个主张的弱点并不在于在意大利存在着一个比社会党更强大的共产党。

在意大利实行左翼代替,并不是什么稳妥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是由于其他原因。

**问:** 哪些原因呢,贝林格先生?

**答:** 在意大利,存在着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的天主教问题,同

时存在着具有同样特殊性质的共产党问题；在意大利，存在着同德国或英国或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后，意大利宪法是各种力量团结一致地制定出来的，这些力量使这一宪法过去和现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现行宪法相比，都有不同，都比它们先进。但是同时，在意大利，拥有群众基础的温和派、保守派和反动右翼相互勾结的危险，始终是迫在眉睫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左翼代替的主张变得不切实际，而不是意共的所谓列宁主义使它妨碍左翼代替而着眼于历史性妥协。我想，社会党同志们在更周密的思考时也是会了解这些实际情况的。

**问：**人们有这样的感觉：最近您似乎在历史性妥协这瓶酒里掺进了不少水。

**答：**我一点水也没有掺。历史性妥协是有意地被说成是它从来不是的那种东西。有人说：意共想同天主教民主党串通一气，压倒所有其他政治力量。我们从来不曾想过这类糊涂事。实际上，无非是搞一个廉价的靶子，好向它射击。

**问：**贝林格先生，您是否能够言简意赅地给我们解释一下历史性妥协到底是什么？

**答：**好罢。我们确信，意大利是一个需要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国家，这就是说，对结构、公共道德和社会组织来一次深刻革新。而没有各种大的社会力量（工人、从事生产的资产阶级、农民、青年群众、妇女群众）和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世俗力量）协同一致，就不可能开始和推进这些变革。共同肩负这一历史性责任并不是必然地要约束所有力量都得参加议会多数和政府。不同的政治协议形式、政府联盟和议会多数可以轮番地形成，只要始终共同负起责任，只要始终保持全国

团结，始终为互相谅解而努力，特别是共同致力于变革国家。这就是历史性妥协。因此，我断定，那些反对历史性妥协的人，有时是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隐藏着反共偏见和这样一种愿望，即：要使变革进程不致发生或者不致象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到的那样，那么深刻和彻底地进行。

问：请注意，贝林格先生：您一开头就把跟您想法不一样的人逐出教门了。

答：我没有把任何人逐出教门。所有民主立场都是合法的，所有这些立场无论是以哪种方式采取的，都值得重视。另一方面，尽管许多人反对历史性妥协，您也包括在内，但无可争议的事实仍然是：无论如何，在我们所指出的政治道路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问：但是，意共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

答：您显然指最近的地方选举。5月14日，我们确实遭到了明显的损失：这正是发生在莫罗<sup>①</sup>刚刚遇难之后，人们的激愤情绪是很大的，这使天主教民主党增加了选票；此外，选举的地点大部分在南方，而那里的政治选举和地方选举之间的差距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很大的。在6月25日一轮公民投票中，结果就已经不同了。但是，我并不隐讳：部分地方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结果都是发人深思的，事实上，对此我们已经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曾使自己对议会多数信守诺言的态度冲淡了我们对政府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批评。其次，就象您多

---

<sup>①</sup> 阿尔多·莫罗(1916~1978)，生前曾任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并曾多次组阁担任总理。1978年3月突被意大利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绑架，不久被杀害。

次所说的那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处于半途中，亦即处于反对派和政府之间。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全国都处于半途中。

**问：**这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吗？

**答：**我们参加政府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不管怎么说，紧急状态这一“非常”阶段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莫罗被绑架和遇难，我们同天主教民主党、共和党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起负起责任，坚决地回击了恐怖分子对共和国进行的攻击那些触目惊心的日子；然后是公民投票考验，再后则是总统府易人……这是惊心动魄的六个月。现在，另一个阶段开始了，即实施政府纲领的阶段开始了。当前存在着南部问题，那不勒斯问题，就业问题，青年问题，整顿公共财政的问题。对上述问题我们将是极其严格、要求极高的。政府知道，如果纲领不按照一致商定的时间和内容加以实施，我们就随时准备退出议会多数。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呆在议会多数里是心安理得的和高兴的，因为在这个联合当中我们就证明自己是“合法”的了，那他就打错了算盘。我们参加议会多数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贡献是重要的；但是一旦我们看到这个多数不能胜任它的任务和履行它据以建立的诺言，那我们就不会留在议会多数里。

**问：**1979年将是欧洲年，您在意共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说过，意共已经作了彻底的欧洲选择。您能证实一下吗？

**答：**我是这样说过。我们知道，欧洲一体化进程，至少就目前来说，主要是由依然同资本主义结构密切相联的力量和利益推动的，而我们则要变革资本主义结构。我们知道，由那些力量推动和领导的超国家一体化进程束缚了各国的变革过程。这就是原因，这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原因，正由于这个原因，比如说，法国共产



党人,还有法国社会党人,才很有保留地去看待加速欧洲共同体的货币、经济和政治统一过程。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必须推进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团结,而且这一目标带来的挑战应当予以接受,把阶级斗争、民主斗争和权利要求斗争扩展到欧洲范围,使这些斗争激起欧洲的觉悟。

**问:** 但是,贝林格先生,在西欧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意共是否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答:** 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们想做到这一点,即在西欧建立一种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国家结构,但这个结构也不是照搬任何模式,不是重复至今已经实现了的任何社会主义经验,而同时也不是沦为复活社会民主党式的试验。社会民主党的试验只局限于管理资本主义。我们主张采取第三种解决方法,这个方法正是由于不可能安于世界现状而提出来的。

**问:** 你们要消灭资本主义。那么民主怎么办呢?

**答:** 正是因为要拯救民主,使民主变得尽可能更为广泛、更为强大、更有秩序,才必须超脱资本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是从二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重新获得民主、保卫民主和发展民主,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工人阶级、劳动者和他们的阶级政党,首先是共产党为主人翁的斗争成果。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力量为了保持他们的统治而毫不犹豫地阻挠、限制、肢解、阉割民主(还通过法西斯主义摧毁民主)。今天,所谓“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危机表明,民主处于怎样的无政府主义的瓦解过程和帮会主义的分裂过程,而且面临着反动专制进行冒险的风险。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人,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所以我们认为,今天,民主是工人阶级不可放弃和

不可缺少的成果。这里就有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方面的超越和发展，至少是对1917年10月及其以后年代所体现的列宁主义来说是如此。列宁当时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也应该进行到底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只能始终停留在争取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范畴之内。而对我们来说则相反，我们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包括起初作为资产阶级取得的成果的所谓“形式上”的种种自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永久性的价值，所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把这种价值也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应该加以肯定。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都重视民主，都要肯定民主。况且，这也不是现在才做出的抉择，不是现在才发现的真理，而是几十年来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通过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法西斯监狱里和游击队驰骋的崇山峻岭中流血牺牲的实例宣布了民主。因此，我们无须经过什么考试。

（译自1978年8月2日意共《团结报》）

# 意大利共产党在欧洲 和世界上的行动

在意共全国咨询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4月2日)

我想马上就国际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在贾恩卡洛·巴叶塔<sup>①</sup>同志的发言以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我们为什么有如下看法：法国同志和波兰同志关于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的倡议，无论就方式、时间还是就议题来说，都是错误的。正是考虑到使我们争取缓和与裁军的斗争取得最大效果的必要性，我们才决定不出席这次会议。

在这方面，我想更一般地回答一下有些人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党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里对一些国际问题采取的立场和行动的含义何在。这就是：从关于所谓欧洲导弹问题的立场到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立场，再到同欧洲一些共产党、社会党的代表以及同其他大陆的进步运动和解放运动进行的会晤，直到我们的代表团即将访问人民中国。

对我们的这些立场和行动作出无根据解释的不乏其人。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为我们的这些立场和行动引起意大利

---

<sup>①</sup> 贾恩卡洛·巴叶塔，意共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国际事务口负责人。

国内外的强烈兴趣感到高兴。我也要指出，有些地方表现出过分的大惊小怪，这显然对理解我们的这些立场和行动的确切含义没有多大用处。而有些评论家竟然把我们的这些行动解释成为服从国内政策需要的某种东西，于是，一切都被说成是我们拼命要搬掉共产党参加政府的主要绊脚石，昨天有一家报纸还这样写呢。这些评论家说得不对头。我们坚持认为，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团结政府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对此我们确实并不感到有什么见不得人，因为我们确信，这是可能建立的最严肃的政府，是唯一真正能够对付我国严重问题的政府，而且我们打算为创造建立这个政府的条件而奋斗。此外，我们也十分清楚，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斗争，要获得成功就应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也谋求使各民主力量达成一致。而这种情况正是在前几年已经发生了：先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通过对外政策两个动议，然后则是几个党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从而在1978年3月建立了议会多数。当时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状况正是各民主政党真正的协同一致。谈到这里，我想明确地指出（这也是为了对布法利尼<sup>①</sup>同志目前正确地向我们提出的那个建议表示赞许，他建议我们作出努力，摆脱含糊态度和避免采取过分灵活的立场），前不久，在众议院通过的那个对外政策动议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值得维护的。那个动议有一部分正确和积极的提法，但也有一些提法是同我们以前所采取的立场相矛盾的。我现在说明这件事，但对于那些在投票中不守纪律从而给党带来损害的同志——如果确实有这样的同志的话，我当然仍旧表示遗憾。

无论如何，这一点还是清楚的：在对外政策方面，那种阻挠同

---

<sup>①</sup> 保罗·布法利尼，意共领导机构成员，中央国际事务口第二负责人。

我们取得一致的障碍(我要补充一下,那种早已存在的妨碍意大利在国际生活中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的阻力),并不是由于我们对苏联共产党和任何别的共产党所谓缺乏自主(今天,只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才能持这种论调),而是由于天主教民主党对美国真正缺少自主,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另一个同样实际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严重障碍,它妨碍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政府,这就是天主教民主党硬要死抓住它那大权独揽的观念不放,死抓住那一套构成它的基础和竞选力量的拉拢收买人心的广泛体系不放。

因此,这就是我们想要向某些前面提到的“说话不对头”的肤浅评论家们提醒的一点,算是开场白。那些想真正了解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的含意的人,应该仔细地重新考虑一下,虽说不是重新考虑意大利共产党从那遥远的年代以来所提出的主张(特别是1954年以来提出的主张,可以把这一年作为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出发点的依据),至少是要重新考虑在最近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我们对自己的主张所作的发展:首先就是去年召开的我们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我们应当记得,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国际形势恶化和缓和发生危机的征兆已经明朗化的时刻召开的。

我们希望大家能回忆一下当时我们是怎样分析国际形势的,是怎样提出和平、缓和、合作、严格尊重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独立等问题的,我们根据前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对美国政策、苏联政策和中国政策提出了什么看法,又是怎样具体说明我们的新国际主义概念的,特别是说明西欧工人运动在争取变革社会和努力使欧洲为和平与发展发挥自主作用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十

五次代表大会曾强调指出了这一重要作用。

我们从那时以来的一切言行都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选择的路线始终如一的正确执行，都是我们这样一个扎根于西方的伟大无产阶级力量选择、决定和实践的行动。我们是这样一支力量：它依据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民主运动和解放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的国际主义概念和实践来采取自己的行动。

我不想详细追述我们对所谓欧洲导弹、对均势和裁减军备、对苏联干涉阿富汗，对美国随后决定的报复措施等问题采取的立场了。我要提到的是：这些事实和其他一些事实都使我们在分析中特别指明一点，即：世界上有一个矛盾进程正在激化，这一矛盾进程的最危险中心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冲突加剧。我们认为，缓和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起码的信任，以及世界和平的现实危险在增长。所以，我们曾强调指出这样的必要性：必须使各种各样的力量行动起来，只要所有这些力量能够多少为缓和紧张局势，为恢复美苏两大国之间和两个集团之间的对话和谈判，更广泛地说，为恢复所有国家之间和所有关心解决正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冲突，关心裁军与合作的力量之间的对话和谈判作出贡献。我们当时曾特别指明不结盟国家的作用，指明欧洲及其工人运动、民主进步力量、欧洲各个国家及其政府的作用，以及象天主教会那样权威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看一看近几个月来的事态发展，那么就可以看到，上述力量的作用和行动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使它们做得还不够。一系列不结盟国家、一些欧洲国家、一些共产党和社会党（其中也包括我们党）的立场和行动的作用也已经产生了影响。因此，

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行动就是根据这一分析而开展起来的，而近几个月来又表现得特别活跃，但是，我要再说一遍，这一行动是我们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作出的分析的继续和发展。

本着上述精神，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首先致力于加强同一些共产党，特别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关系和团结。我们久已感到我们同这些共产党对有关国际政策和世界工人运动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今天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存在的这种良好关系（我们可以说这种关系已经存在很久了），是符合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这两个毗邻国家的根本民族利益的，同时，也符合我们意大利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如下看法：即认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和主宰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的南斯拉夫，在欧洲大陆和对第三世界具有重大作用。同志们也知道，我们已经扩大和增强了同欧洲以及其他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联系。而昨天，切尔维蒂<sup>①</sup>同志就在莫斯科同基里连科同志和苏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今天，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件新的事情，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我们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标志着两党关系的恢复，这一关系已经中断好多年了，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这一关系。凡是了解我们在寻求和建立同任何一个国家所有民主的、进步的 and 革命的党——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的人，都应该清楚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精神准备这次中国之行和同中国共产党恢复关系的。而且，我们也可

---

<sup>①</sup> 乔瓦尼·切尔维蒂，意共领导机构成员，隆巴底大区党委书记。

以重提一下我们早在 1969 年莫斯科共产党国际会议上对中国问题和对如何看待同中国共产党关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许在这时候提一下这个问题没有坏处。

对我们来说，将要进行的会晤的意义和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增进对两党所处的现实的客观了解；互相尊重各自的立场和彼此的自主；坦率地讨论分歧之点（我们双方都知道存在着这些分歧）；寻求一切可能的一致，无论在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关系方面，还是在有关世界范围内各个地方的和平与合作的重大问题方面，都要如此。

这一关系的恢复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这一关系的恢复是沿着过去那条路线进行的，那条路线曾使我们向我们任何一个对话者都清楚表示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自由信念，我们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愿望，即要为克服冲突，发展合作以达到缓和与和平并使人类社会团结一致，摆脱战争恐怖，摆脱任何形式的剥削与压迫的目的而作出贡献。

除了同一系列共产党建立联系之外，我们还同其他一些力量，同第三世界的一些力量建立了联系（同志们看到，我们已经同一些党建立或恢复了关系，或者第一次有了关系，比如说，同印度两个共产党和国大党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在欧洲也有了一系列接触，其中包括同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会晤。

我不明白，有些人怎么能把我们最近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会晤看成是同“欧洲共产主义”相矛盾的。我们从来没有把“欧洲共产主义”理解为由西欧共产党起一种排他作用。相反，我们总是肯定，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这个以通过民主道路对欧洲发达工业国家实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



变革为目的的战略,为达到这种目的,就要寻求实现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工人力量、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这一主要特点在我们同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一起通过的所有文件中都一直得到明确的承认、同意和肯定。

在指出这一前景的时候,我们始终考虑到而且也应该始终考虑到在西欧的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是主要由而不是完全由共产党来代表的(我要说,意大利尤其是这样的国家,因为在这里,既有我们这支巨大而坚强的力量,但也有力量可观的社会党,还有一些工人阶层是支持天主教运动的,其中一部分又是支持天主教民主党的)。再者,在西欧另一些国家里,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是强大的;最后,还有一些大国和小国,工人运动的政治代表首先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就是实际情况,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早就进行我们的探索和活动,但最近这个时期才更具体了。

事实上,近数月来,世界和欧洲局势的发展,显然使我们更深切地关心寻求工人运动一切力量协调一致。协调一致之所以必要,既是由于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剧,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是一件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也都承认的事实。在这些力量中间,正在展开批判性的思考和对新道路的探索,这种新道路要超脱以发达资本主义宗主国地区对广大不发达和饥饿地区的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危机的根本性质,在某些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方针中也有所涉及和表述,尽管他们对这一性质尚未充分领悟,依然受到尚存的一部分狭隘传统观念的防碍;这种观念的痕迹在欧洲工会运动中有所表现,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部分的表现,归根到底,可以把它归结为列宁所下的定义,即“工人贵族”。这

里暴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对世界问题和欧洲问题看法的局限性,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一局限性是不可克服的,相反,我们要坚决努力克服这一局限性,尽管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困难的。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和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驱使欧洲的右翼势力采取更富有侵略性的政策。这些右翼势力的用心是:仅仅让劳动群众负起摆脱危机的重担,摧毁民主成果,强制推行使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对外政策,妄图恢复冷战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向后倒退,实际上,是一条荒唐的路线。此外,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最富有侵略性的右翼集团,正在或者试图充当对付第三世界(从伊朗到萨尔瓦多)各种各样解放运动的宪兵。在萨尔瓦多人民当中,在萨尔瓦多的艰苦斗争当中,出现过壮烈牺牲的奥斯卡、罗梅洛主教的高大形象。

在欧洲,如何应付并且胜利地击败这些右翼势力的政策呢?这正是我们向自己、向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同志们,向意大利和欧洲所有进步力量提出的问题。我们所作的回答是明确的:必须使工人力量、人民力量、民主力量与和平力量的最广泛联合获得进展,那怕这种联合是成分复杂的。这是能够取得对形势、对力量对比真正产生影响并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成果的唯一道路。相反,如果以为现阶段的目标只能是保存共产党的力量,如果断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右翼党的同盟者,那么首先这样说不是实情,而尤其是会使我们陷于孤立,无法有任何作为。我们始终应该使意大利和欧洲工人阶级心中牢记这一点:在三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分裂在为各国法西斯开辟道路,并使他们获得胜利的种种原因当中曾起过多大影响;这一分裂1933年以前在德国又起

过多大影响,而与此相反,1934年在法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所有民主人士以及反法西斯人士团结起来,反对当时在这个国家试图进行的反动冒险勾当,则又起过多大影响。我们应该记住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从上述经验和其他经验中所吸取的教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曾批判了对社会党采取宗派主义态度,并采取行动,吸收统一行动方面的那些最有积极意义的经验,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经验,从而指出了实现巨大的工人力量、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的胜利道路。

诚然,今天的形势是不同了,但今天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如果工人运动分裂了,那么右翼就要获胜。这一点就再次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要作出一切努力寻求意大利和整个西欧工人运动真正的和深刻的政治思想团结,尽管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观点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

我们不会放弃这一任务,不管这一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多么艰巨。这也是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才不仅能够对付右翼的政策,对付反动力量和好战势力的政策,而且可以在西方使人们相信革命的目标,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产生和保持信心和希望,使青年一代产生信心和希望,特别是使他们致力于在意大利和欧洲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斗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造成如此严重的混乱的危机面前,我们多么需要这种希望、信心和斗争啊。

我们的一言一行,同“转移阵营”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属于任何阵营,我们不承认任何领导党和领导国。我们是我们自己,是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参加的极为广泛、色彩不同、形式各异的世界反帝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有我们的自主、我们的特征和我们的首创性。

我认为，我上面提到的这一系列分析、立场和具体活动，使我们党的行动以及意大利和欧洲工人运动的行动得以产生力量，这种力量开始为人民群众和民主舆论界的广泛阶层所注意到了。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是，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我们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应同这条路线相矛盾（我上面已经提到了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哪怕是仅仅妨碍这条路线的充分贯彻也不行。比如说，如果我们参加巴黎会议，就会是这样。我要再说一遍，关于巴黎会议，巴叶塔同志已经从内容和时间方面详细地说明原因。但是，我还要从方法方面着重指出这一点，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做法。这次所采取的做法不同于柏林会议<sup>①</sup>筹备期间所采取的做法。筹备柏林会议时，哪一个党都没有遇到过别国党事先作出的决定和造成的既成事实。

正因如此，我们才作出了这个决定。然而，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不会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进行激烈的论战，更不会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党采取决裂的态度。

我们应该得出的第二点结论是，对于我们战略和行动的发展在党内所引起的讨论，应该因势利导，使之发挥这种发展所蕴藏的一切潜力和新内容，以便使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我们裹足不前，纠缠在已落后于欧洲和世界现实的争吵之中。当然，要有耐心，要态度明确，但首先要有能力始终不渝地走已经走上的道路，不向敌人让步，也不让任何人利用我们，但也不要摇摆不定，只有这样才不致损害党，而党和国家也才能从我们

---

<sup>①</sup> 柏林会议指1976年6月底在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的政策、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行动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我同意科苏塔同志的报告。<sup>①</sup>我认为科苏塔和许多其他同志指出那种需要是正确的。这就是需要认真地、自豪地充分评价近五年来,大区、省、市镇各级左翼民主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其中有些地方政府工作时间更长,有的已达数十年,也有些地方政府是通过1975年选举所取得的成果,在这些地方行政生活中实现了人们所谈到的那种名副其实的“转折”,建立了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合作为基础的地方政府。但在一些大城市,根据选举结果,地方政府积极地扩大其成员,也吸收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参加。正象许多同志提到的,我们应该告诉公民们,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里,过去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是什么样的,并且同近五年来管理这些地方的政府作个比较。自然,这个比较我们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去作,但是我们大家也都应该掌握一些为全意大利所熟知的资料和典型,并向别人广为宣传。

比较的结果是明确地有利于左翼民主政府。这个结果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的,即:经选举产生的这些地方政府公正廉洁,既有稳定性,又有连贯性;同心协力建成这些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多数的各党之间关系是光明正大的,并且鼓励公民最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即使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试验),尤其是在满足被过去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所无视或践踏得最厉害的那些需要方面所取得的具体成就,而这些需要是广大群众朝思暮想和急不可待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但也是从前面几点引伸出来的)。我说的成就是指在社会服务、绿色保护、扶助老幼和交通运输等方面

---

<sup>①</sup> 阿尔曼多·科苏塔,意共领导机构成员。

的成就。不仅仅是上述这些事情。有些事情也许今天看来是更为重要的，即：建立罗马地下铁道或完善文化戏剧设施和设计能力，也就是同志们向我们谈到的那些事情，就是说，具备瞻望将来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过一天混一天。除此而外，还要知道，左翼民主政府的工作是国家对付恐怖主义，对付整个意大利社会日益扩大和日益尖锐的危机，对付由此而来的分化、排挤、不信任和帮会主义倾向泛滥等现象而站稳脚跟，进行抵抗和给予回击的一个主要因素。

鉴于即将举行地方选举，天主教民主党机关报《人民报》（现在由多数派“前言派”<sup>①</sup>领导）居然采取看来已属过去的那种恬不知耻的做法，重弹卑鄙而虚伪的滥调，硬说什么意共要对恐怖主义的出现及其思想根源负责。

另有一些蹩脚文人则麀集在另一边，遥相呼应地提出了类似的论调（当然，他们不怕自相矛盾，又与此同时把意共说成是镇压党）。他们的论据是最荒谬和最站不住脚的。

比如，说什么恐怖分子中间有工人，甚至有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社会党或者统一工会运动的人。渲染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有同样多的人、甚至有更多得多的人是来自其他阶级，其他阶层直至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还有同样多的人是来自其他政党和其他组织，包括天主教组织。但我们不愿纠缠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这对于弄清什么是恐怖主义，为什么有些青年和其他一

<sup>①</sup> “前言派”指以当时任总书记的皮科利为首的一派同多纳卡廷的“新力量派”联合组成反对同意共合作的党内多数派。该派在1980年2月召开的天主教民主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取得百分之五十八的多数，而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该派在会上通过的一项文件的前言中声明天主教民主党不能同意共“共同分担责任”。“前言派”即由此而得名。

些人要参与恐怖主义行动没有丝毫帮助。

重要的是事实,也就是说,是各个政党的政策和它们的实际行动。没有什么必要向我们的诽谤者说明什么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和真正行为;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意共的总路线,它的思想斗争,它的各级组织和成员的一贯活动,它在议会中的行为,它一向对维护秩序的力量和司法机关的支持,它的大区和其他各级地方政府为捍卫民主体制和公民安全,以及为阻止恐怖主义及其流毒向意大利工人阶级内部的渗透而展开的活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这项工作对于反对恐怖主义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我们不想陷入争吵,但是,我们应该揭露一些人不负责任,他们出于卑鄙的竞选打算,居然毫不犹豫地胡乱提出指控,这种做法只能使人民的情绪恶化,使人民在恐怖主义和颠覆性的危险面前陷于分裂,而不是实现必不可少的团结。我们应当沉着、有力地扫除这种乌烟瘴气,有人现在正是想以此来毒化选举气氛。

五年过去了。总的说来,这五年表明了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种执政能力主要来自这样一点,共产党人对于公共事业的责任感、政权的行使和公民财务的管理,有一种和无数天主教民主党的行政人员不同的观念。

所以,我们应该使公民们回忆一下,请他们想一想我们的地方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所不得不接受的那些遗留问题,想一想如果都灵、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塔兰托等城市和利古里亚、皮埃蒙特或拉齐奥等大区的地方政权重又落到天主教民主党及其同伙们手中,情况可能会是怎样的。那时就会使贪污舞弊、任人唯亲、行贿受贿、滥用公款的现象卷土重来,地方政府就会重新陷于不稳定。这就是确认和扩大左翼民主地方政府的

第一个理由，以防止发生任何倒退也就是说，防止丧失那些刚刚开始做的好事情，这也是为了推进在许多地方和城市已经开始振兴和发展的事业，保障秩序和效率，但同样也是为了要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增进公民的团结。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反对用全国性政府的形式，对地方政府和大区政府采取所谓清一色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今天还要说，地方政府的组成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和各党派之间可能建立的联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加以决定。然而，我们主要的中心口号应当是这次大会的天幕上所写的那个口号，即：“巩固和发展左翼民主地方政府”，这一点应当是明确的。同样应该明确的是，如果有些地方因不能建立左翼民主政府而提出达成也包括我们党在内的更广泛的协议，我们也能在以下两项条件的基础上才参加地方政府：对施政纲领要既清楚又具体地承担义务；要有我们的代表参加地方政府。如果情况相反，我们就将采取反对派行动，曾被称为“广泛协议”<sup>①</sup>的那种经验是不能再搬用了。

在处理地方政府和大区政府的问题时，要总结一下已经做了的工作，也要制定未来的规划，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使公民们越来越清楚哪些是属于市镇、省和大区一级的任务、权力乃至由此而来的责任，相反哪些又是属于中央机关，首先是政府的任务、权力和责任，而在这方面，人们是很不了解的。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和大区政府所掌握的权力和经费有了一定的扩大。这种扩大的得来，部分是由于我们在许多地方政府中

---

<sup>①</sup> 广泛协议系指 1977 年至 1979 年间，意共同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达成部分纲领协议，组成议会多数，支持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但意共未直接参加政府。



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但同时也是由于在我们参加议会多数时期曾制定了一系列以此为方向的法律和措施：自1977年起采取了地方财政措施、第三百八十二号法律和其他法律与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都赋予市镇和大区以新任务。然而，就象科苏塔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党的责任，民主团结多数破裂了，在这之后，这一进程就停滞不前，并且向后倒退。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又卷土重来，其结果是职权混乱，有陷于瘫痪状态的危险，而这种状况在处于新旧事物交替时总是会发生的。竞选运动也应该是为了两个伟大目标而进行动员的机会。第一个目标是使地方自治制度得到彻底的安排，以便明确规定大区、市镇的任务和权力以及我们认为省一级所应具有的不同职能，以求使共和国的新体制能十分稳定、清楚和有效。第二个目标是改革地方财政，这一目标应该首先使市镇在开发财源方面具有采取主动的更大可能性和更大的权力，从而使财源能得到扩大，并能更公平地加以分配。同时，这样做也是使人在分配财源方面享有真正可靠的权利，而这一点对于使大区 and 市镇能在本地区发挥自身作用，但又能着眼于全国，是必不可少的。这两项改革对于严格掌握收支政策、反对浪费、同时又能满足公民需要来说，都是必要的，正象我们许多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样。

不言而喻的是，这条路线意味着既要反对中央集权派的抗拒，也要反对市政本位主义的表现。我认为，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把选民应该为之进行投票的那个特殊问题，亦即市镇、省、大区三级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方式问题放在竞选运动的中心地位。我想我们会全神贯注地进行这项工作，无论是在那些我们曾执过政的地方，还是在那些我们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地方。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其

他党也同样知道选举结果对于总的政治发展将有很大影响。

6月3日政治选举后几乎已经过去一年了。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我们党的选票下降使一切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困难，使治理意大利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变得更为困难，我们应该说服那些当时没有投我们的票或者不再投我们的票的人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说服全体左翼选民和天主教民主党及天主教界反对和害怕向右转的那一部分选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使他们考虑一下：就总的发展来说，我们党的选票如果进一步下降，这可能会意味着什么，正如人们所见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了。

诚然，前几天公布的1979年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发展的数据表明，意大利的发展超过了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参加议会多数时期所通过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和立法措施的结果，特别是在1976年秋天的严重财政危机之后所采取的措施的结果。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确实也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增长（百分之二十），衰退的迹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国家的社会危机——这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危机——和国家结构的危机也加剧了。只要想一想司法管理工作的情况就够了，目前我们同政法协会领导机构讨论到这个问题。

公民当中令人担忧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增长，近几个月来各种丑闻使公民们受到剧烈的震动，这一切也就使人产生了不信任情绪，陷入本位主义，热衷维护帮会利益。

对即将成立的政府怎么看呢？我不想多说有关建立三党政府的种种事件了。我们早已表示过我们对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及对该党多数派因拒绝组成民主团结政府的可能性而应承担的责

任的看法。“前言派”，即多数派的代表人物也讲什么全国团结，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企图掩盖已经作出的抉择的严重性的拙劣手法罢了，它使我们确信：全国团结这两个词正在变成一种空洞的口头禅。区别并不在于谁使用“全国团结”这两个词，谁不使用这两个词，而在于谁同意、支持并始终不渝地努力争取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团结政府，反之，谁又是过去和现在都实际上反对成立这样的政府。有什么就应当说什么。

我们承认如下一点是有意义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曾展开政治斗争，并澄清了一定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二的代表终于考虑同意共在政府内合作的可能性。这就向我们证实，一个带有不同色彩的政治联合在国内也获得进展，也就是说，这一政治联合正在形成，它甚至在各党内部也存在，这一政治联合支持同意共在政府内合作这一前景。我们还指出，在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当中，在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和所作的结论当中，社会党——更确切地说是这个党的一部分——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大家还记得，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今年1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决议，即正式建议成立有工人运动的两个党都参加的民主团结政府，并且排除一方从属另一方。但就在这次会议的次日，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相反却开始提出以从属地位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一切就削弱了本来可以，并且应该对当时就要召开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施加的压力；甚至事实上这是给天主教民主党内最闭关自守的派系以一种鼓励，使它们不接受社会党建议的组阁方法。只要注意一下从一月份到今天各党发生的一些情况，就可以理解何以在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出现这样一种形势了。由于天主教民主党多数派作出决定，坚持带有偏见地排斥

意共参加政府，同时也由于必须避免提前大选，这一形势客观上使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议会内处于不同地位。当然，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使这种不同地位导致意共同社会党关系的恶化，我们甚至应当致力于反对可能来自事物本身的这种倾向。

我们在意大利的路线，将不会同我们在欧洲对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路线相矛盾；并非不谈不同看法、差异和批评，但要特别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共同点。更何况在意大利，我们还一起管理着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和大的地区；我们在工会运动中是站在一起的，在其他一些大的群众组织中也共同工作。此外，在议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也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在纲领问题上和行动方面都有共同点，其目的既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也是为了就有关前景的重大问题展开更广泛的讨论（这一讨论已在意大利和欧洲展开了）。

我们对施政纲领和政府组成问题保留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对此尚不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对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共和党政府又能说些什么比较具体的意见呢？一方面，这个政府的成立无疑标志着使那些在“前言派”路线上纠合起来的天主教民主党派别的企图遭到某种失败，也是使社会民主党遭受挫折。事实上，这个三党政府标志着那个“最高纲领”的暂时破产，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政党里所有最没有远见和宗派主义的力量都曾打算执行这一纲领，这个纲领本来是要通过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五党组成政府，即著名的“五党政府”来实现，而这是当前条件下最消极和最没有前途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是说三党政府就是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了。这只是说，它使政治形势的发展未可预卜，也就是说，政治形势既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也

可以朝那个方向发展。但这种前景的模糊不清，是威胁国家的一个消极事实，它危害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业已采取的这种组阁办法使那些最保守和最固执的力量还抱有希望，并且鼓励它们联合起来，这些力量使国家陷入目前这种灾难性境地，拒绝和反对唯一真正有权威、真正能应付我们所处的灾难如此深重的时代的政府，亦即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团结的政府。

所以，政治方向不明确，正是意大利国家和社会的最大和最严重的危机因素。这种状况有利于所有扰乱和破坏我国民主秩序的力量，使它们得到鼓励。这种状况还使公共权力的行动长期摇摆不定，使生产力缺乏任何中期和长期的前景，降低我国在国际上的信誉，使广大劳动者群众和人民群众的猜忌、怀疑和不信任情绪愈来愈大。

从上述根据国家的总形势对政府提出的否定看法中，就产生了我们作为反对派进行斗争，以及我们展开竞选运动的目的与方法：要解决人们的问题，使国家摆脱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局面。

一方面，我们要加倍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以便给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指出新的方向，保证改进、维护和恢复民主秩序，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暴力行为，反对颓废现象，反对秩序混乱，争取革新和振兴国家，推动公共生活道德化，促使意大利在国际上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我们还要致力于解决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每天都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还要为使国家摆脱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局面，指出伟大的目标，通过建议和斗争为尽快建立一个民主团结政府而创造条件。如果我们善于使全国的团结意识变得更牢固和更广泛，使大规模的团结运动在国内获得进展，克服在我国人民当中存在的依然深刻的分裂，如果我们善于改变各党之

间和各党内部的力量对比,因而也改变这些党的方针,那么这一切就可以办到。我们应该知道,这将意味着在各种不同立场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派系之间进行新的更经常的对话。

如果大区和地方选举投票的结果表明天主教民主党力量增长,这将对如今统管着天主教民主党的“前言派”的鼓舞,促使正在建立之中的政府向右转,向后退,将为采取“五党政府”的解决办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五党政府”乃是天主教民主党多数派和其他一些党内不同力量毫不掩饰的愿望。

多投共产党的票,意味着为阻止这种倾向,压制这种野心,鼓励和推动各个民主政党中最开放、最负责任和最团结的力量采取明确、具体的政治和道义的抉择而作出强有力的贡献,从而使国家摆脱摇摆不定的局面,加速成立一个真正能够解决如此严重地折磨着意大利人的问题的政府。

党应当作出巨大的努力,而这这就要求动员党的全部力量。当然,近几个月来党的行动和工作并不缺少积极现象,这表明同志们的满腔热忱和工作能力,也表明有扩大我们同广大群众的直接关系的巨大可能性。只要提一下在养老金问题、导弹问题、和平问题以及反对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上所做的工作就够了;还有散发问答书<sup>①</sup>,人们曾为此积极而有信心地进行工作;还有一些积极现象,如开展为《团结报》特别募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党员登记工作本身的进展,后者表明我们的组织力量总的说来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有可能超过1979年的成绩,条件是工作能热气腾腾地开展,特别是争取新党员的工作能够积极主动地开展。

<sup>①</sup> 散发问答书是意共的一种群众工作方法,即以传单形式,提出一系列问题由读者逐一回答,借以了解和征求群众对有关问题的意见。

但是，党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工作的进展也表明，我们所拥有的可能性并未始终得到充分利用，散发问答书的例子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凡是想方设法并且勤勤恳恳工作的地方都取得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意外成果，但在那些迟迟不相信这一工作的效力的组织里，就未能取得同样成果（当然，我们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全面推进这项工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种充分利用所有可能性的有限的的能力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许多原因还同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的整个危机有联系。但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对6月3日的选举出现不利结果所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时间拖得太长；另一个原因在于对群众信任不够，也就是对同劳动者、公民、妇女、青年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信心不足，对通过动员这些力量开展各项明智工作而获得成功的远大前景也缺乏信心。

这两个缺点都暴露了我们有某种固步自封的倾向（至少在党的某些部分是如此，说到处如此也是错误的）。党的这种固步自封的缺点使党丧失斗争能力、征服能力和结盟能力。党的某些组织中存在着对我们政策的某些方面以及贯彻这一政策的某些方式抱有怀疑。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报纸和舆论工具广为散布的造谣中伤造成的，它们企图歪曲我们路线的真正含义，丑化党的形象。我想指出，这些宣传运动不仅对共产党，而且对意大利民主前途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很严重的。这些宣传运动企图把所有党都说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所到之处，可以看到激进党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污蔑性宣传画，画上竟把库尔乔和阿尔米兰特<sup>①</sup>同共

<sup>①</sup> 库尔乔为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头目；阿尔米兰特为意大利社会运动（即新法西斯党）头子。

产党与社会党领导人相提并论。我不知道是谁炮制了这幅宣传画,但可以肯定,炮制者一定记得法西斯分子曾经把乔利蒂、尼蒂、屠拉蒂、马太奥蒂、斯图尔佐、哥贝蒂<sup>①</sup>、葛兰西放在一起。这是要往一切和一切人身上抹黑,散布不信任,从而为反动勾当准备肥沃的土壤。实在不明白怎么竟然有一些同志认为可以同诸如帕内拉<sup>②</sup>之流一起参加集会。

当然,也必须注意在我上面所说的怀疑中的那些真实情况。有一种正确的担忧,这种担忧也应该是我们大家的担忧,即认为应该避免使党偏离它的根本路线,以致这条路线被某些行为和做法所模糊。但应该特别明确地指出,光是怀疑是不能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是不能帮助党利用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思想建树方面所体现的一切新的东西开展工作的。

我们需要进行一场进攻性竞选斗争,因此应该迅速克服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情绪和保留态度。我们应该进行一场以党的队伍的巨大明确性和团结为基础的竞选运动。但明确性和团结的取得要依靠我们意气风发地对外采取行动,要使共产党人同劳动群众、同

---

① 乔瓦尼·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著名国务活动家,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多次组阁。

佛·萨·尼蒂(1868—1953),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有左倾的民主思想。参加过乔利蒂的内阁,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前曾组阁,后移居英法两国,二次大战期间被希特勒德国投入集中营,战后任当然参议员。

菲利浦·屠拉蒂(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改良主义派领袖。

贾科摩·马太奥蒂(1885—1924),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议员、著名反法西斯人士,1924年被法西斯暗杀。

路易吉·斯图尔佐(1871—1959),意大利人民党(天主教民主党的前身)的奠基人。

彼特罗·哥贝蒂(1901—1926),意大利自由党人,著名反法西斯人士。

② 帕内拉是意大利激进党的头子。



所有公民广泛而经常地会晤，在会晤中，我们要毫不含糊地、直言不讳地阐述并讨论我们对所有重大国际国内政策问题，以及对地方和大区政府必须据以开展工作的各项抉择的理由、根据和基础。所以，党应当完全恢复这种作风，恢复这种同人们建立民主关系的兴趣，应当善于注意和表达对变革的要求和愿望，人们是愿意和要求听取并讨论我们的建议的，是愿意和要求参加活动和斗争的。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也就是共产党有别于其他党的特征之一。

(译自 1980 年 4 月 5 日意共《团结报》)

## 在北京大学集会上的讲话

(1980年4月16日)

亲爱的韩天石同志，

亲爱的周培源同志，

亲爱的北京大学师生员工们：

我感谢你们的热列欢迎，我谨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人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意大利共产党人本着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怀着友好的情谊，注视着你们的国家。从这个现实中，我们看到为改造，为进步，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艰巨努力，而你们是这个现实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在今日的中国，你们的工作和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要求你们同你们的同志们，同中学、大学、工厂、农村的其他成千上万的青年们一起，为你们人民的未来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你们给予我们这次会见的机会，我谨向你们，也向邀请我们访问贵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同你们——中国的悠久而丰富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们——交谈。我们知道你们这个大学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突出作用。通过这座大学，通过一代代老师和学生，传播了革新和进步的思想。我们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是怎样从这里开展起来的，这次运动在你们人民的斗争中是一个决定性阶段。捍卫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凌辱，在当时是同消除落后

的强烈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而这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萌芽。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为开辟社会主义前景的可怕冲突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所有各大洲的其他人民一道，一个希望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人民的力量显示出来了。由于包括毛主席本人在内的许许多多人士的教导和工作（他们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和胜利斗争中占有首要地位），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从你们这个大学传播开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斗争是多么艰巨，你们的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漫长道路上遭受了多少牺牲。这是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革命者、进步力量由于他们的行动具有解放与和平的普遍意义而肩并肩地团结在一起的一段历史。难道这只是过去的事情吗？即使在当今世界这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是否也可以找到汇合的基础呢？我们确信，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不管所走的道路是如何的不同，不管看法和立场有如何的差异，在反对战争威胁，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生活的任何干涉，争取正义和革新世界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作出共同的努力。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可以实行汇合和相互了解的一个证明。我们两党正在表现出善于对话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从意大利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用以维护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的那种力量和他们愿意撇开分歧而寻求有益的相互了解的那种愿望当中产生出来的。

请允许我向你们简略地谈一下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党的斗争。意大利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民主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运动斗争的成果。因此，我们把这些民主成果看成是开

展我们争取实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变革斗争的一个条件。我国社会迫切需要实行这种变革，以便克服其本身的发展所造成的不平衡和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解决因国际秩序的危机而产生的种种问题。

我们在展望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考虑并仔细地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主要以我国的独特条件为依据，不仅拒绝其他的模式，而且也拒绝那种认为可以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观点。这是从我们党整个历史留传下来的一种抉择。如果我们党的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斗争和牺牲中没有遵循这条道路，把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作为我们的愿望，意共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起到在选举力量和政治影响方面成为意大利第二大党的作用，也不会是资本主义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共在全国五千六百万人口总数中有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名党员，并且在政治选举中获得近一千一百万张选票，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四。我们党同社会党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同其他左翼力量一起，在我国二十个大区中的六个大区，在几十个省份以及意大利一些最大城市里（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热那亚、威尼斯、波洛尼亚、佛罗伦萨）是主要的执政力量。

我们这个斗争坚持了很长的时间。共产党人曾经在二十年中一直站在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的最前线。意共在一个广泛而团结的人民运动所进行的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武装抵抗运动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和伟大的民族力量。战后，我们为保卫和扩大民主成果以及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今天，意大利是受到遍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危机的最沉重打击的国家之一，这种危机本身就孕育着倒退，政治和文明的

倒退的危险。这是一场激烈的、艰难的较量，在这一较量中，反动和野蛮的势力不惜使用血腥和暴力的方式来摧毁民主制度。多年来在我国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首先就企图使民主无法前进和发展，而民主是劳动者运动的不可放弃的财富，是使这一运动自身发展壮大手段。今天，恐怖主义正是在劳动者运动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是要击败恐怖主义的进攻，而这种进攻是针对全体人民及其成果而来的，是企图破坏人民的自信心和他们对正义、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前途的信心。

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决定性的，它的全体党员都在进行这场斗争，它邀请和呼吁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有效的合作，因为意大利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争取拯救和变革我国的斗争中，我们致力于具有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即：在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的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天主教人民群众，社会党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人民群众的团结。这些人民群众每当能够找到共同的愿望并进行共同的行动时，就表现出他们善于完成重大的任务，而且不久以前，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确实巨大，我们在为实行使经济发展，平等地满足公民的新的需要，限制大资本权力的改革而斗争。

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确认我们的民族要求，确认这些要求的民主性，以及在当前这个世界危机阶段，在意大利的发展将会听命于西方最富有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摆布这种危险严重存在的阶段，还要确认那些使上述要求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原因。如果西方最富有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这种摆布得逞，那就仍然会丝毫不考虑解决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种种问题的必要性，这些问题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我首先是指就业问题，这同青年

群众尤其有关，他们特别受到危机造成的经济、文化和道德后果的影响。今天，青年在建立他们个人生活的同时，也想了解和参与左右他们前途的那些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决定。如果排挤他们，那就相反有使丧失信心和绝望的情况蔓延开来的危险，这种丧失信心和绝望在一些人身上表现为转向极端主义，在另一些人身上则表现为放弃斗争，自私地追求个人特权，在日常烦琐单调的生活中消极地随波逐流。这种危险也波及我国人民当中其他许多人，例如，妇女群众。今天，意大利妇女以空前的活力和决心进行斗争，争取不再被歧视和被排挤出生产活动，争取在充分肯定自身权利和尊严方面不再受到阻挠。还有意大利南部居民，他们在忍受至今未获解决的那个老问题所造成的痛苦后果，而所有意大利人的未来在许多方面都是同这个老问题的解决相联系的。这个问题就是实现包括南部在内的全国生产机构平衡发展的问题。

这就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积极而公正地满足已经发展的社会中极其广泛的人民各阶层的切身要求的一些最明显的表现。但当然也还不止这些。意大利社会的全部问题反映和证实了这样的危机：怎样捍卫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而又不助长通货膨胀？怎样更有成效地组织工厂中的劳动而又不缩小工人阶级对生产宗旨和目的以及对投资发展的干预权力？怎样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合乎人道？怎样使国家机关更好地为公民服务？怎样健全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现在充斥着可耻的严重丑闻，这些丑闻涉及到那一部分同社会治理的旧日弊端一直有瓜葛的政界和金融界，正是这些弊端使我们面临当今这种危机。但是，这些问题，除了揭示如此深重的危机的性质和错综复杂之外，也是我们进行斗争的场地；我们认识到，我国的命运，也就是说，把我国重新纳入秩

序、民主和革新轨道的可能性如何,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而这意味着要认真治理国家。但是,没有象意共这样一支力量参加领导我们的国家,不仅难以治理意大利,而且尤其无法走上应付和克服意大利危机的道路,因为意共体现着意大利社会中那一部分最能代表人民、也最渴望进步的人的要求。

我们非常清楚,这不是一场很快就会过去的、暂时的危机。只要朝我们国境以外看一看,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每一件事情都已同世界的错综复杂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崛起,他们要自主地掌握自身命运,掌握本国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的愿望,揭示出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即使在它显然是最稳固和最繁荣的几个地方也不可能依靠把困难的重担转嫁给迄今还是不发达地区的那些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能够衡量出那些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问题以及大家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是何等严重,这些问题的危险都是由于国际关系缺乏公正和合作而产生的。在能源生产最富的地区中心发生的伊朗革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津巴布韦进步力量的胜利,都再次向世界传达了 this 信息,即:民族解放道路和摆脱新殖民主义的解放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今天,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应考虑的正是这些现实。但必须尊重新兴国家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即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平等。这些要求并非只是对正义的一种必要而为时过迟的尊重。必须提出、也必须接受这些要求,因为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当地人民进行野蛮压迫和掠夺的那些殖民帝国的崩溃当中产生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和结构上都不可能再走它们的老路和重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强制推行的那种业已破产的发展模式。硬要重新建立和维持旧的国际剥削制度,就

可能发生世界战争。

由于这些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同时面临已经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西欧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人民和民主力量的斗争，就只能以世界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正义目标为依据，只能以缓和紧张局势、在一切存在争执和冲突的国家之间重新开展对话和进行谈判为目的。

帝国主义势力对各国人民施加严重的威胁。在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中再次出现令人惊恐的冷战气氛，这种气氛加剧了对抗集团各自的强硬态度和闭关锁国的状态。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增多了；尽管一些新兴国家的人民成为本国历史和全人类历史的主角，工业化世界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在扩大。除了旧的不稳定因素之外，又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而这些旧的不稳定因素从来没有得到过全面和积极的解决。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和各种形式的压力的倾向在发展。因此，世界上所有那些愿意保卫和平与保卫各国人民享有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权利的力量之间寻求谅解与合作的那种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这些力量认识到这个危险：军备竞赛除了会激发新的冲突之外，还破坏把人类拥有的财富用于和平与发展目的的努力。今天，抉择的范围越来越缩小为要从如下两个方面作出选择：要么是建立一个基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自由协作与合作的新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要么则是爆发一场可怕的灾难。

我们看到，世界上对上述令人惊恐的两种选择的敏感和担心在增长。在意大利和欧洲，我们在通过复杂的、不大容易的对话，向一切左翼和民主力量（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各种倾向的进步力量）呼吁；这种对话要尊重各种力量的自主，其目的是找



到同它们的一致之点,以采取行动,为西欧打开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但是,这种行动应当谋求同世界上一切致力于争取缓和、裁军、和平、正义与合作的政党、运动、国家和政府——首先是“不结盟国家”——取得联系,并同它们建立关系。

但是,在国际上的这种行动有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则是一个不可放弃的部分,那就是:要争取深刻地革新我们欧洲大陆各个发达工业国家以及整个欧洲共同体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同志们,本世纪的革命变革和各国人民解放的历史表明,和平、民主和独立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同时也表明,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依据和尊重这些价值,是任何对话、任何想相互了解和共同努力争取全人类进步、摆脱资本主义与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今天存在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的意义,尽管双方还有差异和分歧。我相信,我们这次在这个大学的会见,必将为两党的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有益作出贡献。

我再一次向亲爱的同志们表示感谢。祝你们学习好,祝你们的科学研究获得成就,祝你们同你们的国家和全世界一道获得进步。

(译自 1980 年 4 月 17 日意共《团结报》)

## 在罗马竞选集会上的讲话

(1980年5月4日)

我想，你们期待我今天着重讲一讲党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直到最近的中国、朝鲜之行的意义和成果。几个月来，意共的立场和活动引起了意大利和国外的关注和兴趣。

必须承认，意共是国际生活中最为活跃的意大利党。比如说，肯定没有谁能说天主教民主党目前在世界上有什么略能令人注意的行动。再者，意共是以它自己特有的立场出现的，这种立场是精心而又有独创性的工作结果。在国外，意共的这种严肃性和努力是任何人都不想否认的。然而，在意大利，却有那么一些人力图使人相信，我们在国际范围的所有活动，竟然都是出于国内政策的目的，出于提供“自主证明”的奢望。但是，这种人现在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信誉扫地了。

这种有关自主的说法现在已经变得几乎滑稽可笑了。当这种说法是由天主教民主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提出时，这种说法就尤其可笑了。这些人居然主张，必须永远站在美国一边，哪怕美国采取了类似在伊朗所尝试的那种冒险行动（甚至可以说，在美国采取这种行动时尤其要这样干）；通过这种冒险行动，美国把世界推到战争的边缘。同时，即使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自己不赞成上述冒险行动从而宣告辞职，这些人也仍然主张站在美国一边。

对有关意共“自主”问题的煽动,甚至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尽管连那些最不过问政治的人也能容易地懂得,意共不论是在罗马、斯特拉斯堡,还是在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都是以同样的坦率和一贯性讲话的。此外,他们也懂得,意共不论对美国的政治领导人,还是对苏联、人民中国、欧洲各国的政治领导人所讲的话,都是它认为讲出来是应该的和理所当然的。

在阅读那些对我最近同贾恩卡洛·巴叶塔同志和我们的代表团一起所作的中国之行的评论时,我发现,有些人由于再也不晓得对我们提出什么别的批评为好,竟然指责我们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不知如何“选择”。显然,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意大利的党不作出同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党或那个党,或者国家政权成为一体的选择,那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没有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能力,因而当他们亲眼看到别人这样做并且做得那么认真时,他们就惊慌失措了。

事实上,在当前世界所处的形势下,面对着那些最大强国和旧领导阶级严重丧失进行客观分析和指导世界事务的能力,看到在国际生活和若干国家的生活中表现出那么严重的意识形态闭关自守的状态,那么严重的党同伐异现象,我们恰恰是在今天相信,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力量都应该使用自己的头脑,力求为使理智、政治、对话、谈判压倒诉诸武力、采取暴力行为、造成既成事实而作出贡献。

我们的活动的真正的、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演戏,也不是为了寻求掌声,而是由于我们意识到当前这个国际时刻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我们打算为扩大执政的或不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力量、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之间的关系作出我们认

真的贡献。我们过去和现在这样做，始终都是为了谋求重新和好、净化气氛、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合作；一句话，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为了决裂。上述意图就是我们全部活动的基础。我们在最近的访问中也同样抱着这个意图。对朝鲜的访问，是为了巩固我们同朝鲜同志长期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形势分析的广泛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对中国的访问，是为了恢复长期中断的关系。

在同中国同志的接触中（这种接触早从去年三月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大家同意不要追究过去造成两党关系中断的原因，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难堪，而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在两国还是在世界上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当中都是如此，以致于使当时分歧的内容都变得完全过时了，相反，上升到首位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新的问题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把同我们党恢复关系说成是“历史性”事件。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是出于礼节或者随便说说而已。我们从在中国逗留的全部时间里有了这样的印象：我们所遇见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工人和学生、农民和教员、妇女和青年，都把我们来到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新鲜事物，况且，他们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把我们的访问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这种欢迎方式中，我们发现并且感受到，他们不仅对重归于好感到满意——我们对此也感到满意——而且对我们党、对意共究竟是怎样一个党有了实际的认识。早在中国发表的为我们到来准备的那些文章中，后来则是在公开和私下的讲话中，就已经表现出对意共特点的这种认识，不仅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具有积极作用的

党，而且还认识到我们这个党对意大利和西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有独特建树的，人们有兴趣了解我们的这一建树。

从我们方面来说，这次访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我们所进行的许多接触，都有助于向我们展现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的现实，这个国家经历过一场争取解放的伟大革命，如今那里居住着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个国家中，存在着有关发展和现代化的艰巨问题，特别是在这样的十年之后；这十年中，不仅政治生活、而且还有生产活动，尤其是工业、运输和大中小学的活动方面都被“文化革命”搞乱了。对于“文化革命”的根源和表现形式，中国同志并没有向我们作简单化和宣传性的解释，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来介绍，现在既分析了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原因，也分析了来自党的错误的原因。

因此，我们对这个国家所得出的印象是，这个国家正在为克服过去十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而作出巨大的努力，同时也以非常现实的态度对待依然存在的困难。正因如此，我们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感到很大兴趣，因为我们确信，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人类普遍进步的因素。当然，在同中国同志的会晤中，就象我们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做法一样，我们说明了我们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这种关系在各个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加以发展，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的发展总是应该保障个人和集体的基本自由权利。

在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上，我们同中国同志的交谈和讨论是十分广泛和诚恳的。我们介绍了我们对人民中国的作用以及大家都应该充分承认它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地位的必要性的看法。况且，这些立场也是我们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详细地阐明了的。中

国同志也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立场。结果是在我们之间既有一致点,也有不同点。

举例来说,在一致点中,我可以提到,双方都有为保卫和平而积极努力的愿望,都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都维护各共产党的充分自主,都重视不结盟国家的作用,肯定保持它们团结的重要性。

但是,你们也都知道,在我们之间对战争是否可以避免问题和对苏联是否应该被看成敌对国家(甚至是“主要敌人”)的事实,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对此我们表示了不同意,当然我们同时也指出,我们不同意反过来把中国看成敌人。此外,我们还对中越关系表示了担忧。关于柬埔寨问题,我们重申了寻求政治解决以保障该国人民充分主权的必要性。

这些经过长时间讨论加以深入探讨的共同点和分歧点,也公开地表达出来了:在祝酒词中,在有一百六十名记者出席的总结性记者招待会上,在中国的报纸上,都发表了这些内容。因此,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和我们打算同它发展的那种关系,具有一种超出两党关系的价值,这种关系有其国际作用,尽管程度不同、方式不同。方法和原则是相互尊重和增进相互了解,是无拘束地甚至是公开地讨论有争议的观点,是自主中平等相待,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致力于谅解和寻求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共同行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欢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离华时说得好,“我们之间对某些问题认识和观点上的差异和不同,这只能激励我们互相启发,互相探讨,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求得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共同进步和提高”。

如果这些标准和原则能被所有以社会主义和解放人民为宗旨的政党、国家与运动所接受,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件巨大的积极事

件,不仅对工人运动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也是如此。这一点必须很快实现。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的义务,特别是在今天,世界正处于和平与战争、进步与野蛮、变革与毁灭二者的选择之中,这也正是我们作为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当前所面临的严重选择。

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情况呢?在这里,我不想对正在席卷世界的紧张局势的首要 and 根本的原因再作分析(从我们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就已经多次讲过这一问题)。我只想提请同志们和整个舆论界注意近来暴露出的一个政治原因,这是造成威胁世界和平的那些危险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美苏两个最大国之间的对立和争夺越来越加剧了。而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这个原因更为突出了。

事实证明,每当美苏两国不再对话和寻求一致时,每当它的转向采取单方面行动、诉诸武力、进行干涉、对别国内部事务施加压力的政策时,缓和就发生危机。在此,我们不想追述表明事物的这种发展特点的所有行动(事物一直发展到苏联干涉阿富汗和美国在伊朗的军事冒险)。事实是,通过当前出现的一系列行动和反应,已经开始有一种逐步升级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对世界和平来说极端危险的因素。

拯救和平首先取决于恢复美苏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如果其他一些以自主方式行事的力量和国家不参加进来,以结束今天占优势的实力逻辑,迫使两大国自行克制,并使它们的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都重新遵循谈判的逻辑,在当前情况下,恢复对话和合作则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是为分裂两大国而煽风点火,还是不加批判地附和这家或那家的立场,都是大错特

错的。这对作为某个联盟的成员来说也同样适用。

比如说，如果迎合美国制裁苏联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欢迎西欧奥林匹克委员会呼吁各国派遣各自的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甚至支持美国对伊朗进行的军事袭击，这种行径是有可能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把世界推向全面战争的，这就既无助于和平与缓和事业，也不能帮助美国解决它同伊朗的争端，对于明智地和有效地解决德黑兰人质问题也是无法做到的。我们也理解，美国对本国公民遭到不能接受的关押是感到恼火的。但是，美国领导人至今依然不懂得考虑，伊朗对美国没有承认自己在伊朗国王问题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负有严重责任也深感恼火。

再者，我们不要忘记，如果美国的目的不仅在于释放人质，而且在于消灭伊朗革命，复辟类似伊朗国王的反动政权，那么，意大利和欧洲是不能跟着它走这条路的，因为我们关心的是确立一个同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政策。这也是为在伊朗建立一个能逐步消除伊朗革命中依然存在的狂热主义和教会宗派主义的过激表现的民主社会和国家作出我们的贡献的最好途径。在这一事件中，意大利政府的态度是自相矛盾和举棋不定的。起先，它似乎想对美国此举提出批评，但几天后却又蒙起眼睛，几乎表示要预先支持美国可能采取的其他冒险行动。科西加先生在佛罗伦萨就讲过，国际形势可能“要求意大利负起重大责任，我国可能要作出复杂的抉择，这些抉择可能会使我们陷于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这样提出了问题。一位总理竟然对如此微妙的问题作这样晦涩的讲话是令人惊讶的。全国有权了解这个问题，并且要求政府讲清楚。



究竟有哪些力量能够在世界上进行活动,使国际关系、首先是美苏关系重新回到缓和、和平解决现有冲突、裁军、合作的轨道上来,以争取一个基于各国独立和互利的世界性发展呢?

这些力量是很多的,也是很重要的。有不结盟运动和国家,必须促进它们的团结;有西欧,特别是西欧工人运动和民主力量;有各大洲存在的进步与和平力量;有那些以和平、博爱和正义为宗旨的宗教机构与文化运动。

如果所有这些力量以各自的风貌、各自的活动形式和存在形式行动起来,以净化世界气氛,使理智和人类的长远普遍的利益重新居于主导地位,那么,正在导向或者有可能导向战争的进程就可以被遏制,就可以被挫败。

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所应起的作用的,我们党是意大利的党,是整个世界工人运动的一部分,特别是扎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

我们是欧洲团结的坚决支持者。我们不会使意大利加入欧洲国家的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问题,也不会损害由此而来的、在公约确认的协议所规定的地理范围内承担的防务义务。但是,这一点不应妨碍欧洲以它的自主行动确立和发挥自己的世界性作用,这种作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以缓和、恢复东西方对话、促使美苏重新接近、削减军备以保障欧洲所有国家安全为方向。为此,我们为争取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得到变革、领导阶级得到革新的欧洲而奋斗,这样的欧洲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建立的关系不再是殖民主义式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平等与公正基础上的合作关系。

大体上说,这就是我们对当今世界的问题和关系所作的分析。

这是一种世俗的分析，也恰恰是一种政治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要使这种分析愈来愈不被唯意识形态论、教条主义和神话所损害。正是因为这样，我确信，我们的分析也能够开辟前景，激发正当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摆脱了旧的障碍，从而指出一条真正变革意大利和欧洲并有助于以和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为目标革新整个世界的唯一道路，这条道路肯定是前人未走过的。

我们提出的这条道路——我们是愿意勇往直前地走下去的——符合世界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运动当前所处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在八十年代的西欧（这个欧洲需要从日益分崩离析的状况和日益令人窒息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今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是不能沿用的，曾经在资本主义西方试验过的社会民主党道路也是不能再走的。在现阶段，只有我们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或者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才是可以设想的，也才是可行的。也就是说，这是从历史上和文化上批判并发展以前那些道路的一条道路。因此，这条道路有别于以前的道路，并且要超越以前的道路。为了能够走通这条道路，就需要有这样一种谅解：这种谅解使所有真正代表西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管信仰如何，都能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我确信，这样的分析和看法，由于是以实际的历史进程和政治进程为依据的，因而是彻底革新的，是最能符合意大利和欧洲青年一代中广泛存在的那种需要、意向和感情的，即使所有这些往往还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

青年人，至少是他们的多数，在他们周围的事物和世界上许多痛苦复杂的事件——包括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时是交战关系——的推动下，恍然大悟地看

待世界。这种情况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诚然，由此可能产生不信任或者怀疑，但由此也会产生认真分析的要求，这种认真分析不再重复已经流于空谈的旧公式、旧思想和陈词滥调。他们要求的正是一种世俗的分析。今天，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理想成为可信的东西，因为这种理想是业已经过革新的理想。

认为从今天的青年一代中，不可能出现愿意在新的道路上进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巨大新生力量，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们所处的物质条件、思想条件和精神条件促使他们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准则和已经破灭的目标。我们的重大作用正在于：通过我们所主张的思想、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和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来表明：可以有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我们为这一社会主义指出并准备条件，但如何向这一社会主义具体地迈进，如何真正建设这一社会主义，则应该主要由青年人去做了。要按照每一代人所特有的、同前一代人相比是特殊的那种愿望来做到这一点。

我离开了意大利十五天，虽然我已经知道我国发生的主要事件，但也只是在最近一周中我才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完整的看法，这也是因为我翻阅了前些天的报纸。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开始打击恐怖主义。今年头几个月，犯罪活动变本加厉起来，被恐怖分子残酷地杀害的共有二十八个同胞。此外，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正继续升级，比如星期五我们又看到了另一起谋杀案，即对建筑师塞尔焦·伦奇的杀害。

但是，事实上，近几周来，已经逮捕了許多人，调查也有进展。恐怖主义广泛的组织机构已经摸到了。人们已经发现，这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游魂；可以勾画出红色旅和其他颠覆性组织的某些

地形图了；某些新材料也收集到了，甚至也有关于莫罗<sup>①</sup>被害惨案的材料。战斗当然还没有结束，而且肯定是困难的，对此我们并不抱幻想。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最近这个时期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为什么能取得不容置疑的积极成果。原因之一肯定是司法、警察和宪兵等国家机构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它们没有被吓倒，并且善于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尽管存在着一直没有完全改革好的旧条例所造成的障碍，尽管经费长期不足。另一个原因则是触及各恐怖主义集团的危机；正是由于这一危机，才有恐怖分子作出自供，这一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思想危机和个人危机。我们清楚地知道，恐怖分子都是犯罪分子，他们所干的野蛮而残忍的勾当就是证明。但是我们也清楚，他们并不是雇佣的杀人犯；我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尽管是反常的意识形态，所以，一旦由这种“意识形态”所蛊惑起来的幻想破灭了，许多恐怖主义分子便陷入危机，这是合乎逻辑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得到了何以人们终于能给恐怖主义以某些沉重打击的最深刻的说明。深刻的理由应当从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及其组织——首先则是意共——顽强而又不间断地动员起来这一点去寻找。这些力量的动员蚕食了、日益缩小了恐怖分子赖以活动和隐藏的地盘。这一原因是国家机构发挥更大效率的根源所在。确实，这些机构：警察、宪兵、特工人员、官员和法官都感到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得到了公民的坚决信任和合作。这一原因正是恐怖分子危机的根源所在，他们已经开始具体地感到自己周围

---

<sup>①</sup> 阿尔多·莫罗（1916—1978），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任政府总理。1978年被红色旅杀害。

的反感情绪,觉察出自己是孤立的。特别是,恐怖分子已经开始懂得一件事,即:在工人阶级当中,他们“通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原是想使意大利工人阶级偏离自己的民主选择,这一选择是通过抵抗运动加以确定的,在以后年代又一直坚定地保持下来。

工人阶级、劳动者运动,面对着过去和现在一些假冒共产主义之名和利用共产主义旗帜进行活动的集团,总是拒绝向采取冒险主义道路和放弃民主场地作任何让步的,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民主场地是不可放弃的,只有立足于民主场地,任何前进和革新才有可能,才能持久。否则,反动派就会获胜。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莫罗先生被绑架期间,我们是最坚决地拒绝谈判的,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当时,如果接受谈判,就意味着使恐怖主义合法化,给它公民权,并且鼓励它从事变本加厉的讹诈勾当。而这种讹诈勾当,一旦冲破堤坝,就再也不会遇到必要的抵抗了。

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民主之间的这种牢不可破的联系得到保持和巩固,如果主要地不是依靠我们共产党人,那又是依靠谁呢?在这场战斗中,毫不动摇地全力以赴进行彻底斗争的,如果不是意共,那又是谁呢?如果没有我们的这种积极参与,意大利的形势又会陷入何等境地呢?

面对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不值得去收集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党的某些头面人物硬说共产党人在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方面负有责任的谰言了。但是,揭露某些指控的愚蠢、卑鄙、居心不良,特别是揭露这些指控在必须使人民和民主力量最大限度地步调一致,以便粉碎恐怖主义的时刻造成的危害,倒是值得的。

就在我访问中国和朝鲜的那些天里,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

共和党三党新政府在议会中提出来了。我读了内阁总理的“施政纲领”说明,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施政纲领”,尽管他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对许多根本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社会政策等问题,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就是说,这些话表明,没有作出任何抉择),或是一些推托之词。因此,执政党之间实质上只是在“部长”和“副部长”的席位问题上达成协议(非要有八十五个部长和副部长才能交账)。总而言之,这种协议是纯粹在这些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派别之间如何分摊权力这种准则的基础上达成的。现在,还想按照这种逻辑来任命其他公共机构和银行、广播电视台的人选。而前几天,这种逻辑已经导致刚被任命为国家碳化氢公司董事长的埃吉迪辞职,他的辞职是为了抗议克拉克西<sup>①</sup>硬要安插其亲信担任副董事长。选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家国家石油公司发生这种混浊不清、没完没了的事情,究竟能对意大利的经济和对外关系带来什么好处。

同时,天主教民主党,更确切地讲是在代表大会中获胜的多数派,亦即所谓“前言派”,这个多数派担任了党的主席、书记和副书记,从而把党的最高职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它正在以再清楚不过的方式暴露它的灵魂和政治目标。也正因如此,面对着天主教民主党许多领导人牵连在内的丑闻浪潮,在坚决要求正直和廉洁的舆论面前,天主教民主党现任领导人不是揭发和打击本党队伍中的贪污分子,而是发动一场完全是捕风捉影和凭空捏造的反对意共的宣传运动(他们甚至重弹意共是什么“莫斯科的掌上明珠”这种论调!),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无非要制造巨大的烟幕,以使天主

---

<sup>①</sup> 贝内代托·克拉克西,意大利社会党书记。

教民主党得以保持和扩大它的权力体系，而这个权力体系大部分是建立在收买人心和贪污受贿之上的。

更有甚者，天主教民主党在布莱夏召开的关于地方政府问题的会议上，丝毫没有具体地讲到纲领，相反地对左翼地方政府却发动了喋喋不休的攻击，而左翼地方政府才是唯一能够向公民们交待所取得的积极成就的政府，尽管在这些地方往往有过去天主教民主党管理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和来自中央政府的不断阻挠。这种攻击是为了压制地方机构的自主。

多纳·卡廷先生曾断言，意大利必须刮起“健康的反动之风”。这番话他是赤裸裸地大声讲出来的，而他的朋友们讲这话却是交头接耳。他的这种断言使天主教民主党“前言派”的行动方向暴露无遗了。有关“全国团结”的议论就此告终，而在最近召开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还力图以此掩盖他们所作的决裂和向右转的政治选择的实质呢。

我不否认，在天主教民主党内，甚至也在政府内，有一些愿意保持建立有效的全国团结和成立一个充分体现全国团结政府的可能性的力量和个人。但是，政府据以建立的逻辑和决定政府方针的那些主要力量的思想倾向，是朝着与上述目标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朝着加深分裂和反共的方向发展，是企图成立朝思暮想的五党政府（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可能采取的最落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法将会使一切对改变施政方法、改变经济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希望遭到压抑。

因此，我们对当前解决政府问题的方法的批评日益被证明是有根据的，从而也证明对政府采取严肃的、彻底的、明确的反对态

度是必要的。

采取反对立场对劳动者和对国家来说，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有益的。比如说，前几天，当我们作为反对派进行的斗争在议会中迫使人们接受对雇佣劳动者大大减税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作为反对党的行动是能够在一系列方面取得具体成果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行动得到群众运动和人民支持的时候。我们今天和将来都应该这样做，致力于解决所有最尖锐的问题：从住房问题到改革退休制度问题，从能源问题到青年就业问题。

既然这个政府不是推行墨守陈规和停滞不前的政策，即采取错误和令人失望的解决方法，那么就只有同我们党站在一起，只有发挥和加强我们的力量，只有动员群众，才能争取到变化和积极成果。我们的反对派立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解决各个问题的尽可能正确和合适的办法。它的目的还在于改变政府和政治领导，这种改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这届政府、这个多数派是脆弱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短短几天之内，政府就已经在议会中被击败了四次。其原因有的是由于政府多数派的议员缺席，有的是由于在投票时多数派内部出现了使之分裂的矛盾。然而，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一些人数不少的政治派别采取的政治立场（这些立场同两党的书记处的立场是不同的），那么就可以看到，本届政府在政治上并不拥有多数，恰恰相反，倒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多数，这个多数就是由确信有必要采取以有效的全国团结为基础的另一种政治解决办法的力量组成的。

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已经使一些力量发生了转变，促成了新的汇合，澄清了局势，尽管我们的政策并非没有错误，对于这些错



误,我认为在前几个月,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这就是说,我们的路线正是朝着我们几年来所遵循的方向,通过我们几年来所走的道路取得了成果。正如我们一贯指出的,这条道路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组成的;但是,这条道路一直是追求实现具有不同倾向和不同信仰的各种人民力量即共产党力量、社会党力量、基督教力量的汇合这一目标,尽管要经过艰苦的对话。这始终是我们的政治行动的依据,不管我们党在议会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在今天,这一点也是确实的,而且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它符合我国的根本需要。

当前,我们为了接近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也要经过即将于6月8日举行的行政选举。这次选举的中心问题应当是有关市镇、省、大区各级的预算和管理方式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号召公民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使他们能根据对各党在地方机构和大区中已经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进行评判来作出政治选择和进行投票。

但是,显而易见,这次行政选举的结果必将对全国范围的政治关系以及对政府的方针和前景产生不容否认的影响。比如说,今天由“前言派”一伙、由一些抱着煽起“反动之风”(多纳卡廷语)的愿望的人领导的天主教民主党一旦取得成功,显然就会造成严重倒退,从而使全国陷于尖锐紧张状态的前景,同时也是对天主教民主党内比较开明的那些派别和人士的政治立场,对他们进行活动和获得进展的可能性的一个沉重打击。

很清楚,如果与此相反,意共取得成功,那对于反对保守派和反动派卷土重来的威胁,反对社会形势与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就会是一种最可靠保障。同时,意共取得成功,就会有助于给

无论是天主教民主党内还是任何其他一个民主政党内最主张团结的力量带来信心，给他们提供更为广阔的活动余地。尤其是意共取得成功，就会使社会上渴望革新国家和改变政治领导的力量发挥新的干劲。

我们的展望和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明确的、清楚的，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恰恰相反，应当努力工作，以求大力开展对外界的活动；我们既充满自信，又十分清醒。这种自信和清醒来自我们在国际上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以及国际上对我们党的尊重，也来自我们在国内为革新国家，为使国家免于崩溃而追求的目标。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代表工人阶级、妇女、南方居民、老年人、失业者、知识分子、特别是男女青年，并使他们参与上述活动。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善于扩大我们同广泛的人民阶层的关系。这些人民阶层，特别是天主教界的人民阶层，也同样对和平的前途，对反动倒退的威胁，对道德败坏和秩序混乱的现象，对许许多多政府人士在政治上的短视表示担心。

(译自 1980 年 5 月 5 日意共《团结报》)

## 二十世纪的加里波第<sup>①</sup>

在意共主席路易吉·隆哥葬礼上的讲话

(1980年10月18日)

隆哥同志同我们永别了。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一个意大利人所完成的业绩是多么伟大。

隆哥的政治生涯就是我们党生存和斗争的六十年。他既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者,又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儿子。他的生涯表明怎样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也表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应当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向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一个人告别,这个人通过这条道路证明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意大利人之一,是祖国数十年历史事件的一个主要人物。

隆哥的一生是一位传奇式战士的一生,也是一位敏锐而又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一生。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组织者,但也是一

---

① 朱赛佩·加里波第(1807—1882),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家统一运动的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隆哥率领的活跃于意大利北部抗击德国侵略者和意大利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游击队,曾以加里波第命名,称“加里波第纵队”。

个充满幻想的作家，一个热衷求实、但也因此在理论上是造诣很深的实干家，他不能容忍那种纯属夸夸其谈的作风。由于这个原故，隆哥在主要原则和决定性目标方面是坚定不移的，他也善于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成为我们党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

但是，倘若没有一种既强烈又含蓄而不露锋芒、并且还饶有风趣的激情，这一切本来是不可能的。这一风貌恰好同以下情况相反：有人曾把这位革命家加以丑化，描绘出一副满面怒容的狂热分子的滑稽嘴脸（至今还有人这样干呢）。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千百万共产党人、反法西斯战士、民主主义者都学会尊敬和爱戴隆哥，因为他们领悟和理解到，他的镇定自若和一丝不苟，以及他那不落俗套的幽默，都是同任何官僚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正是他富有人性的表现，他意识到自己所要肩负的责任和履行这一责任的艰巨，这也正是他既谦虚又勇敢的标志。因此，他一直以忠告帮助他的党，甚至到他一息尚存的时候，甚至到他只有头脑还保持清醒的时候。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也要对他永远感激不尽。

我们之所以感激隆哥，是因为：在今天我们周围的现实充斥着混乱不安和是非颠倒的情况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具体的榜样和明确的道德楷模。隆哥的一生就是这样，就是范例，他不是叫人盲目信仰什么可靠的命运。这种盲目信仰只不过是其他人对我们的信念所做的一种歪曲罢了。隆哥为我们提供的范例在于：要对我们为之而斗争的那些价值抱有最大的坚定性，但同时又要不断作出艰巨的努力来正确理解如何权衡目的、目标和方法，以便使自己不致作出机会主义的让步或陷入极端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境地，使自己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丧失自己行动上的稳健。他曾认为，他自己的坚定性和顽强性部分地来源于他的

农民出身，他对这一出身引以自豪，认为这是他的真正本色，同时却几乎不谈他少年时代曾是个模范学生，青年时期则是个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

出身也许是重要的，但修养无疑更要紧。一个人在都灵，在意大利这个工人最多的城市中，通过战后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政治上成长起来，这正是隆哥得到的修养。这一修养给他这个共产党人永远留下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我认为，这样的修养，对于任何决心支持进步事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影响。这一修养就是：对工人阶级、对人民、对男人和妇女中最受排挤、最受侮辱的那一部分人忠心耿耿（他按照老的说法把这一部分人称作“穷人”），对社会的不公平始终感到义愤。同时他还受到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思想和道德上的教导的熏陶，他越觉得这种教导正确，就越向葛兰西靠拢。他最初是站在波尔迪加<sup>①</sup>立场上，后来才慢慢受到熏陶的。

隆哥年轻时曾是社会党人。他曾使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同共产主义者站在一起，并把它变成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二十年代曾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多年。正是由于年轻时同青年们一起进行的斗争，隆哥对青年一代一直是敏感的和关怀的，直到最近也是如此。

隆哥是在十月革命鼓舞人心的年代靠拢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通过二十年代初在意大利和欧洲受到的严峻教训，他终于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里昂代表大会<sup>②</sup>上同葛兰西站在一起

---

① 阿马德奥·波尔迪加(1889—1970)，意共创始人之一，意共首任总书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路线，1924年被撤换。1929年被开除出党。

② 指1926年意共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批判了波尔迪加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通过了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路线。

了。经验再次证明，口头上显得最激进的路线不再是革命的了，而正相反，那条能对现实作出更全面分析的路线，那条要把共产党变成意大利进步的真正主角而不是变成宗派的路线才是革命的。

作出上述选择是困难的，然而他领会到，而且也这样教导我们：人所作的根本选择应当是始终如一的，而如果不愿意遭受失败，那就绝不能或绝不应当把这种始终如一的态度变成教条主义，也就是说，绝不能或绝不应当把这种态度变成没有能力理解历史的变迁和把握新事物，变成没有能力抛弃错误信念。

事实上这是隆哥最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教诲之一。里昂代表大会之后，他还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内制订过一条名为“青年反对派”的路线，由于陶里亚蒂的批评，这条路线失败了。但无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他都没有把不同政见变成扰乱和分裂的因素。他教育他的党要好好地理解：在党内可以充分表达不同的政见，活跃民主生活，同时也要加强党的团结和斗争能力。一个党内部，如果任何引起争论和对立的原因都变成不可挽回的决裂，那么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团结的党。但是，如果一个党内存在着庸俗的随大溜的风气，而党内的多数变成了进行内部统治的手段，那么这个党也不是一个团结的党。因此，需要有容忍精神，需要有内部争论，同时也需要有团结。这些都是隆哥所肯定和维护的。我们过去信守这一方法，将来也要信守这一方法。

但光进行讨论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紧密联系群众进行工作和活动。隆哥在教育全党抓这个首要任务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三十年代初，即在人们所说的“转折”时期，共产党须要寻找各种途径，以便即使在非法条件下也要在意大利国内开展政治工

作,使党不再只是流亡者的党;从那时起,陶里亚蒂、卡米拉·拉维拉、隆哥和谢嘉<sup>①</sup>都主张这样作,而且使党的领导机构采纳了这个主张。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是,如果没有浩繁的工作和极其巨大的牺牲,没有成千上万共产党人为使党组织在意大利扎根而身陷囹圄,那就不可能有下一个阶段,即缔造工人团结反法西斯的阶段,这一团结至今依然是共和国最坚实的基础。

对隆哥来说,他的政治锻炼和革命斗争的重要时刻是他在苏联、共产国际和法国度过的那一段时间,是人民阵线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开始采取统一行动的那几年。

隆哥作为领导人的才能是在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中出色地显露出来的。隆哥领导的国际纵队无疑是英雄主义和骁勇善战的楷模,但那里也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民主人士取得政治团结经验的地方,这个经验往往是得来不易的。

后来西班牙共和国悲惨地失败了。但在必须进行爱国游击抵抗斗争的时候,这一财富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都仍然是珍贵的。

认为从那个民族、民主振兴的伟大时代那里再没有什么可学习的,那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不仅因为那时有那样的忘我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的非凡榜样,而且还特别因为在长期反法西斯斗争和抵抗运动中,团结的民主力量制定了在各方面革新意大利的纲领路线,而这一纲领大部分被收进立宪协议里去了。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共同感情正是这样巩固起来的,尽管他们存在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差异。

当时在那些考验中锻炼出了一些人,他们后来成了共和国的

---

<sup>①</sup> 卡米拉·拉维拉,现任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彼特罗·谢嘉(1903—1973),生前曾任意共副秘书长。

缔造者，并且一直是民族的保障。这些人中有佩尔蒂尼、帕里、龙巴迪、阿门多拉、萨拉盖特、马太伊<sup>①</sup>等。

路易吉·隆哥作为加里波第纵队司令、自由义勇军副司令，在这一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又一次象在西班牙那样，既是军事首脑但又首先是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在法西斯垮台后，隆哥从流放地获释。正是他率先鼓励所有反法西斯人士团结起来，进行群众性的武装斗争——而且不仅仅在正规军内进行这种斗争——以实现打败法西斯分子并把德寇赶出意大利的决定性首要任务。

在胜利的解放战争中隆哥表现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大家难以忘怀的。从第一批游击队小组的组成到解放委员会的建立，再到1945年4月25日全国起义，他为创建和组织这些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作出了主要贡献。尽管处境和特点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可以说，隆哥是二十世纪的加里波第。

陶里亚蒂实现了萨莱诺转折，亦即所有民主力量和人民群众力量团结起来，进行反德和反法西斯战争。隆哥在北方坚定地指挥着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工人阶级和城乡劳动阶级，在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他们不仅采取武装行动，而且开展群众斗争，即举行罢工，发动妇女运动，组织青年反抗，动员知识分子。

这就表明了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这就表明了陶里亚蒂和隆哥在意大利历史中过去和现在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们都是建

---

<sup>①</sup> 山德罗·佩尔蒂尼，社会党人，现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统；费鲁齐奥·帕里（1890—1981），前意大利行动党创始人，1945年曾任总理；里卡多·龙巴迪，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属党内左派，曾任社会党主席；乔治·阿门多拉（1907—1980），已故意共领导机构成员；朱赛佩·萨拉盖特，社会民主党主席；马太伊（1906—1962），已故意大利碳化氢公司经理。



立新国家和新的民主制的决定性人物!

正因为新生事物是伟大的,正因为共和国宪法本身就包含了革新纲领的原则,于是它就受到攻击。因此必须立即起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防止向后倒退,继续走已经走上的道路。

隆哥又是鼓励推广组织群众和群众斗争新经验的人。1948年7月14日陶里亚蒂遇刺,民主制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在抵抗运动中曾经指引隆哥的行动的那种智慧和勇气,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了。必须进行斗争,而且也进行了斗争;但也必须避免超过一定的界线,超越这个界线,就会使挑衅阴谋得逞,而使工人运动遭到失败。必须善于举行罢工,但也要在必要时停止罢工。

由于隆哥的领导,党经受住了那次严峻的考验,而首先是民主制经过那次考验之后得到了加强,因为那些可能想把人民阵线的竞选失败转变成对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解放的致命打击的人受到了强有力的警告。

反对这场进攻是艰巨的,有时是可怕的:造成这场进攻的既有严重的歧视,又有蓄意的迫害,还有全国人民力量四分五裂的状况。但孤立和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并未得逞;即使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团结发生裂痕的时候,在有人力图抹煞意大利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特点,特别是力图抹杀如此强大、坚定地保卫和发扬民主,但又不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必须互相关联的共产党的存在的时候,这个企图也没有得逞。

这就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和新党章所宣布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陶里亚蒂逝世后则由这条道路的缔造者之一隆哥把这一政策推向前进。

正是隆哥建议党的领导机构立即公布雅尔塔备忘录<sup>①</sup>,把它

作为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战略和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采取自主行动的牢固依据。

正是隆哥通过他个人的干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革新的努力，并在这之后，同党的领导机构一起采取了反对华沙条约军事干涉的立场。

正是隆哥勇敢地推动我们党对国际主义采取新的看法和作出新的实践，尽管他曾经历过共产国际一段伟大而又复杂的年代。这种对国际主义的新看法和新实践超越了各国共产党的界线，并建立在每个党和每个国家互相尊重和独立的基础之上。

正是隆哥在我们党 1966 年 1 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极为明确地概括了我们对意大利国家在今天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应有的特征的信念和立场。他说：“我们肯定，我们主张国家是一个真正、完全的世俗化的国家，我们既反对教权国家，也反对国家无神论；我们主张绝对尊重宗教自由，绝对尊重教徒和非教徒、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反对让国家赋予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宗教或某种文化艺术流派以任何特权，而损害其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或文化艺术流派。”

我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一位形象高大的政治领导人。但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是怎样一个人，怎样一位人类导师。

我们党的生活贯穿着我们从我们的导师葛兰西、陶里亚蒂、隆哥以及我国人民最优秀分子那里学来的思想作风和道德风尚，而

---

① 雅尔塔备忘录系 1964 年 8 月已故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雅尔塔逝世前留下的备忘录，其中阐述了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立场和政策。

且也应当继续贯彻这种作风和风尚。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年老年少的共产党员作出的个人努力和牺牲,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根本不能生存。

在我们同隆哥同志最后告别的时候,我们也向所有使我们党成为一支伟大的全国性工人力量并在国际上取得实在的威望的同志们致敬,无论他们是最伟大的还是最平凡的。

隆哥同志教导我们如何把渊博的知识、真正的文化、伟大的精神力量同谦虚和平易近人结合起来。他对不懂装懂的作风,对空洞无物和故弄玄虚的唯意识形态论以及冒牌知识里手的自吹自擂深恶痛绝;这种情绪产生于当年曾促使这位瘦削、爱思考的青年隆哥(他年轻时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模样)起来反抗的同一个根源。凌辱弱者和被压迫者的行为总是燃起他满腔的怒火。

他首先严于律己,其次才严于责人。在他患病之前以及患病以后,他的战斗生涯一直是没有间断的苦干。

隆哥为人豪迈开朗、待人亲切,同时又不喜欢表露自己的感情。但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共产党员则是满怀激情的,因此全体同志都深切敬爱他。

我们感谢共和国总统和国家所有领导人,感谢各党代表、各游击战士协会代表,感谢战士们和政治上受过迫害的人的代表们,感谢各工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代表们。谢谢你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感谢你们今天来这里同我们一起悼念这位和平事业、国际团结事业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与正义事业的伟大战士。

谨向隆哥同志的夫人、我们的布鲁娜同志,向他的子女,向他的姐妹,向他的亲人,表示全体共产党人的亲切慰问。

---

对你,亲爱的隆哥同志,我们要说:我们不会忘记你这位榜样。我们要以你教给我们的那种坚定和勇敢,继续斗争,争取实现你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译自1980年10月19日意共《团结报》)

# 同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 社长雷克林的谈话

(1980年12月7日《团结报》)

**雷克林**<sup>①</sup>：我们领导机构提出的政治建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很久以来，党的会议没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一建议有新的东西。很自然，对此除了对手们的敌对反应之外（即使在他们中间，也普遍在思考和持谨慎态度，这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还有疑虑和问题。是什么东西促使共产党自荐为一种广泛力量联合的支柱和聚合点呢？这种广泛力量联合是取代天主教民主党的真正民主代替，因为天主教民主党看来已不再能保证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领导，而这种领导目前是一种生命攸关的极端需要。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提出这个倡议呢？我认为，大家似乎看到：这个建议的新东西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是要臆造出一种新的议会形式，不是搞什么炼金术。人们感到，我们活动的天地是一个新天地，是更开阔的天地。人们感到，实际上我们是要解决更换领导集团和领导阶级的问题，因为这种更换现在也是必要的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建议并不仅仅是向政治力量提出的，而且也是向群众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把群众发动起来，形成群众的动力

---

<sup>①</sup> 阿尔弗雷多·雷克林，现任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兼书记处书记。同贝林格进行这次谈话时任意共《团结报》社长。

和制造舆论。但是,我也认为,还有许多疑点。这一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吗?令人相信吗?它的对话者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要同天主教民主党以及天主教人民群众正面冲突?我们党有没有冒进和宗派主义重新抬头的危险?此外,人们还反复强调一个问题,有时是不怀好意,有时则是忧心忡忡,这个问题就是:同我们的战略相比,这是不是一个转折?

这样,我就同恩里科·贝林格同志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让我们从大家都向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谈起吧:这究竟是不是一个转折呢?

**贝林格:**我并不热衷于字面上的争论,因为它会使人讨论一些抽象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看问题的实质,那么新的东西还是有的,而且很突出,下面我们还会谈到。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战略的彻底改变。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即:为了对付如此险恶的危机,为了捍卫意大利的民主(要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革新它),就必须使伟大的人民力量(包括我们的力量、社会党的力量和天主教的力量)不致四分五裂,而是能找到共同的目标。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这些力量不要脱离政治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本色,以自己特有的价值和自己的政治社会组织来亲自参与政治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共产党独揽大权和霸权主义。团结过去一贯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的旗帜,但是,它不能降低为上层协议,上层协议并不总是可能的和适宜的。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住团结的机体。团结如果是产生于不同力量在国家重大问题上的自由竞争之中,实际上也就是产生于群众在自由和革新的伟大斗争中所经历的强而有力的集体政治活动之中,那么它就是坚强的,不论发生什么政治事件,不论党

派之间发生什么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也不论各党在议会和政府中地位如何,它都能顶住。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成为国家主人,才能支持现有制度,因为正是人民自己参与确定国家目标的。

**雷克林:**请原谅我打断你的话,因为象这样的一番话立即使我们想到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历史性妥协”。

**贝林格:**所有那些“历史性妥协”的掘墓人都使我感到好笑。历史性妥协怎么会破产呢?破产一说不过是这些掘墓人把它丑化为一种纯粹的政府公式的手法;而更糟糕的是,把它作为我们同天主教民主党之间的一种权力协定。我们已经说过一百次了:历史性妥协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在意大利历史和全国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因而也就是在不同阶级之间寻求一种汇合,这种汇合要使一种在尊重多元化和共和国宪法的情况下进行的民主变革成为可能(有人说,这是第二个一九四五年<sup>①</sup>)。批评我们的人想要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他们恰恰想阻止这种变革,甚至不惜以剧烈冲突为代价,因为他们很清楚,某种形式的历史性妥协是这种变革的唯一可能的动力;要么则是他们指望意共不再为争取一个建立在民主、多元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不论是重新回到阶级对阶级的冲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去也罢,还是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念也罢。他们一定会失望的。我们的战略就其实质性的基本内容来说,仍是有效的。

**雷克林:**我觉得,重新肯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澄清了许多含糊不清的说法,同时,也使我们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接触到我们提出这个倡议的真正原因。

<sup>①</sup> 这里的“一九四五年”指意共在1945年底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促进全国团结、废除君主制、成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路线。

**贝林格：**的确如此。对这个问题的真正解释就在于形势中有了新东西，也就是说，在于我们对形势所作的十分焦虑的分析。大家是否认识到国家的政治道德危机所达到的危险程度呢？是否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呢？

在我看来，有那么一些口是心非的人，他们今天大喊大叫地反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放弃了团结精神。这简直不可思议。同谁团结呢？难道是同今天使我国走进死胡同的人吗？请注意：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鬼迷心窍，总是想不要失去自己一丝一毫的权力。就是这样，我们在1976年以后所作出的巨大的、慷慨的努力化为乌有了。当时，我们那样做是为了促使天主教民主党、我们自己以及其他民主力量站到对话和互相竞赛的立场上。这种竞赛不仅旨在对付紧急状况，而且是为了在国家管理方面，在议会和工会的作用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在克服一种因反共偏见的存在而变得残缺不全、令人窒息和拉拢收买之风盛行的民主制方面促成一个转折。现在，他们是否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的了呢？

**雷克林：**我也觉得，为了评价我们的倡议，必须从近几年和近几个月发生的动荡事件出发。今天，重温一下反对我们的斗争是如何进行的，那是有意思的。从比萨利亚<sup>①</sup>到社会党的某些派别，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全部政治文化方针的盲目性和贫乏性表现在：他们认为，象我们这样一个力量，是没有用处的，是处于角逐之外的，因为他们相信，紧急状况已告结束，大的改革现在已经是没有用处的了。阶级已不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社会的复杂性”了。正象

---

<sup>①</sup> 安东尼奥·比萨利亚，天主教民主党现任领导人之一。



有人说的，“肤浅地对待”危机就够了。规划化、南部问题、工人阶级的作用、议会的中心地位、为组织一种群众性民主而作出努力，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陈旧”文化的“过时货”。只要给布朗比拉们<sup>①</sup>的自发的积极性提供方便就行了。而这样，恰恰就为当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各党就变成纯粹调解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行会利益的工具。政治就变成耍把戏，追求戏剧效果和电视新闻，而把群众撇在一边。这样，人们自然就不去触动现有的权力体系，而是幻想在天主教民主党把持的地盘上同它竞争。不是去更换领导方式和领导阶级，而是想更换政治人选：你起来，让我坐，也许是因为我更合乎现代潮流、更坚决吧。

**贝林格：**我同意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否则就不会懂得民主情况如此严重恶化了；否则就会觉得，大家都是小偷，如此而已。而且，还会觉得，我们只是现在才发觉这一点。

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围绕着根本政治抉择问题，已经有过严重的斗争。民主团结的破裂造成了恶劣的、危险的逻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立即懂得，我们对科西加政府如此猛烈的攻击正是出于这种严重的忧虑，而不是出于猥琐的、宗派的、反社会党的精神。我们同社会党冲突和论战的根本原因是这样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即：对意大利危机有不同的分析；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两党政策的分歧。今天很清楚，左翼的团结取决于许多事情，也取决于我们方面的正确态度，但是，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作为危机根源的那些真正的症结问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就我们的政治建议中对整个左翼说来具有的那种

---

<sup>①</sup> 布朗比拉系意大利北部地区常见的姓氏。现用来泛指意大利中小企业主。

伟大的团结潜力进行思考。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别的，因为这个建议把严重的客观现实牢牢地放在整个危机问题的中心，左翼如果希望起全国性的作用，而不是起部分的作用，那就应当考虑这个客观现实。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局限于提出一个政治公式，而是建议发起强大的社会动员，使知识分子、青年、工会以及生产、科学、技术、公共行政管理部門的健康力量重新活跃起来。

**雷克林：**把这些看法归纳起来，也就可以说，不是我们突然改变战略，而是形势改变了。

**贝林格：**不错。如果不从这一点出发，不从形势中这些重要的新情况出发，那么对我们的倡议就会一窍不通。我们应当面对现实。三十年来，制度危机，甚至共和国的崩溃，第一次成为现实的危险。如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倡议，我就这样回答他：首先是为了阻止这种崩溃。我并不想叫人惊慌失措。但是我要说，国家和制度之间，人民和领导阶级之间的脱节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不介入一种新的因素，不发生一次震动和一个积极的转折，那么迟早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黑暗的、冒险的结局。这就是我们行动起来的原因。

**雷克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路了？

**贝林格：**哪些路呢？当天主教民主党明显地证实它没有能力使国家拥有最起码的政治道德领导，它那里已发生的危机正在蜕化为腐败、四分五裂、乃至名副其实的派别之争时，再要求取消反共偏见就不够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同全国健康力量一道，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即道德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个人，同时也不能被理解为要求取缔这样一个党：这个党在社会、人民、国家和国家机器的许多健康力量中有着深厚的根基；而是意味着

要取消这个党的权力体系。

**雷克林:**但是,从道德问题出发,是正确的吗?

**贝林格:**道德问题早就存在了。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首要的和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恢复对制度的信任、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制度的继续存在,都有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如果大家想防止意大利降为二等国或三等国,那么就应当作出巨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这是事实,是严酷的现实。天主教民主党有威望做到这一点吗?简单地说,这就是今天意大利的政治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求助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吗?改变共和国的议会性质吗?要求共产党在顺从地支持天主教民主党、支持现在这个天主教民主党的行动当中耗尽自己的巨大的、完整无缺的政治道德威信吗?那时候,不信任的情况就会是普遍的了。如果我们仅限于揭露的做法,也会无助于制止这种不信任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不明白对我们的建议提出的某些异议。我们的建议是要把我们作为这样一个政府的动力和最大保障:这个政府应包括意大利民主的所有健康力量,包括各党派内外的正直而有才干的人。在这个政府中,天主教民主党不再是轴心,也不再拥有总理职位。即使从议会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正确的了。我们是共和国的第二大党;我们表现出人所共知的严肃、肯干和无私的品德;我们具备人所共知的忠于民主和宪法的条件。

**雷克林:**我听说,有些人,特别是民主天主教徒中间有些人,不同意把道德问题放在中心地位,因为他们害怕有使人民力量陷于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可能会有利于在暗中搞阴谋的黑暗势力,这些势力在腐化和玩弄权力阴谋中陷得并不比天主教民主党浅。

**贝林格：**因此，我要指出，在信教群众和天主教组织中对于整顿公共生活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对于天主教民主党内腐败现象的指责也是普遍的。提出道德问题并不是要分裂人民。这意味着要同整个权力体系和执政方式划清政治界限。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性关键问题。我已经说过，道德问题同能否治理的问题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同恢复全国对民主制度的信任是一回事。我们把道德问题放在中心地位，就是不仅提出国家机构要正大光明以及各党派要有道德的重大问题，而且还鼓励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为检查各项决策重新提供条件，为真正的团结重新创造条件。没有这一切，要摆脱现在这种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雷克林：**地震就是极为明显的教训。

**贝林格：**是的。部长们说，现在不是论战的时候，而是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努力对付天灾的时候。如果这种告诫是针对我们的，那他们就把对象搞错了。实际上，也不能把共产党人已经做的事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拿来同其他党派正在做的事相比：我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动员了从南到北我们的全部组织；我们还使我们的领导机构和中央委员会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想办法，出主意。而且，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是完全无私的，并且寻求同一切善良的人们的团结和友爱。在这一严重时刻，为了不致造成无人管理的局面，我们还排除了一场政府危机。

但是，政府显然要求另一个东西，而如果把这个东西让给它，那是荒唐的。政府要大家不要谈论责任问题。

地震使意大利震惊，这不仅在于它造成了人间巨大悲剧，而且也在于它赤裸裸地揭露了国家的条件同我国最起码的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对南部内地的衰败和被掠夺情况要负历史

责任,这一问题重又暴露出来了;整个南部问题的严重性也重又显示出来了,而“现代化”的理论家们则早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永远被搁在一边了。德马蒂诺<sup>①</sup>引人注目的讲话给我印象很深,我同意他所说的。他说,“如果今天不来一个转折,不仅南部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一切问题,整个意大利问题,国家的民主生存问题也都得不到解决。”

我也要问一下,现在,在发生天灾之后,我们是否认识到我国为了复兴灾区而应当予以解决的那些问题了呢?特别是,我们是否认识到应当引进整个国家发展的概念中去的那些新内容了呢?因为最严重的问题倒不是要把资源收集起来,投放到南部去,而是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问题,亦即:要达到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渠道?靠哪些保证才不至于重蹈比贝利切<sup>②</sup>严重百倍的覆辙?用什么形式来实行人民参与和民主监督,用什么手段来防止和打击鲸吞公款的拉拢收买勾当和黑手党活动?有人说,对南部来说,现在是一个历史性时机。的确如此。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这次要给旧的权力体系以真正的打击。否则就会出现德马蒂诺说的那种情况。这种由于重建工作的失败而感到受屈辱和愤慨的情绪,就不会仅限于南部了,它会使整个国家发生分裂。于是,我们就发现成立我们所建议的政府的客观基础了。

**雷克林:**你谈到制度面临危险。具体地说,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提前大选会使这一危机加速发展。

**贝林格:**导致制度深刻危机的危险是现实的。确实,这一危机也可能会通过本届议会又一次不幸中断而急转直下。任何看到这

<sup>①</sup> 佛兰切斯科·德马蒂诺,系意大利社会党前任书记。

<sup>②</sup> 意大利西西里岛一地名,六十年代曾发生强烈地震,重建工作至今仍未完成。

一危险的人都有义务寻求解救办法，而不能回避就我们的建议进行负责的讨论。

必须懂得，提前大选会带来什么。所有保守的右翼力量可能会想要求来一个以专制为方向的转折，会给国家能否治理的问题以及给以天主教民主党为中心的体系的合法性所面临的危机，作出冒险的和灾难性的回答。但是，也可能有另一些力量，它们也想要提前大选，却抱着完全不同的打算。比如说，它们企图把意共和天主教民主党都作为意大利坏事的罪魁祸首而相提并论，以便由此来确定虚无缥缈的第三种力量的中心地位。这是一种会造成危险真空的痴心妄想。因为这一方面会使左翼分裂，另一方面会使天主教民主党向右转。

我们提出的道路是维护本届议会的最可靠道路，因为这是一条把各种民主力量团结在建设性路线上的道路。这个建议除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重新找到合作道路的左翼的执政潜力之外，还会为中间力量开辟广阔天地，发挥这些力量的作用，使它们摆脱充当发生危机的天主教民主党的附庸的那种羁绊。

**雷克林：**这是否意味着，对意共来说，整个天主教民主党都不能从事整顿道德和稳定统治的事业呢？

**贝林格：**这是一个要非常严肃地、不要哗众取宠地简单对待的问题。天主教民主党的危机，或者象人们喜欢用的说法，天主教民主党的衰退，是现实的。但这是这样一个党的危机，这个党不仅统治了三十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同国家混为一体了。因此，这样一种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危机会带来创伤，会波及国家和国家机器的一些部门，会造成危机四伏的局面。但是，不能通过俯首听命和容忍天主教民主党权力体系继续存在下去来对付这些危

险。那样,人们就会丧失采取替代办法的一切依据,就会失去在民主场地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可能性。必须彻底反对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力体系,但是,这一斗争要通过不把整个天主教民主党推向右边,不使其优秀力量感到受辱的方式来进行,相反,还要为这些力量提供新的可能和新的场所来采取内部革新的行动。我们在党的领导机构文件中已经指出,天主教民主党没有能力领导一个整顿道德和恢复国家效率的政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闭眼不看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天主教民主党内仍然存在着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力量,这些力量正在寻找使天主教民主党不致丧失中心作用的出路,尽管目前尚未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想,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深刻地改变他们党的方针和做法,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自己的党需要革新,那么他们就应当关心允许改变政府。他们中间有人就说,天主教民主党如处在政府之外,就能更好地做到树立廉洁之风和实现革新,他们这样说也就是承认上面谈到的那一点。

**雷克林:** 各方都有人表示异议,认为我们的建议带有霸权主义、甚至是独揽大权的意图。

**贝林格:** 这怎么可能呢?有一些获得民意支持比我们少得多的政党,合理地提出摆脱天主教民主党中心作用的建议,以便确立自己的中心作用。为此目的,它们挑起了激烈的论战,引起了冲突和紧张关系。为什么却要否认我们有权自荐为民主代替的动力和最大保障呢?何况在这方面,也是一种责任。我们说代替,是因为十分明显,在一直执政到今天的各党的原有体系和营垒内部搞换班,是不够的;而我们说民主,是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要超出左翼各党范围之外的联盟。

左翼在这个联盟中当然有自己的份量,但是,有一些人尽管不是左翼,却都觉察到整顿道德的必要,并打算致力于伟大的革新事业,这些人在联盟中也会有重要的位置。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切实贡献出自己的主张和献身于共和国的措施。

我这样回答也是用来答复你开头说到的那种危险,即我们的建议在党的一些组织中会被看成一种同我们这几年走过的全部路程相比是宗派主义的倒退,因为这几年来,我们越来越把自己说成一个愿意进行对话的党,它抱有高度的团结精神,随时准备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承担起一个执政党的责任和重担;它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自觉地认识到意大利的国际地位、可能性和受到的约束。我理解一些同志的心情,但是,当我听到某些人说什么“终于这样了”,“你们早该在1976年就懂得同天主教民主党没有什么交道好打”时,我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知道,我们犯过一些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也作过分析,而且自从1979年1月我们退出议会多数以来,我们从中也得出了结论。但是,要注意。如果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党,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党,今天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成立以它的力量和它所提供的保障为重心的政府的建议的话,那么这一点之所以能做到,并不是同这几年的经验和道路无关,相反是要感谢这一切。

(译自1980年12月7日意共《团结报》)



# 在意共建立六十周年前夕 答意大利电视台记者 皮耶朗东尼奥·格拉齐亚尼问

(1981年1月21日)

**皮耶朗东尼奥·格拉齐亚尼问：**意大利共产党难道不是通过一次“过左”的分裂，也就是说在一种宗派情绪的推动下诞生的吗？这种宗派情绪竟然在法西斯抬头时却削弱了反法西斯阵线。

**贝林格答：**当意大利共产党诞生时，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意大利的民主已经遭到了失败，而且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党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国性危机时犯了错误。确实，意大利共产党在诞生时，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派。但是，后来它变成了工人运动最大的力量，并为反法西斯斗争、全国解放战争，为我国各劳动阶级的前进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说，意大利共产党的诞生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中最先进部分所深刻感到的一种需要。

**问：**那么在以“萨莱诺转折”为开端的陶里亚蒂路线，即“走向

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和今天的欧洲共产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答：**根本的区别是这样一点，即争取在民主的道路上对意大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以及争取一种建立在民主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经过欧洲共产主义就不再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内，而是在欧洲范围，即西欧范围内了。这是考虑到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点，也是考虑到在目前这一历史时期有必要把西欧工人运动各种政治组织所创造出的经验统一起来。

**问：**介于社会民主党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著名的第三条道路的内容是什么？

**答：**简单地说，它的内容是：一方面，我们想有别于各个社会民主党，我们批评他们，因为从他们执政的经验看，他们从来就不善于在超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真正向前迈进一步；与此同时，我们也想有别于在东欧国家迄今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经验，这是因为我们是为争取一种以尊重并发扬一切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问：**在意共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所形成的有关党的新观点中，如果说不是为分成派别、为相互对立的主张提供了场所，那么也是为不同的意见提供了场所吧？

**答：**不能分成有组织的派别。我们认为，正象其他政党的经验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有组织的派别是民主和政党生活中道德风气本身败坏的一种形式。至于说是为不同意见提供场所，确实如此，而且要以最广泛的方式提供，也包括使不同意见能通过投票得以公开和自由地表达。

**问：**同党在过去所提出的战略相比，“11月27日的转折”，也就是意共所建议的民主代替的含义是什么？

**答：**寻求一切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社会联盟这一点没有变。新的东西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面对着天主教民主党已经表现出没有能力来领导革新和振兴国家这一必要的工作，意大利共产党认为自己有资格提出它是更能保证组成一个所有民主力量的团结政府的动力。这个政府将包括一切党派中正直并有才干的人。

**问：**特别是有鉴于法国共产党的批评，意大利式的共产主义、法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西班牙式的共产主义究竟前途如何？

**答：**我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完全有效的思想，它是有前途的。在它前进的道路上可能有暂时的困难，有高潮和低潮，但是，它内在的有效性在哪里呢？就在于这样一点，即今天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厄运，在这些党的行列中也有人在寻找新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共产党过去采用的一些老形式和老观点过时了。因此就有必要寻找一条新道路。我们认为，不仅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中，而且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青年中存在着这种期望，存在着要寻找某种新事物。这种新事物将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有助于对欧洲大陆这一部分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更新。

**问：**如果有一位新的阿马德奥·波尔迪加或一位新的菲利普·屠拉蒂今天申请加入共产党，他们能够被批准吗？

**答：**加入共产党不是根据对意识形态的赞同，而是根据对共产党政治纲领的赞同（这是全国解放战争后，陶里亚蒂所进行的革新之一）。我相信，不论屠拉蒂还是波尔迪加都不会赞同意共的

纲领，不论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出于那个与此相反的原因，都不会如此。

(译自 1981 年 1 月 22 日意共《团结报》)

# 争取改变意大利和执政

在罗马庆祝意共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81年1月25日)

我们党从诞生到今天的漫长时期中，虽然也经历过危机时刻和犯过种种错误，但在国内外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困难中还是开展了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使自己取得了三个确定无疑和不容置辩的成果：

(1) 意共在意大利就其组织的广泛性和巩固性而言，已完全成为一个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最有代表性的党；就其得到广大选民赞同而言，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民主与和平力量的主要的政治和思想向导。

(2) 意共在西欧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和最有威望的共产党。

(3) 意共在世界范围内已赢得了为争取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从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为维护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而斗争的政党、运动和政府的尊敬。其他政党没有一个象意共这样为人所熟悉，并在国外引起这样大的兴趣。世界上拥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广泛联系的政党也是为数不多的。去年，这种关系通过意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恢复关系而进一步扩大了。

1921年作为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少数派和人数不多的先锋队而出现的党，今天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建议把自己当作国家的新政治领导的动力与保障，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在我们这一建议——它意味着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思想和群众性的斗争——同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关系就在于：一方面，改变领导阶级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经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我们是这样一个党：它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锤炼了作为这种改变的倡导者（当然，不是唯一的倡导者，而是决定性的倡导者）的本领。为了避免社会衰败和国家没落，这种改变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了。

我们很清楚，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是笔直而平坦的，而是坎坷不平的，既有牺牲和英雄业绩，以及我们党的党员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又有悲剧和错误；既有胜利的战斗，也有挫折和后退。

此外，我们党数十年来不仅允许、而且赞助和提倡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我们向学者们提供自己档案中的文献资料，同其他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展开辩论。世界上有这种作风的党是为数很少的。

我们党虽然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但还是站稳了脚跟，并在今天成为要通过革新来拯救意大利的众望所归的力量。

这就是说，一方面可以始终批判性地讨论意共诞生的时机、环境和方式（比如说，我们党诞生时无疑是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这对它的力量和初期的行动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但另一方面，在我们做了上述的一切并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党之后，竟然还要来怀疑决定建立意共这件事，看来就确属荒

唐了。

当时我们党理应诞生,如果我们党不诞生,那就糟了!那对工人阶级,对劳动者,对国家就是一种不幸。归根到底,意共的成立表现了什么呢?它表现了工人先锋队摆脱意大利社会党那样一种领导的愿望,因为社会党虽然在唤醒和组织被压迫群众方面进行过从历史上说是决定性的工作,但在当时却表现出不善于领导必要的斗争,以便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并保障民主获得可靠的发展。囿于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之间的斗争而陷入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社会党,虽然为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和争取政治权利进行过斗争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却没有能力制定和实施能使工人阶级发挥全国领导作用的计划,并在这方面采取政治行动。特别是,社会党虽然在上世纪末曾经有效地对付过克里斯皮反动派<sup>①</sup>,并由此而变得更为强大,但在乔利蒂时期却缺乏远见;在意大利社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起的危机的浪潮冲击中随波逐流。

因此,一支新的、革命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自主于资本主义,并有能力从全国角度来对待自身作用的力量崛起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这条道路上,尽管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既有大踏步的前进,又有暂时的退却,但我们从未停止过战斗,从未停止过寻求同劳动者的一切可能的联系,从未停止过研究,以便了解意大利和世界过去与现在的进程,使我们党和群众能够在这一进程中展开行动和采取主动。当然,要从我们不得已所处的那种往往是残酷的环境(即搜查、监禁、流放、流亡国外)所允许的方式这样做。

---

<sup>①</sup> 佛里切斯科·克里斯皮(1818—1901年),意大利近代史上著名的专制统治者,曾于1887—1891年和1893—1896年两度出任内阁总理。

只需举几个数字就足以证明这种斗争的连续性了：从1926年到1943年，在四千六百七十一名被特别法庭判刑的人中间有四千零三十人是共产党员；在所判的两万八千一百一十五年刑期中，有两万三千年落在我们党的党员头上。在这些同志中，有许多人同我们一起出席了这个大会。我要代表大家向翁贝尔托·特拉齐尼同志<sup>①</sup>致敬，他是意共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在监狱和流放中经受了整整十七年的折磨。

凡是在能够反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地方，凡是在能够组织集会、罢工、抗议、散发秘密传单的地方，共产党员总是站在第一线，作出表率。就是在国外，意大利共产党人也都纷纷前往支持争取自由的斗争，例如在西班牙，我们有数千名同志在路易吉·隆哥的率领下，拿起武器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

这些共产党员的气质是什么呢？

让我们听一听维托里奥·维达利<sup>②</sup>的一段回忆吧，他今天也来了；让我们对他的八十寿辰再次表示兄弟般的祝贺。

维达利在谈到西班牙战争时说：“敌人曾多次认为我们死了，被打垮了，被埋葬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巴蒂斯塔，一切独裁者，甚至包括一些朋友都是这样想的。正当他们说‘现在他们死了’的时候，我们却象耶稣基督那样复活了。我还记得1938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埃布罗大战正在进行中，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死伤人员达三十万（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战役还要大！）……突然发生了大规模的轰炸。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天上有

---

① 翁贝尔托·特拉齐尼(1895—1983)，意共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领导机构成员。

② 维托里奥·维达利，现任中央委员。



各带一吨重炸弹的五百架飞机，它们把大地炸得变了形。轰炸前，那里是一片大松林，但后来被炸得一干二净……当时我们就说：‘毫无办法，人都死光了，没剩下一个能够作战的战士了，我们又没有后备队，那块地盘失陷了。’我们知道，敌人也认为，再也没有一个能打仗的士兵了，因为所有的人看来都埋在泥浆里了。突然间，我们看到：从泥浆中，从被炸得变了形的土地里，钻出来一些人，他们浑身是污泥和鲜血；站在前头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尉，他喊道：‘上刺刀！’那些人立即组成了一个连队，又一次朝敌人冲去。在我旁边的是参谋长温琴泰·罗约，他目瞪口呆，在场的还有莫德斯托，他是一位从战士成长为将军的同志，在他的背包中还放着一根元帅手杖。罗约惊呼道：‘这，这怎么可能呢？’莫德斯托对他说：‘你看，这就是共产党人。当别人以为他们死了时，他们却是从未有过的那样生龙活虎！’”。

同样坚不可摧的顽强精神也是我们参加抵抗运动时的特点。抵抗运动期间，在监狱、流放、地下斗争、流亡国外和西班牙内战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那些来自工厂、农村、大中学校和部队的青年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曾相信过法西斯——作为战士、组织者或烈士，都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这种极为严峻而又光荣的考验改变了我国的命运，因为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地登上了国家生活舞台，而过去在复兴运动和统一全国时，人民群众是被排斥在一边的。在这一考验中可以看到在法西斯暴政期间，共产党员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能够生存下去和组织起来，以及为了培养干部所作出的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努力和牺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这些努力和牺牲为建立民主与共和的意大利这项准备工作作出了具体贡献，而建

立民主与共和的意大利这一事件又使意共成为一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力量,成为我国新的历史上的主角。

这二十年工作,不仅是实践工作,而且也是政治、理论和思想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果也是在紧张和曲折中逐渐取得的。

1926年的里昂代表大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党在击败了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又在葛兰西的领导下挫败了波尔迪加的宗派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左倾路线,在制定适合意大利具体情况的革命战略方面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这一战略当时的核心就是北部工人与南部农民的联盟。因此,把里昂代表大会看成是我们党重建的代表大会,这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法西斯独裁日益凶恶和残酷,反法西斯的力量却在缩小和分散。当时,共产党人认为有必要进行反击;通过1930年的“转折”,我们党尽管意识到这会带来危险、牺牲和损失,但还是决定坚持并加强自己在意大利的积极活动(这一决定并不是没有人反对)。虽然这一“转折”是根据对当时的时局作出相当错误的分析而决定的,但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因为它引导党在国内开展工作,进行斗争。

在这里不可能详谈后来我们党的生活、斗争及制定政策方面的各个阶段,直至战争的爆发、法西斯的垮台和抵抗运动的开始。

1944年3月,正当反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人民斗争和游击战争(我们的路易吉·隆哥同志是这一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已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进行的时候,党根据陶里亚蒂的倡议,实现了萨莱诺转折。这一转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解放斗争,动员全国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实现反法西斯的团结。这一转折同时也指出意共应该具有的不同于过去的那种特点。建设“新党”就这样开始

了。共产党不再仅仅是一个干部党,而且还是群众党;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党(当然,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党),而且还是人民的党;不再仅仅是每天致力于宣传和揭露的政治组织,而且还是从事实际活动、以便解决我国劳动者问题的政治组织;是一个同其他民主力量一起负起治理国家的直接责任的党。

当时的主要目标,除了恢复国家独立和自由外,就是要创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结构。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以及民主宪法的通过(这是一部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的宪法之一),这些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这是意大利历史和社会上那些基本的政治和思想派别进行合作的结果。

意共从1944年到1947年春参加了各届全国团结政府,这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来说,对于开始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解放斗争的热潮推动下,意大利劳动者和人民群众运动由于重新获得了民主自由,由于它在全国的政治作用得到加强,由于它实现了团结,从战后头几个月起就在改善公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既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又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取得更加广泛的权利和干预权。在我们党的支持下,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群众性联合组织又重新出现并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许多市镇重又回到了左翼人民力量的手中,或者是首次为这些力量所夺得。

但是战后不久,我们的团结政策和争取执行民主宪法的斗争就遇到了障碍和越来越强大的抵制。这种障碍和抵制来自特权阶

层、参加全国解放委员会和全国团结政府的政党中最保守和极端反共的派别、盟国和天主教会上层最无视现实的力量和最反动集团所采取的立场与行动。所有这些势力活动的结果是逐步地重新建立起一个以天主教民主党为中心的集团，这个集团从本质上说是反动的，但却拥有很大的群众基础。那时，天主教民主党从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政治干涉中得到了好处，于是在1947年，正当反法西斯各国大联合破裂、冷战开始时，就破坏了三个群众性大党——天主教民主党、意共、意大利社会党——之间的合作，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排挤出政府，并一手造成工会分裂。

因此，就开始了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企图使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从它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上向后倒退；取消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通过抵抗运动和共和国宪法给意大利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影响。

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回击足以抵制住敌人的进攻。从1947年下半年以后，由天主教民主党所领导的各届政府，由同该党结盟的各党以及由天主教会上层中蒙昧主义的教权派所玩弄的种种企图都被粉碎了。这些进攻的目的就在于打击并削弱阶级工会、合作社、群众性民主联合组织的组织力量和斗争能力，特别是打击削弱我们党的牢固地位、政治威信和民意支持，想方设法使我们党变成无足轻重的组织。虽然我们遭到了一些打击（这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所致），但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成功地打败了敌人的进攻。这一回击的重大时刻是1948年7月14日陶里亚蒂同志被刺后立即爆发的总罢工。对于反共迫害，我们并不仅限于抵制、针锋相对地回击以及对抗。通过我们的斗争，我们的行动和我们为解决国家问题而提出的积极建议（我们是在同社会党同志

们一起采取密切的统一行动情况下这样做的，这种统一行动持续了若干年），我们得以激发起广大群众的斗志，把他们发动起来，使广大群众巩固并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就。

在那个时期，反对工厂解雇工人的斗争、占领未耕种或耕种不好的土地的运动、争取复兴南部的运动、大规模地动员人民起来保卫和平，特别是1953年大选中反对欺骗性选举法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挽救了比例代表制这一民主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我们将永远记住这样一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国工人、雇农、农民、男子和妇女，以及一些家庭的父亲和非常年轻的人被骇人听闻地杀害了。这些惨案、这些遇难者的姓名以及惨案发生的地方（梅利萨、莫德纳、蒙泰斯卡尼奥索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所有这些都是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

实际上，这个保守反动集团以及代表这一集团的历届政府并未能使劳动阶级、统一工会屈服或后退，也未能使意共屈服或后退。

1960年7月，由天主教民主党人费尔南多·塔姆布罗尼领导的政府就在这点上未能得逞。这届政府为了留任而不惜接受了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信任票，并且朝着带有赤裸裸的专制色彩的企图这一方向迈出了几步。但群众立即在工作场所和广场上动员起来，采取了声势浩大、团结一致的行动，于是，塔姆布罗尼政府就倒台了。后来，历届中左政府在这点上也没有得逞。这几届政府尽管放弃了前几届政府的镇压政策，并打算纠正意大利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某些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但也还是要孤立意共，要大大削弱意共的政治作用。

从六十年代末以后，由于上述情况，社会斗争扩大了（特别是，青年一代进入生产领域、大中学校和政治生活，对此起了促进作用）。社会斗争的扩大使劳动者对于统一行动的要求，特别是工会方面统一行动的要求更为强烈，并且与日俱增，使变革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广泛了，这一斗争到1968年和1969年工人和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意大利共产党不仅没有置身于这些运动之外，而且成为所有这些斗争的中心，它促进了统一行动的恢复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1968年大选中，意共选票大增，而意大利社会党与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那个党则受挫了。一年后，这个党重又分裂。

这样，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为了我国前途，在公认的平等尊严和真诚团结的基础上，其他民主党派和意共建立积极关系这一必要性，就重新提出来了，并被置于全国生活的中心地位。

从1969年起，就进入了我们目前仍在经历的阶段。我不想回顾这一阶段的种种不平静的事态的演变，你们大家对此是记忆犹新的。

但是，我想使我们自己，使所有人都记住这一点：在从解放到今天这一整个时期中，意共不仅发动和进行了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扩大工人阶级政治影响的伟大的、持续不断的斗争，而且还以创造性的思想为依据，以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这些在我们党的形成与发展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全部业绩为基础，做了深入探讨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的大量工作。

1944年萨莱诺转折和创建新党之后，如下事件是具有决定性

重要意义的：

(1) 出版并学习《狱中札记》。《狱中札记》显示了葛兰西思想的全部丰富内容；葛兰西思想后来对意大利的文化，也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2) 1954年陶里亚蒂发出的呼吁。他呼吁共产党同天主教界，面对核威胁所造成的可怕的新情况应实现会合。

(3) 1956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阐明并发展了意大利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特点和内容，确认了摒弃领导党和领导国的原则。

(4) 雅尔塔备忘录。

(5) 1966年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隆哥同志的建议，确立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包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即认为国家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

(6) 指责华沙条约部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指责建立在一种明确的态度之上，即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各国人民和每个国家的主权原则以及各党自主的原则是不可放弃的。此后，我们对上述原则一直是始终如一地加以重申和遵循。

(7) 作出欧洲主义的选择，也就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开展工作和斗争来改造共同体并使之更加团结。

(8) 通过历史性妥协、厉行节约的主张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发展了我们的团结和革新战略。

(9) 1979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进一步的新贡献，这里特别涉及到我们的国际政策，新国际主义的提出和我们在妇女问题及妇女解放运动、天主教问题及宗教问题上的立场，在明确我们

党的世俗性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在回顾我们制定政策的这些基本因素时，我们应当不给人以一切都发展顺利、从未间断过的印象。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行动立足于根本的连贯性，但还是发生过失误、贻误时机、转折的时刻，对新事物的抵制以及我们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

我们早已确立并实践了一条建立在党的充分自主、寻求同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建立自由的、更加广泛的关系基础之上的国际主义路线，而使我们得以做到这一点的过程是特别艰难的。

怎样解释这一切呢？我们是在十月革命的浪潮推动下诞生的。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十月革命第一次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缔造了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家。这场革命由于有了列宁，克服了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机械发展的结果，这种宿命论观点。此外，在法西斯和战争年代，我们党同其他共产党一样，曾同苏联保持过那种被称为“钢铁般的联系”。从历史上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这种情况给了反法西斯战士以巨大的力量和信心，但结果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即全面赞同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这些事情所作的解释。

战后，陶里亚蒂立即明确表示，在意大利不能象在俄国那样干了。他在1947年初于佛罗伦萨召开的组织会议上指出，走通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了；在意大利、争取超脱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在保障自由和尊重民主原则的情况下来完成。

我们应当思考一下我们在1947年至1956年之间所采取的立场，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



当时,决定性的情况是国际上的决裂和对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进攻;在意大利,决定性的情况是对我们党、社会党和统一工会的围攻、歧视和正面冲突,企图扼杀我们党、社会党和统一工会的力量及其抵抗能力。所以,当时必须作出这样的根本抉择:即必须保卫我们和整个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阵地,同时也保卫国际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阵地。我们当时也根据形势的要求,坚决地这样做了。但还是要象陶里亚蒂多次指出的,必须记住和强调我们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并没有变。我们并没有偏离那条确定我们作为民族力量而发挥作用的路线,没有放弃不断寻求工人阶级、民主力量的团结,没有放弃一个群众党的建设。我们既没有企图搞宗派关门主义,更没有企图去冒走冒险主义道路的风险。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当时我们的前景就没有出现过某种模糊不清的情况吗?难道上述两种倾向(陶里亚蒂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必须完全摆脱这两种倾向所造成的障碍)在1947年至1948年不正是由于没有足够地维护并阐明以民主方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路线而得到助长吗?也就是说,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对东欧国家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回答难道不是模棱两可吗?不是过分服从反击保守势力、反动势力、法西斯势力的一致进攻以及反击许多方面别有用心的阴谋的需要——尽管当时有这种需要——吗?难道不是很少服从解答许多民主人士的疑问、忧虑和内心的恐惧的需要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始终坚信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多样性。我们要探索、并且也要不断走我们不同于东欧国家经验的独特道路。我们不仅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肯定了我们这一立场,而且还通过明确的理论主张申明了我们这一立场。

不论如何,事实终究是,从1956年到今天,我们在发表意见和

采取国际行动上的自主逐步得到确立；今天，我们的这种自主是如此明显，并为世人所公认。因此，我们某些盛气凌人的意大利批评家们居然执意要我们拿出什么证据来求得他们的信任（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作），那确实是很可笑的。

今天，意共提出自己要成为一个新政府的动力和最大保障，这个政府将包括意大利最优秀的民主力量。我们认为，通过我们六十年的实践斗争和政治思想立场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资格向意大利和全世界表明，我们作为上述动力和最大保障的人选是正当合理的。

我们已经表明，我们对民主绝对忠诚，因为从过去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歧视的年代到反对恐怖主义的今天，我们一直是坚持不懈地维护民主的。

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一个在道德上光明磊落、在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中坚韧不拔的党。

凡是在我们经受考验的地方，我们都已经表明，我们有管理行政事务和执政的才能，具有高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效率。这一点在坎帕尼亚和巴西利卡塔大区发生地震期间和以后都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一支民族的、自主的力量，这支力量热爱我国的独立、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信守我国的国际盟约，坚决主张必须使欧洲承担其应有的保障世界和平、促进东西方和南北方各国人民与各个国家之间合作的职能。

除此之外，我们在1976年后成立的民主团结议会多数当中也提供了证明。在这尝试中，我们犯过一些错误，对此我们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无论如何这一尝试已最终地结束了。但事实毕竟是：我

们没有破坏那个团结,我们没有为宗派打算所驱使,我们的行为是端正的和光明正大的,而其他党派则出于宗派,打算葬送那一经验。

但是,我们通过去年11月27日领导机构文件所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仅仅为我们的资格问题作辩解。这一建议是由于今天我国所处的客观条件而成为必需的。

近几个月来,形势迅速地、危险地恶化了。这是了解我们建议的深刻性的真正关键。

首先是道德问题充分暴露了。发生了一连串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丑闻,诸如石油、国防部情报局、佩科雷利等丑闻。这些丑闻已不能再归于许许多多不光彩的贪污腐化事件一类了。其数量及严重性的逐渐增加甚至已经使人难以一一列举。在整个舆论界面前,耸人听闻地、赤裸裸地揭露了这样一种大坏事:不能再把这事说成是偶然事件、不幸遭遇和轻率之举。被牵连进丑闻的人的名单,涉及到在财政警察、治安机关、国家机构、工业和公共金融的基本权力中心中担任领导的人物,涉及到法官和经济工作中的头面人物,这些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活着,有的遭到审讯,有的被迫潜逃,有的名声扫地,受到怀疑。这份名单之长和人数之多,就使这样一点变得显而易见了,即:为了整肃风化,使国家机器恢复秩序和廉洁,就必须解决关键性的政治问题,亦即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力体系以及该党及其盟友的施政方法。

后来发生了地震。当然,这就象罕见的坏天气一样,是一种自然灾害。这次地震使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和南部其他一些地区遭了灾。

在上述地区,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最初四十八小时之内,政府

在保障最起码的火速救灾工作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缺乏效率、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和思想混乱。这一批评并不涉及武装部队、治安力量、消防队，以及那些千方百计、奋不顾身地努力救死扶伤和率先提供援助的人们。

今天，政府官员们的这种优柔寡断和杂乱无章，在能源、交通、化工部门，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地震灾害以及目前的气候灾害也都说明所谓“南部特别干预”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数万亿里拉的花费并没有用于保护土壤、治理水系、植树造林、开发山区、发展南部内地和建立巩固的生产体系，而是大部分被挥霍浪费到投机活动、买卖勾当和同黑手党及卡莫拉<sup>①</sup>狼狈为奸这些方面去了。

现在，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让这笔必须用于震区重建的款项又用来维持、甚至加强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执政党所掌握的这一体系。

如果说，在发生道德问题之后，在政府因地震问题而丢丑之后，需要证明我们的建议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话，那么现政府成员们对恐怖分子的讹诈所作的严重让步，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列举和揭发了闻所未闻的违法事件和同恐怖主义分子谈判的做法。政府在虚伪的坚定性这种官方立场掩盖下，实际上是包庇和纵容恐怖主义分子。

为了替这种让步辩解，有人居然说什么，由于社会党施加压力，议会多数内部出现冲突，必须调解纠纷，以拯救政府！然而，当体制的安全受到危害时，是不能允许搞卑劣的妥协的。

---

<sup>①</sup> 卡莫拉系意大利那不勒斯一种从事绑架、暗杀、贩毒、诈骗等罪恶勾当的流氓帮会组织。

事实是,我们共和国的机体遭受了难以治愈的深刻创伤,意大利人的民主和文明的觉悟受到了损害。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国家为飞扬跋扈的恐怖主义所困扰(恐怖主义正以新的袭击和讹诈进行威胁),而且还打开了一个鼓励形形色色冒险企图的缺口,新法西斯主义也在其中跃跃欲试。

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论存在着可能以外国为首的恐怖主义中心问题。

多年来,我们就要求从各个方面调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迄今为止,正象两院议会委员会、在反复听取了部长和情报机构首脑的意见后所声明的那样,并未掌握任何有真凭实据的材料。

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必须立场鲜明,态度明确。如果掌握了能够证明外国支持或参与意大利恐怖主义活动的事实,那么我们就指出,必须从中得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全部结论,因为很明显,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退让的路线就会显得更加荒唐了。相反,如果并不存在这种事实,那么我们就认为,发表可能损害意大利国际关系的声明是不适宜的。

为人所不齿、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无法为之辩解的是:到今天为止,一些毫无根据的假设都被用来达到国内目的,并且根据这种假设,掀起了一场地地道道的宣传运动,正如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及反动右翼的喉舌和人物所发起的那种运动一样。不仅如此,这还是一场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运动,并且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场运动恰恰是针对我们的,而我们却是多年来用自己全部力量来孤立和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全力阻止它向工人阶级中间

渗透的人。事实上，工人阶级反对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自己的敌人，因为它违背人类的理想，否认并危害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与成果，而这些价值和成果始终鼓舞着意大利工人和劳动者的斗争，是他们谋求解放的工具，是建设新社会不可放弃的基础。

我们是圭多·罗沙的党。我们还是这样一个党：它在多年为人所不理解 and 敌视之后，为在人民和治安力量之间创造新的气氛而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并取得了成效。

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这个荒唐的矛头指向意共的宣传运动，是否仅仅是为了使人们忘记图尔索事件期间所作的让步而搞的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呢？或者说，这个运动是否要重新制造五十年代那种反共气氛呢？我认为，第二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但如果是这样，我们会面临使意大利整个局势向右转，使我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变得同诸如联邦德国的立场大为不同。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号召全党有力地回击这个宣传运动，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宣传运动没有任何论据，甚至连仅仅是表面上严肃的论据也没有。但正因为这种反对我们的运动，也是反对人们对民主和革新意义的政治发展的要求与希望的，所以，我们认为，一切真正的民主人士都应该思考这一点。

我想对社会党同志们提一个特别的问题。今天社会党的政治计划是什么？我们不能相信，多年来一直谈论代替的社会党同志们，竟能甘愿在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力体系范围内充当从根本上看只是从属于该党的力量。我们也不能相信，社会党同志们竟然认为自己站在反共宣传运动力量的前列，却能确立社会党在政治上的突出地位，因为这种反共宣传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促成向右倒退。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可能有一种运动或阴谋能使意大利人

无视或忘记我们所代表的实际要求，我们是通过成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建议表达这种要求的：这个政府将代表并包括各党派内外有才能而又正直的力量和人士。

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应当由另一个意大利来进行管理。这个意大利愿意始终如一地、毫不妥协地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这个意大利愿意在公共生活中树立道德风尚，它愿意有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权，愿意有起作用的公共服务事业，愿意有一个重振旗鼓、面貌一新的经济活动。这个意大利愿意有更大的、切实有效的社会正义、愿意使南部得到新的发展。这个意大利愿意在世界上给自己树立一个有尊严、能平安而有秩序地共同生活的形象。

我们号召同志们要从事的事业是：为使这个意大利具有更响亮的声音、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影响而进行工作和斗争，这个意大利不仅存在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之中，而且存在于各阶层人民、一切社会阶层、各民主政党之中。我们要进行工作和斗争，以便使这个意大利拿出办法并采取什么方式，从而压倒腐败无能而又目空一切的意大利。

这项事业要求以巨大的努力来进行说服工作和理论制定工作，发挥首创精神，作出榜样。但是，今天作出这种努力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在意大利政治形势下，没有其他的道路能使我国得到拯救和新生。

同志们都应该相信，并且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在目前的行动中，我们所建议的是最后的办法了。

有些人认为，为了把事情弄好，就必须让我们党失去曾经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共产党，一个在西方和世界工人运动范围内完全

是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的那些特点。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扪心自问,也要问问别人:这对意大利难道是件好事吗?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本身就会变成虚无缥缈的幽灵,工人阶级、劳动者、青年、妇女和全民族要这种幽灵做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强大的,我们能够象在法西斯垮台后,在9月8日以后所做的那样,要再次为渡过国家生活的紧急关头而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这是因为今天我们党这棵大树把自己的根子深深地扎在使自己诞生的那个阶级中间,而且我们党在成长和不断自我革新的过程当中,善于吸收其他有增强生命力的养分:这些养分来自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来自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世俗潮流,来自重视发展南部的民主思想,来自意大利天主教政治、社会运动中的人民民主力量。

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并不是千差万别的现实的大杂烩,而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特别是由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思想与活动,这个政治组织使得从马克思、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革命的财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丰富和新的发展。在我们党中间,汇集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经历的力量,这些力量使党壮大起来,并同党融为一体。1972年,我们党由于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同志们的并入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那么,难道我们要听从那些让我们把这种来之不易并且极其宝贵的财富抛进大海的人的意见吗?

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增加自己的财富,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鼓足劲头去发展我们的政策,革新我们的工作方法,革新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形式,始终努力去扩大并加强我们同劳动群众、同人民的联系。



这也要求在党内扩大民主生活。意大利和国外有许多例子，包括各国共产党在内，都告诫我们，建立派别对于党的斗争效力、党的团结以及党的真正的民主活动都会带来害处。但是也有另一些例子(只要举出波兰一个例子就够了)又告诫我们，同群众的关系不融洽，缺乏党的民主生活，也会带来损害和危险。

我还想讲一讲最后一件事。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有效力的组织还不够。还需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某些根本品格：坚信党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献身于我们的事业，要把这一事业放在个人命运之上；原则性和道德风尚相一致；随时准备捍卫党，使党不受任何打击和任何诬蔑。

正是这些品格使党在分析上和政治行动上犯了错误时，也能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在遭受失败后还能继续前进；使同志们在生活和斗争的波折之中，而且往往是在痛苦的遭遇当中能够坚持下来。

今天在座的我们老一辈同志们，那些曾为我们这个伟大的党奠定基础的老一辈同志们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品格。

我们大家以亲切、尊敬的心情拥抱他们，向他们表达全党的感激与祝愿。

我们特别要感谢所有那些参加了党在各阶段的斗争的不同年龄的女同志们，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向卡米拉·拉维拉同志致敬。

我们要深切悼念那些已经去世的同志们，深切悼念许许多多过去和不久前的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深切悼念不久前离开了我们的路易吉·隆哥和乔治·阿门多拉同志。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要感谢对我们表示祝愿和声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感谢今天光临大会的外交使团的代表们，感谢向

我们发来贺电和派代表团参加大会的意大利民主党派的代表们。

我们是在我国生活最严重最黯淡、同时又是充满了对革新的强烈要求和实现变革的巨大可能性的时刻来庆祝意共成立六十周年的。

今天，我们党是汇集和代表着这种要求，并且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行动的力量之一，而且是主要的力量。因此，尽管我们充分认识到存在着对意大利的威胁，但我们仍然怀着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和合情合理的信心来庆祝我们党的六十周年。

今天到场的男女同志们，党在全国各地的党员和领导人们，我们共青团的男女青年们，希望你们用上述思想、上述感情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以新的劲头去工作，去斗争，使我们的组织更加强大，使六十年前我们党为之而诞生的事业胜利前进。

(译自1981年1月26日意共《团结报》)

# 在都灵菲亚特厂共产党人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1年2月15日)

意共在都灵发起的两项活动中有一项是难忘的“三十五日”斗争<sup>①</sup>。这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斗争中的一次。

我们根据一贯的做法，在不同的场合和斗争之后的一些时机——在都灵省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在筹备这次代表会议的各次会议——对那场斗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分析。从这种认真、仔细的分析中，我们必能得到种种的教益（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得到教益了），因为我们确信，即使犯错误也能使人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但有一点必须是明确而坚定的，即那场斗争是对菲亚特厂的企图的一个必要回击，那场斗争本来就应当用最大的力量来进行，如果不这样做就糟糕了。

昨天这样做是正确的，将来这样做——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仍将是正确的。凡是参加过这场斗争的劳动者，都不应为此感到遗憾。相反，都应为经受住这一极为严峻的考验而感到自豪，就

---

<sup>①</sup> 指1980年9月起，意大利菲亚特厂工人为抗议雇主解雇一万五千名职工的决定而进行为期三十五天的罢工斗争。10月10日斗争达到高潮；全国一千万劳动者举行总罢工声援该厂工人。最后，菲亚特厂被迫暂时放弃解雇，当时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科西加政府也宣告下台。

象菲亚特厂的共产党员、都灵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全党一样感到自豪。我们党在一切阶段，包括最激烈和最困难的阶段都是站在支持斗争的一边，而当时其他人则犹豫不决。

今天，在四个月之后，那场斗争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清楚了。那场斗争是社会政治冲突的一个表现，这种社会政治冲突在菲亚特厂继续进行着，今天在蒙特爱迪生厂也在进行着，而且在其他方面，比如税收政策、经济政策、地震灾区重建的方针和方法、道德、恐怖主义以及政府对外政策等方面也都在进行着。这是全国范围的一种冲突，其中心是有关意大利及其政治领导、政府的前景问题。

正是在这个危机和冲突更尖锐的阶段，意共领导机构于11月27日提出了崭新的解决政府问题的建议，即民主代替，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民主代替是把意共作为自己的动力和最大保障：保障正直和民主，保障效率和革新。这个建议并不是什么灵机一动，也不是什么转瞬即逝的宣传性花招。

这一建议的出发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有道理的考虑，是对我国形势以及对至今所组成的历届联合政府的业经证实的无能所作的深刻分析，这些联合政府越来越明显地不能对付和解决意大利危机，特别是不能消除公民同制度保持越来越大的距离这种状况，这对我们共和国来说是陷于更加严重的危险的不祥之兆。

我们的建议不仅是应当为之顽强地、坚决地、富有创造性地工作和斗争的正确解决办法，要尽快地实现它，为我国谋福利；而且，这一建议从现在起，对于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和人民群众来说，对于最坚信改革的必要性的民主力量来说，还是恢复信任的理由，是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依据。今天，在一个丧失信心的情绪和四分五裂

的因素蔓延的时刻,这一建议成了保全社会和民主的一种因素。

当前局势以及社会政治斗争变得这样尖锐的起因是什么呢?首先是由一场客观上存在的危机所促成的。这场危机日益严重,不可能不引起更为激烈的阶级冲突。

汽车工业、石油化工工业、冶金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建筑业处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至少有二十年时间带动意大利经济发展的行业处于危机之中。但今天这些行业都不再起带动作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这是迄今在我国业已形成的那种类型的发展所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

但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性的危机:这也是由上述类型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组织的危机,是国家的危机,因为这个国家只知道充当社会的尾巴;这场危机也是政党的危机,因为这些政党对社会采取迁就态度,并且从中捞到好处,受益不少。

正是所有这些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各种机构运转的全部状况,各党派的生活和意向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生活习惯和思想的总的状况,正是所有这一切陷于四分五裂,显露出越来越大的裂痕,造成了混乱、不稳、捉摸不定和分崩离析的局面。现在大家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变革的必要性正是由此而来。我们共产党人将为实现这一变革而不懈努力。这是一种深刻的变革,它涉及经济、社会、政党乃至思想。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修修补补或者是在枝节问题上进行纠正来摆脱目前陷入的困境。

那么这一切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倘若这种总危机状况延续并加剧,而不是开始真正的革新,那么很清楚,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集团和特权阶层就会越来越施加压力,以便减少社会负担

和缩小工人阶级的成果，其办法不是通过力图限制工人阶级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使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甚至借助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力否定工人阶级的存在，这种企图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丧失自觉，丧失对自己是一个总的阶级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在菲亚特厂已经看到了，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千百种迹象看到它。

在直接的政治领域中，这种要采取倒退的解决办法的企图，表现为集中攻击意共。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意共是实现保守反动计划的主要障碍，因为意共体现了（尽管不是单独地体现）革新和民主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对工人运动和解放进步运动的攻击并不仅仅出现在意大利。这种攻击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有，特别是在西欧，从英国到西班牙再到联邦德国都有。这种攻击由于里根在美国获胜而得到新的推动。形势的这种恶化加剧了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困难，使其产生退让倾向，但也呈现受到积极磨炼和进行重新思考的迹象。这种形势的恶化也在各国共产党身上反映出来了，其中一些党认为采取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道路才能更好地进行抵制。

我们的反应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战略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被证明是必要的和有效的。这一战略表现为要为争取和平、缓和和通过互相监督办法实现均衡裁减军备而顽强地斗争；这一战略主张建立以各国人民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战略在面临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指要超越工人运动及其政党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迄今所经历的阶段和道路，并且要致力于寻求西欧工人力量和人民力量协

同一致的努力。

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这种探讨和活动,在欧洲工人运动和欧洲以外的进步力量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希望。这不仅会引起西方最保守、最落后、最冒险的势力的敌视,而且也会引起这样一些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他们认为,迄今已实现的社会主义是对所有国家都应适用的唯一道路和唯一解决办法,各国共产党的斗争都应受一成不变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而不能对历史的经验和道路进行革新。

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在一般问题上和象波兰这样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具体问题上,继续耐心地阐明我们的立场。

意共对波兰事件表示了同自己所信奉和实践的原则相一致的意见并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我们这样做始终是采取正确的和建设性的方式,甚至照我们看,是采取了无可指责的方式。这些原则中的头一个原则就是不容许对各国人民自由选择自己发展和进步道路的主权有任何侵犯。鉴于有一个从波兰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的运动,而这个运动又是因为抗议方针与方法上的错误而产生的,采取镇压性措施就尤其是荒唐的和不可接受的。

不管其他共产党是多么不理解,也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将从容地、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这条道路任何时候也不会使我们作出机会主义的让步,也不会使我们龟缩不前。我们将捍卫并发展意共的特点,即阶级的和民族的党、民主的和群众的党、新的国际主义观念的倡导者。这些特点使我们成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我们的团结正是以这些特点为基础的。

被说成是我们的“反常性”的那个东西,正是意大利工人阶级

所创造出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不愿丢掉这个“反常性”，因为今天这能使我们经受住意大利危机对我们的考验并通过改换领导阶级在民主中摆脱危机。

这就是目前这一全面冲突的意义。弄清楚这一点，看清了各方力量，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对付一切具体的问题，因而也就能更好地处理象这里所讨论的“菲亚特事件”问题了。

实际上，与其象有些人那样对于意共关心菲亚特问题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厌烦，倒不如说，应当对政府和其他政党对这件事兴趣不大和很不敏感感到惊讶。只有菲亚特领导集团抱有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通过解雇、减少旷工、提高生产率，菲亚特似乎就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但情况依然是，他们远没有克服因多年盲目经营而造成的发展缓慢、矛盾和错误。

情况证实了共产党人一年前在有关汽车问题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也就是说，目前，汽车行业通过汽车公司巨额投资和各国政府提供手段与援助在全世界正进行着深刻改组。而这正是意大利和菲亚特厂过去和现在所缺少的。在这里，看不到这个企业作出什么战略抉择，政府也没有为这一行业指出什么切实有效的经营建议。

如果说，由于广告宣传和市场的原因而存在某种乐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也是为该企业 and 领导集团的自我维护），但竟然发展到对全国把菲亚特厂的真实情况大事化小，那就是不能接受的了。因为了解真实情况是在生产上和制定规划上作出特殊努力的首要条件，而这种努力是复兴一个以其工人阶级、技术人员和设备而成为国家宝贵财富的企业所必需的。

但是实际上，近几周来有人想以轻易的乐观主义来表明，使菲



亚特厂摆脱危机的主要途径就是解雇工人和大大减少工会谈判合同的权力。对于菲亚特厂来说,需要同时在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第一,刻不容缓的是:国家要确定对汽车工业进行干预的措施(不久前提出的文件完全是不适宜的)。第二,必须有一个企业计划,这个计划要明确指出菲亚特厂在今后几年想要实现的目标并且是采用哪些自身资源来做到这一点。最后,必须进行深刻的技术和生产改组,在研究方面特别要作出努力,这种改组应使企业得以发展并调节自身生产,使之具有竞争力并提高生产率。

明确重申劳动者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对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生产率也是实现更高水平的竞争能力的需要,这是有好处的。我们很清楚,在工人运动中对“生产率”这个词本身是不信任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在工业发展史上,老板总是千方百计地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其办法主要是依靠增加劳动强度,加重工人的体力消耗、依靠超级剥削。但这并不能否定如下一点,即:特别是在危机阶段,提高生产率客观上是一种必要。工人运动自己也要正视这个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变成更大的剥削,努力求得这样一些组织工厂生产和劳动的形式,这些形式要保障更大合理性、更大的生产效率、更好地利用设备,但也要保护并改善集体和个人的劳动条件。

道路肯定是艰难的、坎坷不平的。但如果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被迫进行防御性战斗,如果我们也想通过这条道路显示出自己作为领导阶级的才干的话,那也就必须在这方面去经受考验。但有一点是始终应该记住的,即:这种才干不仅要在企业内部,而且特别要在企业外部去争取,也就是要通过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施加影响来做到这一点。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而且也

是同生产率相联系的问题，是工人关于工人权利要求的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是要对十年来工人斗争进行回顾，但这十年的工人斗争却是我国和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主力量、工会以及我们党自己取得成就、得到发展的十年。问题在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严重性——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向一切大企业提出了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深刻改组的进程。要么是工人运动正视这些改组进程，进行谈判，提出自己的建议，从而通过这一条途径增强自己的谈判权力，要么则是工人运动消极地承受这种改组进程，这就会有逐步丧失这些年来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的危险。

正视企业改组也是处理并克服随着前几年取得的成果而产生的那些新的矛盾的正确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强调要承认并发挥个人和集体新的专业形式的必要性，强调要确定一种能克服过份拉平工资差距这一危险的工资政策，强调要恢复同职员、技术员和干部的正确关系和团结的原因。

除此而外，我个人认为，在菲亚特厂，工会和我们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目标、最尖锐的要求是：尽快使二万三千名被缩减工时的劳动者恢复工作。不能把这一目标置于次要地位。其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争取实现这一目标是反对这样一种活动和实际情况所不可缺少的，即：这种活动和情况有削弱阶级觉悟和阶级团结的危险，无论是对处于缩减工时的劳动者来说，还是对留在工厂中的劳动者来说，都是如此。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讨论这些问题——就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样——并不是要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是想玩弄卸包袱的手法，把责任推到工会身上，而是想为加强工会本身而作出

贡献。显而易见，我们过去和现在为菲亚特厂劳动者提出的所有目标都是要求工会更加强大、更加老练、更加强同劳动者的联系。总而言之，要使工会更加民主。

工会是劳动者自主的组织，我们希望这种对雇主、政府、政党的自主能象朱赛佩·迪·维多里奥<sup>①</sup>说过的那样，能够得到保持和加强。有人似乎只是关心向我们共产党人，向恰恰是不喜欢工会和政党中那种派别阴谋勾当的我们（而且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些东西的），向恰恰是由于理想和原则方面的原因，最坚定地主张各党和各工会具有不同作用和相互自主的我们，提醒要尊重自主。

但是，问题在于：自主要成为真正的和卓有成效的，就应该以广泛和切实有效的民主为基础，在工会发挥作用时，在工会内部生活中，从下到上都应当体现这种民主。

民主在工会中的这种必要发扬，就使一些行动和一些决定变得成熟了，而没有这些行动和决定，工会就有失去生命力和领导能力的危险。这些行动和决定是：诸如制定保障大会民主和投票规则的明确条文；在更换代表时能更经常地进行审查，通过工会积极分子的参与补充上述的刻板作法；所有的领导人真正通过选举产生，并根据劳动者的选择组成领导机关，克服长期以来实行的对等制做法<sup>②</sup>，这种做法有变成损害代表性，助长劳动者不满情绪的固定原则的危险。

---

① 朱赛佩·迪·维多里奥（1892—1957），意共领导人，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生前曾任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世界工联主席等职。

② 对等制系指意大利三大工会（总工会、劳工联合会、劳工联盟）在1972年联合组成三大工会联合会后，不问各个工会力量大小如何，各在联合会领导机构即指导委员会九十个席位中占三十席。

以上这些也是使工会越来越具有群众性组织特点、而不是一种运动的条件，是使职员、技术员、工段长和干部参加工会行列并进入领导机关的条件。

这也是使工会具有适合今天情况的真正的现代化色彩，能够吸引、动员和推动来自劳动者行列的新的、年轻的和生气勃勃的力量途径。

这次都灵代表会议表明菲亚特厂的共产党人具有分析本企业状况和生产、工作问题的巨大能力，他们具有批判的精神。但我认为，这次大会所显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菲亚特厂的共产党人——在都灵和其他省——丝毫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斗争精神。我们从这个讲台上看到，即使那些曾经承受了三十五天斗争的最大负担的同志（他们之中许多人对为结束这场斗争而达成的协议提出许多批评），并没有置身局外，而是重新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投入党和工会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艰难。此外，我们党的和工会的许多干部与积极分子，在厂方精心策划下被削减了工时，也就是说被拒于工厂大门之外。正因为这是雇主的意愿，因此就必须用更广泛的抵制来反对它，要唤醒劳动者当中新的力量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投入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在菲亚特厂的各分厂争取到新的同志，发展新的党员。我们应当保持共产党在菲亚特厂的力量，保持其从事活动所特有的那种战斗精神，应当作出更大的努力，开展更加丰富多样的行动来寻求并建立先进分子和菲亚特厂全体劳动者之间更广泛、更持久的关系。这应该是共产党人对振兴工会组织、壮大党、使菲亚特厂劳动者和整个意大利工人运动所必须进行的斗争，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所作出的具体贡献，以便既改变在工厂工作的人们的状况，增强他们的社会政

---

治影响,也改变整个国家总的状况,变革我们的社会。

(译自1981年2月16日意共《团结报》)

# 同热那亚意大利造船厂 工人的谈话

(1981年3月2日)

一位工人问贝林格同志：为什么不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贝林格说：“我可以说，在意大利有许多微妙的政治工作，这几天议会中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我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回答：试问在什么地方写着应该由意共总书记去参加苏联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呢？意共总书记不去，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陶里亚蒂时期也有过这样的事。况且，法共总书记既未参加上次苏共代表大会，这次也没有去。但是，法国共产党人的代表几天前却能在莫斯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讲话。那么，如果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象他们要别人认为的那样，我的缺席是不让贾恩卡洛·巴叶塔同志在代表大会讲台上讲话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或许，这种不同的待遇是否同意大利共产党人发言的内容有关？苏联同志们是知道我们要说什么的，他们很容易猜到这一点，因为意共习惯于到处讲同样的话，始终如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路线，表达自己通过民主方式形成和采取的选择。巴叶塔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还对勃列日涅夫报告中有关恢复缓和政策的具体而

现实的建议那个部分表示欣赏。所以，苏联同志们在当时采取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甚而是荒唐的。”

关于如何防止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分歧导致左翼之间鸿沟的加深，进而危害工人运动的问题，贝林格说：“仅仅表示担忧是不够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并且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使我们两党之间的气氛不那么紧张。毫无疑问，我们都注意不使用可能加剧论战的语调，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政治上的不一致是存在的，而且是关系到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应该坦率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明确指明了我们的前景，去年11月我们就明确提出了取代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力体系和受该党支配的那种执政联盟的民主代替问题。至于说到意大利社会党，如果我对该党多数派的代表大会提纲理解得不错的话，它的前景却是继续同天主教民主党进行目前这种合作，谁也不知道还会持续多少年，因为只要意共不完全改变自己的面貌，民主代替就是不可能的。

“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意共始终如一地发展自己的革新政策和革新理论，但它也维护自己的特点，正象它尊重别人的特点一样，这些特点使意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整个欧洲政治格局中成为一支如此巨大的和独特的力量。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十分紧迫地提出来了，即要共同努力来寻找不仅是汇合与合作的恰当形式，而且是联合的恰当形式，以便实现政府的民主代替。鉴于我国危机的严重性，这种民主代替是十分必要的，但又不是现成的。为了争取民主代替，需要进行斗争和大量的工作。”

在谈到工会问题时，贝林格说：“意大利工会运动正经历着困难的时刻。这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工会民主不够，因而也就是工会同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不够。

这就是自主与民主之间理应具备的密切关系的主要症结所在。人们讨论得很多的对等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们过去对这样一种需要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的确也有了这样的理解，即：七十年代初，在恢复联合进程的某种初期阶段，曾规定了某些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各大工会在各种联合机构中代表人数对等。但这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期存在的规定。事实上，这一规定结果成为对切实有效地参与作出决定和选择的一种限制。这倒不是由于数量对比没有反映出力量对比，或者没有赋予意共以与其影响相符的分量（尽管意共是最大的意大利工人党）；这是由于，而且主要是由于劳动者自由和民主的选择结果被来自上面的决议所阻碍，而这些决议又是按规定定出的分量造成的结果。其所以要取消这些规定，恰恰是为了保障在各级都能切实有效地选择领导机构，当然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总而言之，要求在工会中发扬切实有效的民主，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这怎么算是同工会自主与统一背道而驰呢？”

（译自 1981 年 3 月 3 日意共《团结报》）



## 在卡坦扎罗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81年3月8日)

意大利共产党人提出两大根本性目标：

——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团结；

——寻找一条能切实朝着使意大利和欧洲得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造方向前进的道路。

因此，那些把我们在国际上的立场和行动说成策略上的庸俗做法的人是错了，他们说什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想博取这个或那个党的好感，从而有助于我们进入政府。

我们是为使劳动阶级，因而也就是使我们党进入意大利政府而奋斗的，对此我们丝毫不感到羞耻。而且我们也很清楚，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国际上还不够自主，这种论调只不过是一种借口。

其他人反对同共产党人组阁的真正原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出一丝一毫的权力，因为他们不想改变政策，因为他们害怕革新国家。

至于我们在国际上的自主，我们根本没有感到有进行考试和取得证书的必要。而且，又是由谁来发给证书呢？难道是由那些过去从来也不敢、今天也仍然不敢稍稍脱离美国，并对它发表最腼腆的批评的人吗？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现在对华盛顿支持萨尔瓦

多反动政府感到不错，就象过去对越南侵略感到不错一样。本届政府的各党都感到里根的全部政策不错。我们说“全部”，也就是包括这样一个荒唐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震撼第三世界的一切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都被认为是所谓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这种观点就直接使美国政府支持和纵容最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从南朝鲜到萨尔瓦多、到智利。议会多数党对里根所说的要确立美国的军事优势的打算也感到不错，而里根这番话是同作为缓和政策柱石的军备平衡原则背道而驰的。

昨天，我们看到了意大利共和党书记斯帕多利尼议员在美国同布什副总统会晤后发表的声明。根据这个声明，美国准备要求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承担重整军备的新义务，这不仅仅是指部署欧洲导弹；用斯帕多利尼的话来说，美国还准备要求我们同一个尚未更为明确地说出来的“政治计划”保持一致。

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在美国向萨尔瓦多政府运武器和派“顾问”时保证对美国声援吗？或者是指支持美国在超出大西洋条约规定的界限以外地区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这样一种约束吗？斯帕多利尼没有说，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保留，连最轻微的批评也没有。

意大利人有权知道要求我国干什么，有权要求我们的政府官员们不要含糊其词。无论如何，他们应该知道，意大利人民是不愿意被卷入任何冒险勾当之中的。

所以说，其他政党的领导人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上独立课，因为同他们相反，我们无论是对美国说话，还是到莫斯科去（如不久前苏共举行代表大会时我们就去了），还是在北京说话，都明确阐明我们的自主立场。我们这样做时既心平气和，同

时又坚定不移,我们这样做,既是根据在充分自由和独立的情况下作出的深思熟虑,同时又始终从其他党的建议中吸收我们认为积极的东 西,正象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有关暂缓部署中程导弹建议所做的那样。

当我们批评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时,这当然不是为了讨好我们的敌人,而是因为我们深信,各国人民的独立与主权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容放弃的原则,在世界当前的条件下,对这一原则的任何违反都是同缓和事业相违背的。

我们在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是这样。那里发生的事情表明,必须克服工会和党内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开始彻底的革新,不要进行镇压也不要外国插手干涉,以便维护并发展社会主义成果,恢复党同工人阶级、国家同公民之间的民主关系。

意大利共产党人所有这些立场都是一条要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的组成部分。这一改造既要超越迄今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验,又要超越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这是要由西欧工人运动去完成的任务,这项任务只有当西欧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团结时才能完成。

这并不是一种能给它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立场。(可以说,某些公式主义者却硬要给人戴帽子。)我们的努力是进行革新的巨大努力。这种努力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对社会主义不想仅仅搞一些宣传或单纯的颂扬,而是想进行思想变革和革命实践的具体工作的话,如果在不论是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狂热观点都在消失之际,想为许许多多追求新事物的力量,特别是许许多多青年提供有效的指南的话。这些青年拒绝那种过时的、被历史评论所摒弃的神话和公式。但是,如果能生动地、有说服力地使

他们对创造和建设一种真正的新社会感到兴趣，因而也就使他们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进去的话，他们是可以找到产生信心的根据和进行斗争的愿望的。这种要求并不产生于分裂工人运动的任何意图，而且其本身也不会带来这种意图，这种要求并不是针对其他党的。但是，对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存在着，并且符合工人阶级、人民中最活跃的力量、妇女、青年、最开明的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我们确信，我们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这条道路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时髦，而是一条有前途的道路的开端。

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这样一个党，由于它善于工作，由于总的环境（不仅仅是意大利的环境），它逐渐在起作用，它感到自己拥有的国内和国际义务已经在我们国界以外和我们这个大陆以外的地方引起了期待和希望。我们一定会发挥这种作用并尽到这些义务，我们不会排斥别人，但也不会退让。

卡拉布里亚大区表明它并不是象它的剥削者所希望的那样，是个自暴自弃、消极被动的大区，也并不是象阴谋家和法西斯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是个造反和暴力的大区。这里的人民没有低头屈服。

在全意大利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所托儿所，其中在皮埃蒙特大区有二百一十七所，在埃米利亚大区有一百七十二所，在拉齐奥大区有一百六十五所，在托斯坎纳大区有一百二十五所（以上各大区均为左翼政党管理的大区），在卡拉布里亚仅有六所。在意大利共有一千零二十九个妇女咨询处，其中一百七十个在埃米利亚大区，一百六十七个在托斯坎纳大区，一百五十二个在皮埃蒙特大区，一百零四个在拉齐奥大区，而在卡拉布里亚仅有十五个。在建立医疗单位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迟缓。因此，在卡拉布里亚大区

和在南部，妇女群众和所有居民要进行更强有力、更持续的斗争，以便争取这样一种公款开支和动用的政策，即不应将公款滥用于给同治理本大区的各党和黑手党有拉拢收买关系的人以优惠和特权。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个要进行顽强斗争来争取妇女翻身解放的领域，即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陈旧的东西，有许多偏见和陋习，这些都使妇女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而且常常在家庭中，有时甚至是在一些具有左翼、先进倾向的家庭中处于一种受压抑或从属的地位。

共产党人反对把妇女的斗争同一切劳动者、一切被压迫者的斗争分割开来，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妇女应当进行一种特定的斗争。这就是要清除根深蒂固的大男子至高无上地位和特权的斗争。这种大男子至高无上地位和特权是对妇女的侮辱，有损于她们作为拥有同其他人平等的权利与才干的人的条件，妇女不再容忍别人把她们当作低人一等的人来对待了。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和努力还是很艰巨和复杂的，意共应该带头干起来。

共产党人还反对取消为保护民主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采取紧急措施的法律，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已在议会中通过投反对票对警察拘留法持有保留，但总的说来，这项法律是有效的，特别是在为同司法部门合作的恐怖分子减刑方面是有效的。在公民投票中维护这项法律将不会阻碍在立法机构中对这项法律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和使之更为完善，就象意共和其他一些左翼力量在议会中已经建议的那样。

意共也同意取消终身监禁。我们很清楚，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对此也有疑虑和不同意见。我们也很清楚，在舆论界中也有不少

人不仅不愿意取消终身监禁，而且还想把死刑引进我们的司法制度之中。

鉴于恐怖主义和黑手党不断犯下残暴的罪行，各阶层公民中间产生上述心情是可以解释的。但有一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即我们是这样一股力量，它一方面在反对恐怖主义和黑手党的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定和最坚决，同时又出自它所信奉的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想，它决不能接受死刑不可更改的观点。我们确实坚信，必须要为解脱和挽救每一个人，甚而包括最顽固不化的坏人而作到仁至义尽。

社会必须得到维护，刑法必须从严，但是不能绝对排除对有罪之人进行再教育，并挽救他们回到社会中来。

因此，我们反对死刑。把死刑引进我们的司法制度，不仅不会有助于制止罪犯，正象许多国家上百年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而且还会促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比今天由恐怖分子和黑手党的勾当所造成的情况更为残忍。

至于终身监禁，从事实上和时间上看，这一刑法已经在逐渐缩短了，这既是由于一般在长期监禁后得到大赦，也是由于1962年通过的法律允许犯人在关押二十八年表现良好后可以获得假释。况且，意共也曾对参议院通过的一项取消终身监禁法律投了赞成票，把关押最高年限提到四十年，这项法律付诸实施，后来因为提前大选中断了。

凡是有眼能看，有耳能听的人就请看一看、听一听吧。他们会明白，继续这样下去是不行了。卡拉布里亚已经成为意大利各大区中的“灰姑娘”<sup>①</sup>了。在这个大区，还有卢卡尼亚大区，工业机构

<sup>①</sup> 引自德国格林童话《灰姑娘》，指一被虐待的贫苦孤女。

最薄弱,失业者最多,在整个就业人数中领取削减工时补贴的工人数目最高;在这里,山区和丘陵荒芜,水源本是一种福音,每年却会变为灾害,水象脱缰之马,以摧毁性的力量从高山泻入大海;在这里,乘火车、汽车和飞机旅行是困难和危险的。总而言之,这些年来,卡拉布里亚对意大利和欧洲的富庶地区的依赖性增加了,与这些地区的鸿沟也更宽更深了。

对领导阶级,对掌权集团,对挥霍额外拨款和利用南部基金来搞拉拢收买勾当而不是推动发展和就业的政府政策,能提出什么更严厉的谴责呢?

今天,竟然有人还想继续干下去。他们延长了有关南部基金法,保留了额外拨款的老办法,而不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办法都失败了,不来说明这种历史责任?

首先,这种历史责任在于:治理意大利共和国不是为了加速意大利的统一,不是为了最终地处理南部问题,而是为了使意大利分裂,使北部和南部继续处于分裂状态。

坎帕尼亚和巴西利卡塔的地震,通过电视转播的镜头使所有意大利人不仅看到了由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摧毁状况,而且也看到了使南部许多地方处于被遗弃和不发达境遇的这种破产政策的后果,现在,必须重建,因此,也就必须依靠全国团结来调拨巨额款项。

但是要重建什么东西呢?我们要争取使重建能标志着上述地区和整个南部开始有一种新型的发展。不能用意大利人的钱来重建旧的权力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挥霍巨款,养肥了天主教民主党拉拢收买的人,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保持当地的落后状态。

应该是在建设住房、学校、公用楼房的同时,建立起一种广泛

的、能自主发展的生产系统，一种能够改善生活状况和水平的文明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的系统，一种革新的、廉正的、有效率的、置于人民及其组织的民主监督之下的政治系统。

正因如此，我们共产党人不仅为地震灾区、而且为整个南部指出复兴的前景。今天，我们甚至还指出开展一个新的特殊时期的争取复兴运动的需要。

“争取复兴运动”是老说法。这种说法曾是那些象上一世纪卡拉布里亚大区一位伟大观察家所说的“有血有肉的基督”提出来的。这些人就是卡拉布里亚、卢卡尼亚和西西里等大区的雇农，如马里奥·阿利卡塔<sup>①</sup>那样的知识分子，如曾任头几届反法西斯团结政府部长的共产党员法乌斯托·古洛<sup>②</sup>那样的政府人士。

争取土地和土地改革，反对大庄园主和雇用代理人的农场主这一口号是当年的口号，但仍有现实性和现代意义。

争取复兴的斗争，今天意味着同时要为争取城市和内地的现代化和文明设施，以及为争取发展社会服务事业而斗争。

现代化并不是以私人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的。它应该用真正起作用的学校和医院，文化娱乐机构的存在、社交生活的丰富多彩，互相支持的关系压倒竞赛和竞争的关系来衡量。

但是，争取复兴的斗争首先就意味着要为争取工作而斗争。

---

① 马里奥·阿利卡塔(1918—1966)，已故意共领导人，生前曾任领导机构成员、意共《团结报》社长等职。

② 法乌斯托·古洛(1887—1974)，已故意共领导人，生前曾任中央委员。第二次大战后，意共参加七届内阁期间(1944年4月—1947年5月)，曾历任农业部长、司法部长等政府要职。



诚然,意大利工人运动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为争取工作而斗争,但也反对繁重劳动、重复劳动和报酬过少的劳动。但总而言之,它始终都希望能有工作。使数以十万计的男人、青年、妇女没有工作,这不仅是使他们丧失了一种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而且也使他们丧失了这样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考验自己的才智,生产财富,改造社会关系,改变生活。

为此,就不应该退让,就不应该放弃发展生产和给所有人以工作的想法,因为不能放弃一种实质性自由的想法,这种自由的基础是发展所有生产力、所有智力、所有个人特长,是能进行生产并改造现实的工作。

正因如此,我们再次敲响了政治生活蜕化以及意大利民主所面临的危险的警钟;在你们的大区,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危险的程度:这既是由于黑手党进攻的加剧和蔓延所致,又是由于各党生活和制度的倒退所致。

我们已经面临着某种比过去“荣誉社会”<sup>①</sup>更加严重的东西。不久前,卡拉布里亚大区法官们勇敢的行动表明,黑手党正在扩大招兵买马的范围,正在争取并控制新的力量。黑手党特别企图打入经济和国家生活的愈来愈多的新领域,在农业、公共招标事业、建筑业投机中来搜刮钱财,用公共投资来发财致富。除了公开暴力、杀人等传统方法外,现在又采取了新的手段,即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直接霸占经济部门,控制一部分机构和政党。必须进行抵制和摆脱黑手党的公开战斗。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向卡拉布里亚

---

<sup>①</sup> “荣誉社会”系指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帮会分子们用来称自己组织的行话。

大区 and 意大利的一切民主力量，并且还要超出国界，向欧洲最优秀的文化界提出来，即如果这种统治变得无法控制，如果西西里的黑手党、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和那不勒斯的卡莫拉联成一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一个象意大利共和国这样伟大的民主国家中如此巨大的一部分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不错，为了同黑手党作斗争，需要有新的法律和更加有效的机构，但这还不够。首先需要的还是普遍革新民主生活。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愿望呢？或者相反，这里难道不是有一种政策正在那些既置身于中央政府又置身于大区政府的各党中占上风吗？这种政策就是搞交易，没完没了地进行调解，在权力集团之间和党内派别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用歪门邪道的方式把权力交给由各党书记所组成的“领导班子”手中。

既然如此，当我们指出“没有或反对共产党人，就不会有卡拉布里亚大区与南部的复兴”时，就不是出于宗派主义或偏见了。这是一种验证，是我们已经取得并且每天仍在取得的经验。我们想这样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要成为一个群众性和斗争的大党，成为一个要改变卡拉布里亚大区和意大利的政府的反对派政党，成为要使劳动阶级和人民阶层掌握这个大区和我们国家的领导权的党。

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是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一点是一清二楚的，即政府和议会多数在无数冲突、调解和平衡当中唯一关心的就是在台上继续呆下去，想方设法使自己尽可能少地受到干扰。在散布种种许诺构成的浓厚烟幕后面，实质上是不能治理的现状。这一点在接触到南部的悲惨现实时就显得更为严重了。这就是意共建议成立一个替代政府的无可争议的理由的实质

---

所在，这个替代政府是要结束我国所承受的政治领导形同虚设的局面。

(译自 1981 年 3 月 9 日意共《团结报》)

## 在意大利电视台答记者问

(1981年3月17日)

**问：**意共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暂缓部署新导弹建议的评价是否与意大利共产党人所宣布的“对莫斯科自主”相矛盾？

**贝林格**回顾了意共在西欧出现生产和部署美国新导弹问题时所提出的建议的内容，即要求苏联停止生产和部署 SS—20 导弹，对巡航导弹和潘新导弹也提出了类似要求，并主张立即开始谈判。

接着**贝林格**说：“这一建议尽管在西欧政界，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当时并未被意大利政府所接受，也未被苏联所接受。今天，我们满意地看到，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与我们建议相似的一个建议。至于说到意共的自主，根本就无须要求别的党来开证明。我们又应该要求谁来开证明呢？难道是要要求天主教民主党吗？这个党一向是同意美国的，从侵略越南到支持萨尔瓦多反动政权都是如此。或者是要求那些竞相争取里根政府同情的其他执政党来开证明吗？我们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我们的自主了，我们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并且这种立场时常同美国或苏联不一致。”

**问：**但是，欧洲共产主义难道没有处于危机之中吗？

**答：**我看根本没有。如果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联合或者甚至是几个共产党之间的某种组织的话，那它就会是这样。但

是,如果把欧洲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些思想的总和,那么这些思想则是在发展,并且还大大地渗透到我们大陆之外的地方。比如说,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中,就对构成欧洲共产主义的全部立场展开广泛讨论。当然,也有人认为,应该诅咒欧洲共产主义,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意共发展自己思想财富的能力。这可能是不让巴叶塔同志在苏共代表大会讲台上讲话的原因之一,而巴叶塔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代表。不管怎样,这个错误倒是更加突出了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立场。

**问:** 是通过工会自我约束,还是通过法律来控制罢工?

**贝林格**首先指出,目前所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部门所发生的情况的主要责任在于天主教民主党和它把持的历届政府,因为缺少一个政策,而恰恰是天主教民主党庇护、帮助并常常煽动自主工会的活动,而自主工会应对目前大多数罢工负责。

接着**贝林格**说:“今天这个恶魔既然已经闯了祸,就不能想用反罢工法这个镇压手段来解决问题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着,正象存在着“联合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已削弱”的问题一样,应当找到办法来解决它,尤其要用发展联合工会内部民主的办法。

意共的建议是:“由各大工会自己去拟定出公共服务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的自我节制罢工规定。应当试验几个月,看一看这种制度对所有有关的劳动者及所有的工会是否都起作用。如果这一试验不起作用,那么议会就可以把那些自我节制罢工规定变成法律,以便使这些规定对所有人都有效,甚至对那些没有签署这些规定和不打算遵守这些规定的人也有效。”

**问:** 意共发起在本周末召开的住房会议是对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的机会吗?

**答:**我想,首先将利用这次会议来批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历届政府,因为重新资助建筑业的十年计划停顿下来了,人们也没有持久地、全面地使取消布卡洛西法中有关有偿征用这一部分成为正式法律,住房储蓄仍然只是一个宣传口号,缺少一个发展公共投资建筑住房计划。此外,现在住房问题已经如此尖锐和复杂,以至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办法了。需要在不同的方面和长时期内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将要在我们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精神,这些建议旨在发展住房建筑工业生产和建筑材料生产,修改合理房租法的某些条款,分期分批让房客搬家,以便防止再次发生普遍不出租住房的情况,同时也为了使必须搬家的人能另有房子可住。

**问:**共产党人如果参加政府的话,为了研究并解决退休者所焦虑的问题,将会立即具体地做些什么事情呢?

**答:**那时我们将向参议院重新提出我们在众议院争取过的那些建议:工业部门平均工资最少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浮动工资每三个月调整一次。同时也应指出,政府通过信任投票强行作出的每四个月一调整的决定,实际上也是企图把这个期限用在雇佣劳动者的浮动工资上。这是打击现有成果的手法,但也是一个枉费心机的企图。

正象对待工资政策一样,共产党人在退休金问题上也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来采取行动的,即从最低的退休金出发(正象从最低的工资出发一样),然后逐步涉及到较高的退休金,考虑各种不同情况(职业、工龄、生产能力),而且还要定出最高限度。这样,一项符合人民中生活条件最差、受到保护最少的阶层的需要的政策,也就变成了一项厉行节约和社会公平的政策。但是,在意大利事情却相反,先是去满足条件最优越、最受保护的阶层,然后如果有一

星半点的可能,再分给其他人一些残羹剩饭,对待领取最低退休金者就是这样,一般说,对待受保护少并且最穷困的人正是如此。

**问:**当意共参加全国团结议会多数时并没有提出这类要求,而现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却端出了许多权利要求,如果不是全部权利要求的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当意共参加议会多数时(1976至1979年),共产党人对劳动者的状况关心得竟然少到这样的程度:那几年,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基本上保住了,这在西欧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没有做到的事,就业水平被保住了,正是依靠我们的建议,通货膨胀率一直下降到百分之十二。

今天情况大大改变了,通货膨胀率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维护实际工资成了问题(一部分实际工资甚至连靠浮动工资也不足以保障);工作岗位不仅是受到私人雇主的严重打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受到国营企业的打击。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那一时期一切都好。因此,在我们看到同我们一起作的一系列保证(这种保证不仅涉及到劳动者的眼前要求,而且也涉及到改革的问题)被议会多数的其他力量所忽视时,我们就退出了议会多数,这也是实际情况。我们在决裂时曾说,只有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并信守协议,才能同意共合作。

是意共端出了所有的权利要求吗?我们并没有提出普通医生的要求,相反我们还批评了政府对他们的让步。因为一旦同意给某一个行业增加那么多的工资,其他一系列行业势必也就会争着要求增加工资。也就是说,这就造成了我们面临的这种竞相提出权利要求的局面,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没有一种可以作为依据的确定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应有明确的标准和目标。

**问：**为什么你们对克拉克西有关大改革的建议反应如此平淡呢？

**答：**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不是宪法改革问题。把这个问题当成主要问题，相反还可能成为回避根本问题的一种手法。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真正进行治理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能力作出选择、提出目标、给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提出明确的依据。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一些可以进行宪法改革的领域。比如说，我自己就赞成一院制和减少议员的数目这会大大简化议会和立法的活动。对克拉克西的其他建议，意共坚决反对，例如，那个实际上将导致限制检察院的独立性并使其从属于政权的建议。

然而，克拉克西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一些问题，例如，现内阁各党通过瓜分职位和机构来霸占国家，这种现象就是对各机构正确行使职能的否定；再如，四党书记组成某种督察院一类的组织凌驾于政府和议会之上，这才是对各机构职能的自由和有效的行使进行名副其实的压制。这就是我们反应平淡和持不信任态度的原因所在。

**问：**为了改善同社会党的关系，共产党人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在这种困难当中是不是贝林格和克拉克西个人之间互不相容也起了作用？

**答：**毫无疑问，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起任何作用。而且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总书记性格历来都是大不相同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在一定时期两党之间有良好的合作。相反，起作用的是政治计划不一样。我不清楚意大利社会党的政治计划是什么。但是具体说，我觉得这个党的领导人打算继续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



而且是处于从属地位进行这样的合作，我不知道这种合作还会继续多久。而我们却是想努力来尽快实现一种能替代以天主教民主党霸权为基础的权力体系的代替办法。显然，这种政治计划的不一致就带来了争论，并且有时是相当热烈的争论。但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努力使这种争论不致采取过激的形式，而是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存在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工会运动中，在其他一些群众组织中、在地方政府和许多大区中都存在着、团结与合作的重要组织。这是心平气和地进行这种讨论的基础，但这种讨论也是不可能仅仅用外交辞令或是相互说些客气话来取消的。

**问：**在历史性妥协和民主代替两种战略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说历史性妥协的战略已经“失败”了，那么民主代替的建议也就不会再令人相信了。贝林格那时会不会辞去总书记职务呢？

**答：**民主代替战略同历史性妥协战略并不矛盾，而是同歪曲历史性妥协的那种说法相矛盾。历史性妥协是一种寻求意大利社会的几个主要成分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之间的会晤与谅解的政策，这一政策仍然是拯救和改造我国所必需的。这一政策不是必然地会产生政府联盟，更不用说在象天主教民主党这样的一些党没有任何善于自我革新的表现的时候产生这种政府联盟。至于贝林格是否继续担任意共总书记的问题，这只能由党的领导机关而不是其他人来决定。显然，有朝一日，当我不再得到我的同志们、特别是选举我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任时，或者，当我发现自己精力不济——我想自己还是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的——时，我就会放弃现有职务。

**问：**您赞成给那些同司法部门合作的恐怖分子减更多的刑吗？

答：我认为，完善这种减刑制度，甚至订立某些能给被挽救者，尤其是青年重新做人的机会的条款，那是正确的。

（译自 1981 年 3 月 18 日意共《团结报》）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